

今天 2014年冬季号 总 107 期

## 目 录

### 视野：韩少功特别专辑

萤火虫的故事

第一部分 少年

第二部分 乡亲

第三部分 天下

第四部分 书卷

第五部分 心魂

### 细读与诗学

言说的芬芳  
——读张枣的《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  
江弱水

與宇宙對話  
——中国新诗学之一  
金丝燕

### 陆忆敏后期诗作选评

沉思（外 27 首）  
陆忆敏

谁能理解弗吉尼亚·伍尔芙  
陆忆敏

谁能理解陆忆敏  
胡亮

宿命的欣喜

——读陆忆敏近作  
胡桑

### 今天旧话

忆一凡  
鄂复明

### 八方来鸿

去北方  
郭玉洁

## 萤火虫的故事

韩少功

在作家群体里混上这些年，不是我的本意。

我考中学时的语文成绩很烂，不过初一那年就自学到初三数学，翻破了好几本苏联版的趣味数学书。“文革”后全国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前，我一天一本，砍瓜切菜一般，靠自学干掉了全部高中课程，而且进考场几乎拿了个满分（当时文理两科采用同一种数学试卷）——闲得无聊，又把仅有的一道理科生必答题也轻松拿下，大有一种逞能炫技的轻狂。

我毫不怀疑自己未来的科学生涯。就像我的一些朋友那样，一直怀抱工程师或发明家之梦，甚至曾为中国的卫星上天懊丧不已——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让人抢在先？

黑板报、油印报、快板词、小演唱、地方戏……卷入这些底层语文活动，纯粹是因为自己在“文革”中被抛入乡村，眼睁睁看着全国大学统统关闭，数理化知识一无所用。这种情况下，文学是命运对我的抚慰，也是留给我意外的谋生手段——至少能在县文化馆培训班里混个三进两出，吃几顿油水稍多的饭。可惜我底子太差，成天挠头抓腮，好不容易才在一位同学那里明白“论点”与“论据”是怎么回事，在一位乡村教师那里明白词组的“偏正”关系如何不同于“联合”关系。如果没有民间流传的那些“黑书”，我也不可能如梦初醒，知道世界上还有契诃夫和海明威，还有托尔斯泰和雨果，还有那些有趣的文学呵文学，可陪伴我度过油灯下的乡村长夜。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进入大学，在校园里连获全国奖项的成功来得猝不及防。现在看来，那些写作确属营养不良。在眼下写作新人中闭上双眼随便拎出一两个，大概都可比当年的我写得更松弛、更活泼、更圆熟。问题是当时很少有人去写，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文坛。国人们大多还心有余悸，还习惯于集体噤声，习惯于文学里的恭顺媚权，习惯于小说里的男女都不恋爱、老百姓都不喊累、老财主总是在放火下毒、各条战线永远是“一路欢歌一路笑”……那时节文学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才华。一个孩子只要冒失一点，指出皇帝没穿衣服，便可成为惊天动地的社会意见领袖。同情就是文学，诚实就是文学，勇敢就是文学。宋代陆放翁说“功夫在诗外”，其实文学在那时所获得的社会承认和历史定位，原因也肯定在文学之外。

就像特定的棋局可使一个小卒胜过车马炮。

解冻和复苏的“新时期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很像五四新文化大潮时隔多年后的重续，也是欧洲启蒙主义运动在东土的延时补课，慢了三两拍而已。双方情况并不太一样：欧洲人的主要针对点是神权加贵族，中国人的主要针对点是官权加宗法；欧洲人有域外殖民的补损工具，中国人却有民族危亡的雪上加霜……但社会转型的大震荡和大痛感似曾相识，要自由、要平等、要科学、要民富国强的心态大面积重合，足以使西方老师们那里几乎每个标点符号，都很对中国学子的胃口。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时代”——从欧洲十七世纪到中国十九世纪，人们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变革大破大立翻天覆地，不是延伸和完善既有知识范式（科学史家 T. S. 库恩语），而是创建全新知识范式，因此都释放出

超常的文化能量，包括重新定义文学，重新定义生活。李鸿章所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当然就是这个意思。历史上，也许除了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古希腊、古印度、古中国等几乎不约而同的文明大爆炸，还鲜有哪个时代表现出如此精神跨度，能“大”到如此程度。

不过，大时代并非历史常态，并非一个永无终期的节日。一旦社会改造动力减弱，一旦世界前景蓝图的清晰度重新降低，一旦技术革新、思想发明、经济发展、社会演变、民意要求等因缘条件缺三少四，还缺乏新的足够积累，沉闷而漫长的“小时代”也许就悄悄逼近了——前不久一部国产电影正是这样自我指认的。在很多人看来，既然金钱已君临天下，大局已定，大势难违，眼下也就只能干干这些了：言情、僵尸，武侠，宫斗，奇幻，小清新，下半身，机甲斗士……还有“坏孩子”的流行人格形象。昔日空荡荡的文坛早已变得拥挤不堪，但很多时尚文字无非是提供一些高配型的低龄游戏和文化玩具，以一种个人主义写作策略，让受众在心智上无须长大，永远拒绝长大，进入既幸福又无奈的自我催眠，远离那些“思想”和“价值观”的沉重字眼。大奸小萌，或小奸大萌，再勾兑点忧伤感，作为小资们最为严肃也最为现实的表达，作为他们的华丽理想，闪过了经典库藏中常见的较真和追问，正营销一种抽离社会与历史的个人存在方案——比如好日子意味着总是有钱花，但不必问钱来自哪里，也不必问哪些人因此没钱花。中产阶级的都市家庭，通常为这种胜利大“抽离”提供支付保障，也提供广阔的受众需求空间。

文学还能做什么？文学还应该做什么？一位朋友告诉我，“诗人”眼下已成为骂人的字眼：“你全家都是诗人！”“你家祖宗八辈子都是诗人！”……这说法不无夸张，玩笑中却也透出了几分冷冷的现实。在太多文字产品倾销中，诗性的光辉，灵魂的光辉，正日渐微弱黯淡甚至经常成为票房和点击率的毒药。

坦白地说，一个人生命有限，不一定遇上大时代。同样坦白地说，“大时代”也许从来都是从“小时代”里滋生而来，两者其实很难分割，或者说后者本是前者的一部分，前者也本是后者的一部分。抱怨自己生不逢时，不过是懒汉们最标准和最空洞的套话。文学并不是专为节日和盛典准备的，文学在很多时候更需要忍耐，需要持守，需要旁若无人，需要繁琐甚至乏味的一针一线。哪怕下一轮伟大节日还在远方，哪怕物质化和利益化的“小时代”正成为现实中咄咄逼人的一部分，哪怕我一直抱以敬意的作家们正沦为落伍的手艺人或孤独的守灵人……那又怎么样？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乡村看到的一幕：当太阳还隐伏在地平线以下，萤火虫也能发光，划出一道道忽明忽暗的弧线，其微光正因为黑暗而分外明亮，引导人们温暖的回忆和向往。

当不了太阳的人，当一只萤火虫也许恰逢其时。

换句话说，本身发不出太多光和热的家伙，趁新一轮太阳还未东升的这个大好时机，做一些点点滴滴岂不是躬逢其幸？

这样也很好。

2014年11月

## 第一部分 少年

妈从乡下探亲归来了，带回半布袋蚕豆，半布袋红薯丝，还有大小四只鸡！此起彼伏的鸡叫声带给了我们很多欢乐和想象。我想象以后鸡能生很多蛋，而那些蛋又能变成小鸡，小鸡长大以后又能生蛋。

给鸡找野食的任务当然交给了孩子。每天放学以后，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鸡，有时还带回几个同学，让他们也能来见识这些颇为珍奇的活物，共享我的幸福。然后，我就提着竹篮出去挖蚯蚓，或是网捕飞虫，或是去路边拔拔青草和捡捡烂菜叶。为了找到足够的鸡食，我得走很远很远，天黑时分才能回家。

哥与姐比我忙，正准备考初中或考高中。他们常常为了赶作业而不能陪我出去找鸡食。碰到这种情况，我就生出几分不满，觉得他们无情无义。

更可恼的是，他们俨然已是半个大人了，经常附和父母，用大人的腔调来提供杀鸡理由，把不怀好意的目光投向小动物。他们说，鸡不是人，养大就是让人吃的么，何况我们好久都没闻到肉味了，喉咙里都能伸出一只手来了。他们议论着应该杀那只黑的，然后再吃那只白的……这种议论总引起我一场大吵大闹大哭。

不准杀！——我吼得天昏地暗。

尽管一次次抗争，鸡还是一只只少了，最后，只剩下一只生蛋最多的黄毛母鸡，一个对我家餐桌贡献最大的英雄。这只鸡孤零零的，在小院子里踱来踱去，无论到哪里都找不到自己的朋友，似乎有些害怕，一见人就惊慌躲避。我去给它喂食，对它说说话，把摸一摸，它才显得十分温顺，对我表现出亲近和信任。我压它低头，它就久久地低头。我压它蹲伏，它就久久地蹲伏。

最揪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那几天父母好像在悄悄议论什么。我提心吊胆，成天警惕大人们的一举一动，看是否有杀鸡的迹象。爸爸肯定看出了这一点，一会儿安慰我，说不会杀鸡的；一会儿又说服我，说出很多人比鸡重要的道理……这些使我的心情越来越乱，也越来越沉重。

终于，这一天我放学回家，见小院子里空荡荡的，只剩下那个沾满糠粉的鸡食盆，而厨房里飘来一丝鸡肉的浓香。我明白了。我知道我无能为力，知道一切都晚了。我再也忍不住，跑到房里扑倒在床上伤心地大哭起来。我在哭泣中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大人们是很坏的，而我终究也要变成大人，我肯定也会变坏。这个想法让我恐惧。

——摘自散文《我家养鸡》（1987）

武斗的呐喊声或枪炮声时有耳闻，以至我三个多月后因流弹误击住进医院，发现这个当地最大的医院已被造反派全面接管，大门口加岗加哨，收诊的全是武斗伤员。手术室那边不时传来嚎叫，不是伤员痛得叫，就是战友们抓狂，用冲锋枪一类威逼医生，要医生的手脚快点，再快点。我的邻床，一个不足十八岁的学徒工，腹部中了四颗机枪子弹，据说还是军人用直升机从外地转运来就医的。他也在享受英雄待遇，伤势稍好就撑上拐杖一高一低地到处乱窜，看文艺界送来的

慰问演出，或带回一些水果与我分享。当然，坏消息也很多：“又‘太’了一个……”他是指太平间里又多了一个——这种嘟囔一次次击中我的恐惧。

通向太平间的走道哭声震天。我挥之不去的沉重是，那些脸上蒙盖白布的人是谁的儿孙？谁的兄弟？谁的同窗伙伴？一场旨在“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为何让这么多年轻人在白布下孤独远去？

——摘自长篇随笔《革命后记》（2014）

## 1 • 03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

一九六七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骇然触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顶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瞞过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噗嗤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软的落地保护装置。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看，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有时尿急，懒人为了省下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无聊，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摘自散文《漫长的假期》（2008）

## 1 • 04

那一天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我去学校查看升学名单的公告，然后在双杠上闲坐了一会儿，准备回家做煤球。我知道，政策规定不满十六周岁的可继续升学，父母身边也可留下一名子女，我是两条都合得上，不必下乡当知青，被不少同学羡慕。

我似乎还能继续坐双杠，投射纸飞机，在上学的路上盘带小石块，去学校后门外的小店里吃米粉，把酸辣汤喝得一如既往。

下雨了，我一时回不去，便在大楼里闲逛。这时候的学校都成了旅客散尽的站台，一本本没有字迹的白页书。全国大乱结束了，中学生几乎都被赶下乡去。到处空空荡荡，在走廊里咳嗽一声竟然回声四起，让人禁不住心里发毛。白墙上到处是红卫兵的标语残痕。窗户玻璃在武斗的石块和枪弹下所剩无几。楼梯上的一个大窟窿标记出这里曾为战场——不久前的那一次，一个冒失鬼出于派争之恨，觉得自己没骂赢，打架也没占上风，居然把一个手榴弹扔上教学楼。幸亏当时周围没人，只是把几块楼板炸塌了，吓出了楼板下一窝逃命的老鼠。

我推开 202 房，我们不久前的红卫兵司令部，但这里已没有大旗横挑在窗外，没有我熟悉的钢板、蜡纸、油印机、糨糊桶，只剩下几张蒙尘的桌椅，完全是匪军溃逃后的一片狼藉。“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不知是谁临走前在墙上涂抹下这样的笔墨悲壮。忍不住，我又习惯性地走进 208、209、311……门吱吱呀呀地开了，但这些地方更冷清，一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还是空的。所有的床都只剩下裸露的床板，用木板结束一切。破窗纸在风中叭叭响。

我踢到了一个空纸盒，呼吸到伙伴们的气息，包括女孩子们身上似香若甜的气息——那些喜欢做鬼脸和发尖声的姐们。

亲爱的，我被你们抛弃了。

我有一种充满了风声和雨声的痛感，于是回家写诗，写下了一些夸张的句子，决定放弃自己的升学。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这是当时一首流行歌。一代少年对远方的想象，几乎就是由这一类作品逐渐打造成形。远方是什么？远方是手风琴声中飘忽的草原，是油画框中的垦荒者夕阳下归来，是篝火与帐篷的镜头特写，是雕塑般的人体侧影，是慢镜头摇出的地平线，是高位旋转拍摄下的两只白鸥滑飞，是沉默男人斜靠一台拖拉机时的忧伤远望……哦忧伤，忧伤太好了，太揪心了，男人的忧伤简直就是青铜色的辉煌。

相比之下，继续上学还有什么意思呢？Long live Chairman Mao，英语课只会教这一类政治口号，笑死人了。代数课呢，不是算粮食就是算肥料，今天是牛粪一元方程，明天是猪粪二元方程，已经算得教室里粪味弥漫。学生们都惊呼人民公社的畜生也太能拉了。

我揣上介绍信和户口材料，跟随军哥一同乘火车，再转汽车，再转马车，在路上昏昏沉沉颠了两天多，在哗哗急退的风景里心潮起伏。我们一路上同县招待所里的厨师吵过架，同另一伙知青下过馆子和看过电影，直到那个傍晚才抵达白马湖——山坡上的两排土平房。我把一口木箱和一个被包砸在这里，未见欢迎仪式（几天前已经开过了），未见朋友们前来激情地跳跃和拥抱（他们早来十几天，已累得无精打采），更没见到旅游营地的手风琴和篝火，倒是被一钵冷饭堵得胸口冰凉。也许是淘米时太马虎，饭里夹了一些沙粒。更重要的是没有菜，只有盖在饭上的几颗咸黄豆，让我目瞪口呆，东张西望，无法下咽。更严重的情况还在

后面。睡觉的土房里油灯如豆，地面高低不平，新泥墙还潮乎乎的透水。木栏窗只蒙了一块塑料布，被风鼓成了风帆状，叭啦叭啦的随风拍打。外面呼呼下大雪，瓦缝里就零星飘入小雪，以至帐顶上挡雪的一块油布不堪其重，半夜里被积雪压垮了，吓得同床的姚大甲跳起来大叫，把同室人都叫起来紧急救灾。

还不到第二天挑湖泥，我就已经后悔不迭了，明白农村户口是怎么回事了。

——摘自长篇小说《日夜书》（2013）

## 1 • 05

手掌皮肤撕裂的那一刻，过去的一切都在裂痛中轰的一下闪回。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垦荒，把钐头齿和锄头口磨钝了，磨短了，于是不但铁匠们叮叮当当忙个不停，大家也都抓住入睡前的一时半刻，在石阶上磨利各自的工具。嚓嚓嚓的磨铁之声在整个工区此起彼伏响彻夜天。

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溶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钐头挖伤的，锄头扎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痂，老伤叠上新伤。但衣着褴褛的青年早已习惯。朝伤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就在神经反应之外。我们的心身还可一分为二：夜色中挑担回家的时候，一边是大脑已经呼呼入睡，一边是身子还在自动前行，靠着脚趾碰触路边的青草，双脚能自动找回青草之间的路面，如同一具无魂的游尸。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去的时候，一声大叫，意识才会在水沟里猛醒，发觉眼前的草丛和淤泥。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发现自己两腿全是泥巴，不知道前一个晚上自己是怎么入睡的，不知道蚊帐忘了放下的情况之下，蚊群怎么就没有把自己咬醒。还有一天，我吃着吃着，突然发现面前的饭钵已经空了四个，这就是说，半斤一钵的米饭，我已经往肚子一共塞下了两斤，可裤带以下的那个位置还是空空，两斤米不知填塞了哪个角落……眼下，我差不多忘记了这样的日子，一种身体各个器官各行其是的日子。

——摘自长篇散文《山南水北》（2006）

## 1 • 06

人们在工地上经常谈到吃。吃的对象、方法、场景、过程、体会一次次进入众人七嘴八舌的记忆总复习。不，应该说在刚吃过饭的一段，比如上午十点以前，肠胃还有所着落和依附，人们还是可以谈一些高雅话题，照顾一下上层建筑，比如知青们背记全世界的国名，背记圆周率或平方表，背记一些电影里的经典台词……来自《列宁在十月》《南征北战》《卖花姑娘》《广阔的地平线》什么的。但到了腹中渐空之时，“看在党国的分上”一类不好笑了，“让列宁同志先走”一类也不好玩了，肠胃开始主宰思维。从北京汤包到陕西泡馍，从广州河粉到北京烤鸭……知青们谈得最多的是以往的味觉经验，包括红卫兵大串联时见识过的各

地美食。关于“什么时候最幸福”的心得共识，肯定不是什么大雪天躲在被窝里，不是什么内急时抢到了厕位，而是饿得眼珠子发绿时一口咬个猪肘子。

操！吃了那一口，挨枪毙也值呵。

这一天，争夺饭票的豪赌又一次展开，姚大甲赌我不敢吃死人骨头——他是指身边一堆白花花的碎片，是大家刚才开荒时刨出来的。

我掂了掂一片碎骨，觉得阴气袭人，污浊发霉，有一种咸鱼味，但我嘴上还得硬。“十张饭票太少了。”

“你不敢吃就是不敢吃。”

“我脑膜炎？你要我吃我就吃？”

“我赌二十张！”

“我今天没兴趣……”

“二十五！”

其他人觉得有戏可看了，围上前来，七嘴八舌，手舞足蹈，大加评点或挑唆，使大甲更为得意地把赌注一再加码。三十，三十五，四十，四十五，最后涨停在五十——如此惊心动魄的豪赌已让我呼吸粗重。

五十是什么意思？五十就是五十钵白花米饭，意味着你狼吞虎咽时的晕眩，你大快朵颐时的陶醉，还有抚摸肚皮时的脑子一片空白。想一想吧，至少在很多日子里，你活得出人头地，光彩照人，活脱脱就是当今皇上，不必再对食堂里的曹麻子谄笑，让他的铁勺给你多抖落几颗黄豆；也不必捶打邻居的房门，对屋内的猪油味贼心不死抓肝挠肺；更不必为了争抢一个生萝卜，与这个或那个斗出一身汗。

生死抉择，成王败寇，翻身农奴得解放，不在此一拼吗？我抹了一把脸，大声说：“有什么了不起？饭票拿来！”

他们被镇住了，好一阵沉默。

我清点饭票，确认赌资无误，然后旋旋腰，压压腿，捏一捏喉笼，咧一咧牙口，把自己当做出场前的运动员。我闭上眼，想一想舍身炸碉堡的英雄，想一想舍身堵枪眼的英雄，过一遍电影里诸多动人形象，在精神上也做好准备。最后，我用衣角细细拭去一块片骨上的霉污泥迹，两眼紧闭，大喊了一声：

“毛主席万岁——”

一次深呼吸之后，我咔哧哧地大嚼猛咬，没觉出就义是什么味，也不敢去想就义是什么味，直到胃里突然一阵恶涌，眼看就要涌上口腔，像高压水枪一样把嘴里的骨渣喷射出去，这才拔腿狂奔，蹿到附近的小溪旁一头扑下去，在那里拼命呕吐和洗漱——逃蹿前当然没忘记一把抓走地上所有的饭票。

晚上，队长买猪娃回来了，听说此事，觉得问题严重而且形势危急，立即把全队人召集在地坪，没顾得点上一盏油灯，就在黑乎乎的一圈人影里开骂：“连先人都不放过呵？什么人呢，就不怕遭雷打？也不怕吃得嘴巴里生疔？就不怕烂肠子烂肚？就不怕你婆娘以后生个娃仔没屁眼？”

黑暗中的责骂声在继续：“你看你，长得十七八九二十一二三四岁了，还像只三脚猫，不上正版！”

这也太夸张了吧？一口气滑出七八个数，铆足了劲给我拔苗助长，怎么不一口气把我拔成一个老前辈？

其他农民兴高采烈，会后一再点头哈腰笑脸逢迎，争相找我借饭票，又忍不住好奇地打听：那骨头到底是什么味？是不是有点酸？是不是有点咸或者涩？年纪稍长的几个，问过以后还心重，还嘟囔，看我的目光不无异样。我喝过水的杯

子，他们决不再沾。我用过的脸盆，他们决不再碰。到了深夜，同房的一个老头从噩梦中惊醒，大喊大叫，满头大汗，找到梁队长强烈要求换房，说他情愿睡牛栏，也不同啃尸鬼同住一窝。

——摘自长篇小说《日夜书》（2013）

## 1 • 07

在地上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抽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

黄某不是我的同学，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给同学带下乡的。他个头小，平时不大言语，只喜欢拉拉小提琴，不过肚子里还真有料，话匣子一打开都是我们闻所未闻之事。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受教冯谖，当然还少不了吕不韦阳具奇伟和宣太后私通大臣之类黄料……我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些大多来自《战国策》和《史记》，不知黄某什么时候读在眼里，记在心头。

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的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隆梅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和美国的M2。多年以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只是他的记忆有偏向，对军衔和型号记得太多，把重要情节反错漏不少，比如常把英国混同美国，对兵员数和钢产量也多是信口胡编。

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传庶几乎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坚实的文化？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脑袋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高兴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梅花党》、《一只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摘自散文《漫长的假期》（2008）

我就是在这时结识了外校的一些知青，都是些牛气冲天的幻想家，开口就是印度支那战争和法国红五月的那种。听说他们都在乡村办了农民夜校，我也立即回茶场办一所，决心配合友军行动，用革命思想改造可怜的乡村。

教材只能自费油印，由我和几个朋友编写，大体上以识字为纲，串起一些地理、历史、农科以及革命的小知识。《老乡上学歌》之类打油诗穿插其中，力图使课本更为活泼。这样的夜校一开张，干部们以为我们热心扫盲，吻合他们的工作任务，还十分高兴地支持。

不料事情并不顺利。农民学员对识字还有些兴趣，青年农民对天南海北的趣闻也津津有味，但要让他们理解列宁和孟什维克，明白巴黎公社有别于我们自己在的天井公社，费力气实在太大。

“巴黎公社？在哪个县？怎么没听说过？”

“巴黎公社的人不插田吗？不打禾吗？那他们都是吃返销粮的？”

“我只听戴书记说过要学大寨，没听说过要学巴黎呵！”

真是让人出汗。想当年红军在乡村建立苏维埃，还教官兵们学唱换调变阶的《马赛曲》，不知道是否要出更多的汗。

他们对无产阶级光荣这种鬼话也决不相信。无产阶级？不就是穷得卵都没一根么？要是无产阶级光荣，那婆娘们不都光荣了？他们粗俗地大笑，然后对地球是圆的这一真理也嗤之以鼻：怎么是圆的？明明是平的么！我走到湘阴县白马湖（一个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很远的地方），怎么没看见摔下去呢？怎么没看见湘阴人两脚朝天呢？……到最后，他们质问我为什么不教他们打算盘，不教他们做对联和做祭文，哪怕教教他们治鸡瘟也好呵。

这样，他们想学的我不懂，我懂的他们不要。多少年后，我看见有些大学生志愿者受非政府组织（NGO）所派，来到尚缺温饱的贫困乡村，分发女权或环保的资料，热情万丈地教几句英语，教一两首英文歌，把娃娃们搞得迷迷瞪瞪，就觉得他们身上也有我当年的影子。一代代的文明救主，看来都不大考虑鸡瘟之类俗事。

——摘自散文《漫长的假期》（2008）

当时的乡都称“公社”。这个公社的知青散落在山南岭北，总是在赶集时才集中出现于小镇。操一口外地腔的，步态富有弹性的，领口缀有小花边但一脸晒得最黑的，或脚穿白球鞋但身上棉袄最破的，肯定就是知青崽了。他们坚守一种城市的高贵（小花边、白球鞋等），又极力夸张一种乡村的朴实（最黑的脸、最破的棉袄等），贵族与乞丐兼于一身，有一点自我矛盾的意味，似乎不知该把自己如何打扮。

每逢农历三、六、九，农民们来此赶集，交换一些土产品，以货易货，调剂余缺，大多聚集在猪市、牛市以及竹木市。知青们则大多是冲食物而来，见到甜酒，米粉，猪血汤，糍粑，包子，板栗，菱角，杨梅一类必兴奋不已。本地小贩

都不大喜欢这些处地人。有人说，这些街痞子太没规矩，用磁铁块暗贴秤砣，一个钱买两个钱的货，太歹毒了。还有人说到更无聊的事：买一个包子，吃完半个后假装失手，把剩下的一半落在油锅里，气得女店主欲哭无泪：“祖宗，你吃包子就吃包子，这一下吸走我二两油呵。”

来自四乡八里的知青在这里混出了几分熟，日后不免有些走动，相聚下下棋或打打球，唱唱《三套车》或《山楂树》什么的，再讲一个福尔摩斯侦探故事，也算是超爽的文化大餐了。马涛所在的一伙来自茶盘砚，在集市上结识了另一伙，一些操纯正北京腔的知青——据说多是外交部子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通过特殊关系落户这里。

天下知青是一家。两拨落难人隔河相望，一接上头便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在小饭店里吃米粉时免不了互相谦让，争相埋单，闹出扭打的模样。“人生呵人生。”“命运不过是一杯苦酒。”“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些话都很耳熟，很对味，也很伤感动人，如同江湖上的接头暗号，一听便可引为知己。

“你就是马涛那个点的？”

“你同阎小梅一个队？”

“我早就拜读过你们涛哥的文章。”

“我早就仰慕你们梅姐的诗名。”

“能认识你们，我太高兴了。”

“你的普通话说得真好听……”

一个少男和一个少女，就这样在邮政所前认识了，互相一阵打量，紧紧地握手，眼睛迸放光芒，立即解下背篓去溪边深谈。他们在柳树林那边会不会擦碰出感情火花，会不会眉来眼去进而谈婚论嫁，也尽在其他伙伴的想象中。不料大家才逛了半个集市，就发现他们怒气冲冲各自归队，情节急转直下。

少女回头大骂了一句：“骗子！”

少男也回头大啐了一口：“什么东西，冒牌货！”

伙伴们后来才发现，也许是相互期望值太高，亲密者其实最容易成为冤家仇寇。他们刚才不过是一个有关俄国电影的细节解读没谈拢，就无不痛感失望，怒不可遏，忍不住喷血相骂——知识的高风险由此可见。读书是好事吗？当然是。但读书人之间的相互认同，一不小心就在相互挑剔、相互质疑、相互教导之下土崩瓦解，甚至在知识重载之下情绪翻车，翻出一堆有关智商和品德的恶语。

不久后，一场读书人之间的口水仗再度爆发：

“你们读过《斯巴达克思》？”

“哎呀呀，通俗文学在这里就不必谈了吧？”

“那你们读过吉拉斯的《新阶级》？”

“也就看两三遍吧，不是太熟。”

“说说《资本论》吧。”

“不好意思。请问是哪个版本？是人民版，还是三联版？还是中译局的内部译本？我们最好先约定一下范围，不要说乱了。”

“你们知道谁是索尔仁尼琴？”

“你是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还是《玛特辽娜的家》？你要是想听，我都可以给你讲一讲。”

“那……请问你们如何评价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

这种对话像打牌，各方都决心压对方一头，四连炸，同花顺，一个个都争相拍出大牌。对方读过的书，那就没什么好谈了，没读过的才应该成为话题，才是缺口、软肋以及决战机会，必须一举发现，狠狠抓住，穷追猛打，打得对方晕头转向。相比之下，关于辩证法、辉格党、汉代土地制度一类辩题，是一些难分高下的死局，说起来比较费事，聪明人最好不去那里纠缠。可以想象，如果他们还懂一点英文或法文，那么各种版本都抢上来秀一把和搅一把，正事就更没法谈了。

空气中已隐隐弥漫敌意。大概是在知识攻防上打平，擂台争雄难有结果，于是双方的比拼转向更加奇怪的科目：你犁过田？你做过瓦？你烧过砖？你炸过石头？你下过禾种？你阉过猪？你车过水？你会打连枷？你会打土车？你一天能插多少秧？你遭遇过雷击？你一次能挑多重的谷？你打死过银环蛇和猫头蛇？你知道“赶肉”与“炼山”是什么意思？你那棉袄上的补丁有我的多？……如此唇枪舌剑，相当于夸富和炫宝的颠倒版，同样是一种挑衅，一种进犯，一种排行榜竞争，一场争面子和抢风头的往死里打，一种革命和更革命之间的不共戴天，一种英雄和更英雄之间的水火不容。

“骂谁呢？”有人大拍桌子。

有谁开骂了吗？更多的人东张西望，寻找目标。

“道不同，不相与谋！”另一位站起来，气呼呼地拂袖而去，跨出了小饭店门槛，带动了另一些人纷纷起身，吓得几个和事佬左右为难。他们这一次不仅没有争相买单，而且大多成了气包子，脸上挂不住，连“再见”也免了。只有阎小梅跑出来大喊：“谁的草帽？是你们的草帽吧？草帽都不要了？”

后来，河这边有些人骂出了“臭权贵”，河那边有些人骂出了“狗崽子”，扯上各自的家庭背景，就更为意气用事了。其实双方的家长此时都是受到运动冲击的倒霉蛋，但这一方多是地主、资本家、旧职员的故事，那一方多是红色官员的故事，双方的苦情同中有异，好比财主和乞丐都牙痛，但痛得不大一样，事情不宜往深里想。

有人把马涛被捕一事，归因于对方借刀杀人——怀疑依据之一就是马涛在辩论时的傲慢曾把小梅气哭，种下了苦瓜籽。雪上加霜的是，几天后小梅在买粮的路上被碎瓷片割伤脚，一时血流如注，红透了半只草鞋，坐在路边痛得咬牙切齿一头大汗。涛哥恰巧路过这里。他不是没看见她脚下的血草鞋，不是不知道这里偏僻得前不巴村后不巴店，不可思议的是，他只是淡定一笑，“怎么这样不小心？要防止破伤风呵。”

他取下墨镜又戴上墨镜，跨过箩筐和扁担以及血草鞋，竟然一步步走远，一只旅行包在背上晃荡，消失在通往县城的大路上。

“快去卫生院吧。”他最大的恩惠、最深的关切、最温柔的言语，就是回头补上这一句指示。

他以为他是谁？

这也太冷血了吧？连一条路边的狗都对血迹惊慌大叫，但一个人居然没停下来，没蹲下来，没撕破衬衫帮助包扎，甚至没想办法给伤者的伙伴们捎个口信，就这样脸厚如墙地袖手而去。他就不知道流血过多差一点要了小梅的命？即便他是“沉船派”，与“补船派”的观点大相径庭，但他是人，是男人，是一个号称心系世界的男人，如果不懂得怜香惜玉，至少也要知恩图报吧？如果不懂得知恩图报，至少得有一点人之恻隐吧？抬头不见低头见，他没少吃小梅那些人买单的甜酒，米粉，猪血汤……这些就不说了。有一次过河去借粮，他喷完一通理论口水，还受到对方全体的热烈鼓掌。换下来的衣服还是小梅和另一个女知青拿去洗

过，小梅从北京带来的书籍也是优先他挑选。他怎么一转脸就全部人情归零？如果不联系“狗崽子”的阶级背景，这一骇人听闻的事实该如何解释？

一个常打篮球中锋的大个头，小梅的男友，将军的儿子，捎来口信要与马涛约架，一对一，徒手上，血溅五步，生死在天，地点定在河边林子里。要不是双方的和事佬多方劝阻，一场血拼也许难以避免。但事已至此，群体内部的严重分裂无可挽回。壮志未酬，大业未竟，胡马未灭国先乱，靖康犹耻箕豆煎，这日子还有什么盼头呵？有一位女知青每想到这一点就暗自流泪。同伙们发现她从此以后沉默不语，茶饭不思，要不是偶然发现她的三首旧体诗和一封遗书，差一点就听任她悲愤万分地投江明志去了。

大约一个月以后，一封不知出自何人的告密信，举报马涛的危险言行，算得上警察一看就要血管爆炸的大案情，引来了两台神秘的吉普车。警察直接来自省城，身穿便衣，换掉了警用车牌，大概是不想打草惊蛇，没有直扑茶盘砚抓人，只是在村外较远的路口布控，让一名公社干部去诱马涛入网，其事由是请他去“帮助公社绘制水利地图”。

这一次秘密逮捕，当然是为了撒开一张更大的网。以至村里人都不知情，好一段还给马涛记工分和分口粮，以为他不过是去公社当差了。

——摘自长篇小说《日夜书》（2013）

## 1 • 10

我当年是多么向往文明呵，是多么向往伟大的都市呵。在知青点的时候，扳着手指头数着日益临近的假日，找不到汽车就顶着风雪步行上路，从天明走到天黑，才赶到了县城的火车站。火车也过站了，我不耐等待，在站台上转悠了一阵，看上了一系列运煤车。我在起动的煤车上被不断旋来的煤粉呛着，全身很快变黑，颈子里也结出一层煤垢，硬如铠甲使脑袋难以转动。咣的一声，我一个喷嚏把自己打入了黑暗。光明在我身后迅速微缩，再微缩，飘飘忽忽的一个白点，直到最后完全消失。我感觉列车不是在平行地移动，而是竖起来向地心深处坠落。我想挣扎，但黑暗中看不到自己挣扎的手脚，更谈不上挣扎的方向。

出口在哪里？咣当咣当的车轮声突然膨胀和爆炸，不是来自哪一个方向，而是来自各个方向的钢铁的恫吓，一团团猛击我的脑袋。我不知道煤车为什么没有倾翻过来把我埋掉，不知道列车为什么没有倾翻过来把我压成肉酱而我居然还好端端地坐着。我好一阵才明白过来：眼下已进入了一个长长的隧道……

我就是那样一身黑煤急切地投入了文明，投入了都市，更大的都市，更更大的都市——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重新独坐在山谷里，听青山深处一声声布谷鸟的叫唤。

——摘自长篇随笔《暗示》（2002）

## 1 • 11

乱石横陈曲折明灭的一条山路，茫茫雪原上悬驻中天的一轮蓝色新月，某位

背负沉重柴捆迎面走来的白发老妪，还有失落在血红色晚霞中一串串牛铃铛的脆响……这一切常常突破遗忘的岩层，冷不防潜入某位中年男人或女人的睡梦，使他们惊醒，然后久久地难以入眠，看窗外疏星残月，听时间在这个空阔无际的清夜里无声流逝。

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最深的梦境已系在远方的村落，似乎较难容下后来的故事。哪怕那故事代表电大文凭，代表美国绿卡，代表酒吧里的灯红酒绿，它们都显得模糊和匆促，匆促得无法将其端详，更无法在梦境里定格出纤毫毕致的图影——如那远方的村落。

缘由也简单：多因了苦难。

人很怪，很难记住享乐，对一次次盛宴的回忆必定空洞和乏味。惟有在痛苦的土壤里，才可以得到记忆的丰收。繁盛的感受和清晰的画面，存之经年而不腐败。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的一场政治和经济危机是如此盛产着记忆。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被抛入穷乡僻壤，移民运动的规模几乎空前绝后。这些青年衣衫褴褛，心身憔悴，辗转于城乡之间，挣扎于贵贱之间，求索于文明与野蛮之间，一任命运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他们常常以日当年地守着油灯企盼，企盼着近乎空白的未来。他们多年后带着心灵的创伤从那里逃离的时候，也许谁也没有想到，回首之间，踉跄之际，竟带走了几乎要伴其终身的梦境。

——摘自散文《记忆的价值》（1990）

## 1 • 12

“文革”后期，我身边有这样几个圈子。

一是我哥的圈子，有工人（唐继智、俞巴立等），有知青（孙志远、姚庆如等）、有知识分子（袁铁山、张玉纲等），有刚出狱的政治犯（周国辉狱龄七年）。他们散居南方各省，却不知如何串成了一堆。他们在吃了上顿也不一定有下顿的年月，一齐对西方思想发烧。“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这就是我对唐某的一点记忆，曾写入一篇散文。

另一圈子由文学爱好者组成。其中有莫应丰，正在写抗议“文革”的长篇小说《将军吟》，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故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知情者贺梦凡、张新奇、贝兴亚、薛浩等既紧张又兴奋，凑粮凑钱支持其写作，常长谈于密室或野外，形迹鬼鬼祟祟。北京出现“民主墙”后，他们终于钻出地表，以“四五文学社”的公开旗号，在省城最热闹的大街上贴出第一批大字报，呼吁为四五天安门运动平反，谴责地方长官在“真理检验标准”讨论中的沉默……构成了当地轰动一时的事件。

当时各地都有这样的“圈子”，后来在北岛（北京）、钱理群（贵州）、徐友渔（四川）、王绍光（湖北）、张志扬（湖北）、张木生（北京和内蒙）、王鸿生（河南）、朱学勤（河南）、多多（北京）、徐晓（北京和山西）、宋永毅（上海）、王希哲（广东）等人的笔下留有痕迹。当事人想必记得清楚，“保”和“造”的界限在此时渐次消溶，民意出现高度的趋同化。即便是一些前造反派对官员仍存抵

触，但对发展经济、开放文禁、革新政治（取消出身歧视、提倡法制与民主等）等，都觉得很对胃口。这样，人人都是变天派，从“四·五”天安门运动，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整个国家几乎实现了一种左右会盟和朝野协力，推进了最大公约数的政治转轨，整个过程低震荡、小阻力、微成本、零死亡。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倡言的“武装起义”，拿到会议室外就风吹云散，没有人愿意真去舞枪弄棒。相比之下，一六八八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一直被誉为资产阶级和平革命的典范，尚有威廉大军一万四千人 and 五百艘船舰远道西征和兵临城下，而中国这次历史大转折以轻易、快速、整齐、全方位的方式实现，不费一枪一弹更像奇迹。

然而，这还是革命吗？

取消“阶级斗争为纲”，全面恢复旧秩序，甚至“一改改到解放前”，重新讨论市场、资本、私有制、个人主义的合理性……这几乎是对革命的全面逆袭。有意思的是，这种逆袭的思想武器、精神能量、斗争经验、运动形式、个人风采等却又无不来自既有记忆，与其说是革命死亡，不如说更像革命变体。上述那些圈子里，人们开口多有马克思主义语录，唱得最多的是《国际歌》。文史哲知识大普及，还有全球视野和抱负天下的炽热能量，显然也来自“文革”中官方主导的理论训练，包括中苏两国之间长期的笔墨论争。俭朴生活、暗号接头，紧紧握手，赋诗言志，秘密制作文宣，决然抛家别子，被捕时昂首挺胸，在红旗、山河、纪念碑、游行队列前心潮起伏……这些流行形象出自小说和电影，有“赤匪”、CP、青年近卫军、西班牙“国际纵队”乃至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影子。

需要提到一篇小说。何士光的《乡场上》被中央理论期刊《红旗》史无前例地转载，成为一时舆论热点。故事是这样：农民冯么爸要为两家孩子的一次纠纷提供目击证言，但不敢得罪肇事一方的罗家，也不敢得罪袒护罗家的曹支书。

在梨花屯乡场上，她（罗家——引者注）却仿佛一个贵妇人了，因为她男人是乡场上食品购销站的会计，是一个卖肉的……得罪了这姓罗的一家，就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你会发觉商店的老陈也会对你冷冷的，于是你夜里会没有光亮，也不知道该用些什么来洗你的衣裳；更不要说，在二月里，曹支书还会一笔勾掉该发给你的回销粮，使你难度春荒……你还要不要在这儿过下去？

因此，冯么爸一开始只能叹气，搓手，咧嘴假笑，装傻充愣，支吾搪塞，在屋檐下双手抱头久蹲不起。情节的转折点是，随着罗、曹两方的威逼或辱骂，他终于说出一些没头没脑的话：

“不消哪个说，（我）就像一条狗！……我穷得无法——我没有办法呀！……大家是看见的……脸是丢尽了……”

他这是怎么啦？人们很诧异，都静下来，望着他。“去年呢，”他接下去说，“……谷子和包谷合在一起，我多分了几百斤，算来一家人吃得到端阳。有几十斤糯谷，我女人说今年给娃娃们包几个粽子粑。那时呢，洋芋也出来了，……那几块菜籽，国家要奖售大米，自留地还有一些麦子要收……去年没有硬喊我们把烂田放了水来种小季，田里的水是满荡荡的，这责任落到人，打田栽秧算来也容易！”

权势一方要求他别东扯西拉绕弯子，于是他接下来的一通怒吼更不着边际：

“我冯么爸要吃二两肉不？”他自己拍着胸膛回答：“要吃！——这又怎样？买！等卖了菜籽，就买几斤来给娃娃们吃一顿，保证不找你姓罗的就是！反正现在赶场天乡下人照样有猪杀，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敞开的，就多这么一

角几分钱，要肥要瘦随你选！……“你又怎样？……老子前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气算是受够了！”

原来他这是给自己打气。依靠农村承包责任制，他突然发现自己吃饭和吃肉都不用求人，那他还怕什么怕？他终于在权贵阶层面前找回了一条挺直的腰杆，说出真实的证言，不仅让在场的乡亲们瞠目，连自己也暗暗吃惊。

这一个短篇赢得满堂彩，显然是触碰了一种普遍心结。责任田不仅找回了财富，更重要的是冲破一种压迫性体制，帮助人们找回了平等和尊严。

当我成为恢复高考的受益者走入大学校园，对革命的逆袭和重续正暗中交错。来不及贫富分化，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分配的滞后现象，在人们日后的记忆里很像普惠的市场经济。动不动就贴大字报，是“文革”余习，在人们日后的记忆里很像西方的民主。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美国白宫南草坪，如盟国英雄一般接受欢呼，被电视节目主持人热情洋溢地介绍，普通中国观众从新闻片中看得更多的，是太平洋那边闪闪发光的车流、立交桥、摩天大厦、航天飞机、自由女神、海边冲浪与帆船、漂亮的妈妈和孩子。几乎无人怀疑，中国改革开放的效果图就该是那样——美国就是共产主义的梦想成真。

我们要什么？全要！  
什么时候要？现在！

法国大学生一九六八年的口号，差不多就是此时国人的心声。事实上，在后来数十年里，如果只有西方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没有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愁苦；如果只有炒楼者们的日进斗金，没有千万青年“房奴”的蜗居；如果只有上流人士乐颠颠的性解放，没有众多农民工的性饥渴和少女卖身；如果只有汗如雨下的劳动致富，没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拼爹”；如果只有举世瞩目的GDP数据，没有河水发臭、毒霾笼罩、土地沙化、假药杀人；如果只有出境游客在境外高档卖场的大举扫货和各大城市的中央金融区CBD，没有河南的“卖血村”和甘肃的“乞丐村”……总之，如果只有市场和资本之利，中国人全心全意学美国赶美国的共识必定毫无争议。

知识界日后的分流，其实源自现实的撕裂。我家以前的一位保姆，全家四口同时在一个国营造船厂下岗，顿时陷入了生存恐慌。我所在单位的一个打字员，全家竟有七人同时下岗，以至这个小妹的职位在互联网出现后无论如何多余，大家也不忍心让她成为第八个。月薪仅一百八十元的保洁工，居然也有很多人抢着来做（1998）。我与作家蒋子龙乘车经过南方某城市一条街道，黑压压的妓女沿途相逼，堵截出一个长长的车队。她们又是敲车窗，又是拍车顶，乒乒乓乓响声四起，好几只小手伸进车窗缝里抓挠。“老板，半价呵，便宜呵。”“哥哥，有发票呢。”“赊账也可以的，今天先打一个感情炮吧。”……

一位女作家说到这些妓女，不以为然地耸耸肩：“那有什么？人家愿意呵，以前想卖身都没机会呢。”

另一次，说到大批失业者，一位从国企老总转型为私商的朋友挤一挤眼皮，笑咪咪地开导我：“放心吧，再过一二十年，该病的病死了，该饿的饿死了，中国的现代化就轻装前进了。”

还有一次，一个著作众多颇负盛名的青年思想家，名头越来越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坚称：“没有比‘平等’更矫情的概念了。”“弱肉强食

的丛林原则从来就是人类正义。”

.....

这还是革命吗？这些人与我有私交，因此说得直白。感谢他们的直白，卸载了话语包装和学理经营，让我一睹真心，并获得某种文字嗅觉。在我此后的经验里，很多文章就是这样，需要读，更需要“嗅”。如果读者能从口号、知识、修饰语、详略取舍、句法结构、标点符号中嗅出一个大活人，当然不难“嗅”出一些雅士好谈的“身体”，是嫖娼的身体却不是打工的身体；一些书生好谈的“文化”，是老爷的文化却不是工匠的文化。窥视豪门的读物到处畅销。炫耀门第的读物备受热捧。广告上充满了“VIP”“富豪”“皇家”“御园”“贵妃”“领袖”一类金堆玉砌的猛词。某些社交场合开始流行时装、名表、豪车、珠宝、古董、高尔夫、列车高包、私家游艇等话题——在这些圈子里，不谈最对的，要谈最贵的。很多奢侈品哪怕不实用、不值当、买不起，也须提前一步全心向往热烈讨论。有人若在此时说不上道，一定很没面子。一个人哪怕再穷酸，哪怕还在为儿女的学费发愁，在这里也得抖擞精神，全神贯注，神采飞扬，挽起袖子上阵，摆出一付候补贵族模样。他们学成有望，每根神经都在预习奢靡，每一丝肌肤都靠拢组织，预支上流社会的阵营感和团结感。

《乡场上》引起的举国喝彩顷刻间被遗忘。

这里不妨回过头来稍加比对——

如果平等只是一个“矫情的概念”，“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从来就是人类正义”，那么以曹支书为代表的一伙强人何可指责？

如果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一大利好是“该病的病死了，该饿的饿死了”，那么以冯么爸为代表的一帮穷鬼何须同情？

如果连一位献身于女权主义的作家也认为，妓女卖身的自由是社会进步应有之义，甚至是对穷人的一份最新赐福，那么卖肝卖肾的自由，卖儿卖女的自由，卖身为奴的自由，卖身殉葬的自由……是否都应被穷人们感恩戴德？是否理应受到工商局、公安局、法院的全面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一条挺直的腰杆莫非是骨质增生，骨形畸变，草民们可笑的多动症？

很多人大义凛然众志成城埋葬“文革”，一转眼却把刚刚找回的平等弃若敝屣，把刚刚迎回来的父老乡亲视若草芥，为“文革”中最不可接受的东西还魂。为此，很多心理障碍需要提前扫除，一些顺耳的话语须配套准备。他们开始在报刊上群殴“道德”，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要求红卫兵道德忏悔，对当权者大加道德谴责，似乎他们可以无德而那些人必须有德，或那些人不妨无德，但坏就坏在形象造假，相当于打着一面错误的旗帜干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脱下羊皮的狼才算得上形象可爱。他们开始在公共讲坛哄抬“欲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要求一切对手老老实实地禁欲，一旦风传那些人也领稿费、有存款、离过婚、穿皮大衣、甚至有私生子，便津津乐道或怒火冲天，似乎那些“人性解放”一点也让他们高兴不起来，隐藏很深的盟友和内应倒是坏了他们的好事。更为天雷滚滚的是，他们恨不得揪住每一个老百姓的耳朵来聆听“平等”之恶，称“人人生而不平等”；“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可能消除、也没有必要消除”（见《什么样的平等才是好东西》，载《领导者》2012年6月总第46期）——这类高见一时间遍布各类媒体。但他们为什么要求曹支书那样的红色权贵必须讲“平等”？依照他们的逻辑，严格依照他们的逻辑，共产党不就是在腥风血雨的大乱之世，靠机会平等、自由竞争然后一举打下江山的“丛林”之王，凭什么要还权于民？饱受了多少苦难，牺牲了多少亲人和同志，包括一颗颗人头被挂在城楼，犹如商战中一个公司投入巨

资，一次次绝处求生，终于把本党的业务做大做强，凭什么要自弃垄断权，把股份和市场份额重新分派？

上述引文的作者不得不稍加补充：“平等限于人权和机会平等，超出这个合理范围，平等就是非正义的……”好吧，顺着他说，不扯什么生存权，我们只说政治人权。问题是，如果这一条可以在列强殖民时无效，在右派军人政变时无效，在王国君主亲美时无效，在所有公司帝国的森严管制下无效……如果这诸多无效被很多知识精英默认，甚至辩护和喝彩，凭什么红色权贵就得毕恭毕敬地拿它真当一回事？“曹支书”们也是人，就不该与殖民列强、政变军头、亲美君王、公司帝国等共享一份“机会的平等”？如果“我是流氓我怕谁”不是一句作家戏言，被很多人当作激动人心的精神大赦，那么“曹支书”们流氓一下就不行？去他的，流氓你一下又怎么啦？

他们太容易被自己的逻辑绕进去，也很像一心把对手教坏。

不用说，对“文革”需要思想清算。对虚夸的“道德”消毒，给合理的“欲望”去污，都有助于人性、人权、人道的合理回归。但人道不是少数人之道。一种再等级化的狂热，一种蔑视人民的贪婪和傲慢，构成了来得太快的精神背叛，其实是对“文革”的暗中翻盘，影子“文革”重新入场。这些自我想象中的头等舱人士，不过是把“文革”资本主义化，把资本主义“文革”化——其精神毒性暂且不说，一次次把自己绕进去的逻辑混乱，如自打自摸，自擦自啐，上半身错接下半身，至少在智商上令人错愕。

一天，我无意间重看了一场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一个女奴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这一舞剧目世之初的“文革”政治背景记忆犹新。但我在剧场里惊讶地发现，当女奴们用手臂挡住鞭击从而掩护琼花逃生，当孤苦无助的女奴被女兵们如林的双手热情接纳，当女战士来到战友就义现场却找不到身影于是向八方天地一遍遍悲诉……一幕幕生死相依的情境，义重如山的表达，击中了观众们的震惊，竟一次次引爆掌声，并有一种反常的经久不息。毫无疑问，这一舞剧正在被重新解读。鼓掌者们在久违的温暖前猛醒，在一种卑贱者解放的绚丽天地里晕眩和飘飞。

我身旁的一位男人擦眼睛。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工人，还是教师、商人、小官吏、刑满释放者，不知道他搓过麻将后，赖过账或逃过税后，对自己的泪水是否感到惊奇。但他一句“样板戏就是好”让我耳熟。他如果跳起来高呼什么口号，也不会令我特别惊讶。我太熟悉江青一手培植的“样板戏”了。我担心那种造神宣传和革命图标化，会再一次收窄观众的眼界，拉低观众的智商，但我怎能无视剧场里的泪水——在经历太多现实中的冷漠与恶俗后，这些观众突然面对悲怆的乐浪，激越的旗帜，纯洁无辜的手足，普天下人人平等的阳光造型，就没有一次热泪夺眶的权利？

这是一九九九年。显然，一种社会再等级化之潮既然恢复了压迫，就必然恢复反抗；既然变相恢复了“文革”的A面，就必然变相恢复“文革”的B面；既然正在营构阶级，就必然召回、激活、强化有关阶级斗争的回忆和想象，把很多人重新送入工农联盟、武装斗争、翻身解放的思想轨道——不少知识精英曾对此深恶痛绝。但这事赖不上别人，赖不上那些老百姓。一出舞剧不过是都市旧梦，遇到合适的现实水土环境便迟早要绽放。

哪怕它也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

——摘自长篇随笔《革命后记》（2014）

## 第五部分 心魂

### 5·01

在你们的歌声中，有大地震晃，山岩崩塌，远古突然迫至眼前。地震啦——天书已翻展，弓弦已张开，血淋淋的牛头高悬于部落的战旗之下，你将向哪里去？苦蕨似的传说遍布整个世界，惊醒每一个时间黑洞之梦，在大漠，在密林，在月色清秀斑驳的宫廷，我究竟在哪里？远古一次划出天地界限的临盆惨叫，使炎黄之血浸入墙基和暗无天日的煤层，浸入阴谋般纠结撕咬并嗡嗡而来的象形文字，你将向哪里去？

洪水滔天洪水滔天，一个人死了，地震了，墙垮了，谁也不能救她。太阳终是遥远，流星落入彩釉，以眼还眼悄声碎语终是须臾，惟时间在年年的谷穗上昭示永恒和太极之圆满那究竟是为了什么？一次次死亡结成人类的永生，指向玉树琼宫，香花芳草，粮山棉海，鸾凤和鸣，善男子善女人携手联袂人面桃花欢歌如潮，那无比实在的辉煌你将向哪里去？

从来就有高原，从来就有星座和洞穴，从来就有剑戟相拔和野渡空舟，从来就有枯涩的儿童之眼和不孕妇女的空镜而蝼蚁般的人流你将向哪里去？墙垮了，地震了，纵使每一页日历都是千万人的忌日，纵使每一条道路都没有终点，纵使禁锢和放纵都行将变质，但你难道不觉得岩层中渗出的回答甘之如饴？善男子善女人在残碑上历历在目以沉默宣告万世之箴言：一切播种都是收获不是收获，一切开始都是重复不是重复，金木水火土那长出了青苔的隆隆人类之声你将向哪里？

——摘自中篇小说《女女女》（1986）

### 5·02

姜凉是我们的祖先，但姜凉没有府方生得早。府方又没有火牛生得早。火牛又没有优耐生得早。优耐是他爹妈生的，谁生下优耐他爹呢？那就是刑天——也许就是晋人陶潜诗中那个“猛志固常在”的刑天吧？

刑天刚生下来时，天像白泥，地像黑泥，叠在一起，连老鼠也住不下。他举起斧头奋力大砍，天地才得以分开。可是他用劲用得太猛啦，把自己的头也砍掉了，于是以后成了个无头鬼，只能以乳头为眼，以肚脐为嘴，长得很难看的。但幸亏有了这个无头鬼，他挥舞着大斧，向上敲了三年，天才升上去；向下敲了三年，地才降下来。这才有了世界。

子孙渐渐多了，家族渐渐大了，到处都住满了人，没有晒席大一块空地。怎么办呢？五家嫂共一个春房，六家姑共一担水桶，这怎么活下去呵？于是，在凤凰的提议下，大家带上犁耙，坐上枫木船和楠木船，向西山迁移。他们以凤凰为

前导，找到了黄央央的金水河，金子再贵也是淘得尽的。他们找到了白花花的银水河，银子再贵也是挖得完的。他们最后才找到了青幽幽的稻米江。稻米江，稻米江，有稻米才能养育子孙。于是大家唱着笑着来了。

奶奶离东方兮队伍长，  
公公离东方兮队伍长。  
走走又走走兮高山头，  
回头看家乡兮白云后。  
行行又行行兮天坳口，  
奶奶和公公兮真难受。  
抬头望西方兮万重山，  
越走路越远兮哪是头？

——摘自中篇小说《爸爸爸》（1986）

## 5 • 03

我们最后看到的世界，与我们最初看到的世界，其实不会有太多不同。太阳照常从东方升起。月亮照常向西方坠落。天空还是那样。群山还是那样。流水还是那样。暮色降临之际的玻璃窗上总是闪烁一些光斑乱影。

以前很多事实际上都成了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在车站握别朋友，最后一次在街头观看窗櫺，最后一次在城南大道打哈欠，最后一次走出四号线的地铁站，最后一次接到物流公司的电话，最后一次开车送客人驶上斜拉索的拱形大桥……你原以为那些事是可以重复的，还有下一次，但你错了。

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早已开始死亡，或说部分的死亡，永别了数以千计的最后的一次，就像一棵树凋落了一片片叶子。

你来自黑暗，又归于黑暗，经历了一次短暂的苏醒。你将回到父亲和母亲那里，回到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那里，回到已故的所有亲人那里，与他们团聚，不再分离。你是不是有一种归家的欢欣？当你想象自己将重返中年，重返青年，重返少年，重返幼年，哗哗的记忆镜头一路闪回襁褓岁月，聚焦于你爬向那个纸飞机的背影，聚焦于小小的后脑勺，只有父母才可能暗记在心的后脑勺，你会不会喜极而啼？

在一个暗夜无边的宇宙里悄然划过，以众多星体为伴，与茫茫尘埃共舞，布下无形的步履和飞翔，漂泊于无始无终的浩瀚和深远——我们还是高高兴兴地接受熄灭吧。退出记忆几乎就是退出清醒，退出失眠症，退出一种过于漫长的失眠症。

这种失眠的结束也许算不上什么代价，但能让我们重归山河大地天长地久，换来我们今后的无时不在和无处不在——这种在，这种最大的在，当然就是“上帝”。

——摘自长篇小说《日夜书》（2013）

我们脚下有疏疏落叶，发出细微的声响。渐渐地感到有凉气袭来，是来自潺潺的溪水。抬起头，除了树冠里点点滴滴的光亮，看不见什么天。青苔也越来越多，简直是天降一场绿雪，把万物都盖绿了。有的深苔铺展在地，又匀又密，厚厚的一层地毯，使人生出要上去躺躺的念头。树枝上还多见苔毛，稀稀拉拉挂着，随风荡来荡去，竟如一匹匹翠纱。

一条铁线虫，又长又细确如铁线，从容不迫地往杂树丛中游去——据说这种虫连树杆都可以箍断，要是箍在腰上或腿上，还不把人切成一片片的香肠？

原始森林里的树，倒不像我们猜想的那么粗大。它们多是细长，只是奇形怪状，而且披挂纷繁——杂有很多枯藤和气根，交错纠缠，扭手扭足的。大概是山里无比寂寞，这些树木都被憋得疯狂了，才会痉挛出这些奇怪模样？

溪流已经瘦弱，时急时缓，时薄时厚，时宽时窄，偷偷摸摸地蹿着。于是溯流而上的我们便不时由寂静走进喧哗，从喧哗走进寂静，再由寂静走进喧哗，一双耳朵忙闲不定。我们常常会遇到巨石，小山一样大小，一块块赫然横堵溪道，看得出是从山壁上垮落下来的。但抬头看去，可见山壁断裂处已复生土层和草木，似伤口已经结疤，长出了新肉，让路人难辨那次惨痛的断裂究竟是如何的久远。而峡谷里遍地的金色野花，想必是当年的轰隆声散溅开去，又从土地里生长出来了。

巨石浸在水里的部分都有褐色的水釉，摸一摸，很滑。当然是石头的阻挡，使水流到了这里不得不旋起水涡，不大容易看清，一个接一个远去，在水底留下一串串黑色的圈影，无声地绽开，又无声地熄灭。

沿着溪道每上升一个高度，就会遇到一个深潭，遇到潭那边的瀑布，还有水帘激起的浪花。我们已经明白了，有深潭的地方必有瀑布，深潭就是瀑布的居室和刀鞘。马子溪就是从山上成梯形一级一级地坠下来的，由一次次粉身碎骨连接成生命。

我们找不到路，只能下潭游过去。水冷得侵骨，让人有掉进冰窖之感，不由自主地打冷噤。要不了多久，入水者就憋得喘不过气来，不仅是全身肌骨麻木，连生殖器也紧缩得极痛。有意思的是，水太清了，人简直是在透明的空中飞舞。潭底的卵石历历在目，似乎伸手可触，但真是一脚踩下去，或一手捞下去，才发现下面空空荡荡，身体与卵石还无比遥远。

阳光射入深潭，在水底的石滩上布下龟纹状的金网，颤动着，飘摇着；又被水面反射到石壁上，蓬蓬勃勃的金光如同升起连绵不绝的火焰。这当然只是浅水区的情形，如再向潭中游去，水下就只有一片绿色了，绿得越来越浓，是一种油腻的绿，凝重的绿，轰隆隆的绿。你也许会觉得，一定是千万座山峰的绿色全部倾注在这个深潭，经过长年的郁积和沉埋，才会凝结出这样一片碧透的恐怖，一片深不可测的幽暗。从这里游过去，我们的腹部显得又嫩又软，毫不设防，有一种从魔鬼嘴边滑过去的感觉。

我发出了尖叫，看见了头上一线天空，还有一只飘忽的岩鹰，突然感到空空的一声水响中，自己已穿越了万载千年。

——摘自短篇小说《诱惑》（1985）

村里人把狗也叫做“呵（读去声）子”。大概他们唤狗的声音是“呵〇呵〇”，应声而来的一团肉就应该是“呵子”了。

**贤爹家的呵子** 贤爹这一天犁完田，还走没到家，就听见田垌对面割茅草的邻居说，你快回去看看，你家的呵子刚才叼回去一只兔子。

贤爹回到家里，没有看见呵子，也没有看见什么兔子，到屋外唤了三声，也没听到呵子的脚步声，不免有些纳闷。这天夜里，呵子很晚没回家，不知道去了哪里。

贤爹后来把这事忘了。十几天后，他翻过两座山，过了三条溪，走了十来里路，到出嫁多年的女儿那里去看看，送上一点糍粑和干笋。他听女儿说，家里的呵子十天前来过了，累得气喘吁吁，尾巴低垂，嘴里叼着一只兔子，当然是给小呵子吃的——就是断奶不久的呵子它儿。贤爹大为奇怪：这狗娘逮住了一只兔子，居然还记着两座大山以外的狗仔？更奇怪的是，女儿把狗仔抱来婆家的时候，狗娘并没有跟着来呵。它如何识得路？如何找到了这一家？如何知道自己的骨肉就在这里？

莫非是它平时听家里人说起这个地方，也听出了个子丑寅卯？

**有福家的呵子** 这条呵子骨架大，从小就长着好多胡须，是个少年老成的武士。它最会看家，平时逢主人不在，见外人上门来了，便不动声色地跟着，既保持警觉，又不失礼貌。外人在这个家里可以坐，可以睡，可以到处看，怎么都行，就是不能触摸任何东西，否则立刻引来它的狂呼乱叫。如果你不赶快撒手，它必定猛扑上来咬住你的一只贼手。

有福带着呵子出门，从不怕丢失什么东西。他干活时在地头脱下一双鞋，一顶草帽，或者停靠一辆脚踏车，呵子立刻蹲在一旁守住，不管主人去了哪里，也不论主人要去多久，它都会寸步不离主人的物品，一直等到主人回来。有一次，有福在田头丢下一张犁，准备第二天犁田，没料到呵子就把犁看住了，以为是什么贵重的宝贝。有福回到家里，很晚还没看见呵子，后来想到了犁，打着雨伞到田边一看，他家呵子果然在瓢泼大雨里守着——其实没有任何贼寇会打一张犁的主意。

有福在县城遇上车祸的时候，呵子在家似乎有什么感应，疯了似地大叫，冲到公路上去见汽车就吠——这是邻居们后来说的。它被一辆车绕过去了，被另一辆车甩下了，但还是对一切流动的钢铁盒子大举进攻。最后，一辆运树木的大卡车来不及刹车，终于把它碾在轮下，成了血淋淋的一摊肉泥。

村民们说，它这是以死“挡煞”，拿自己的命换主人的命。要不然，有福那一天骑摩托被汽车撞出一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可能活着回来的，至少也要落个终身残疾。

有福也相信，自己这条命是呵子给的。他把呵子葬在山上，说自己老了以后也要葬在那里。

**茶盘砚的呵子们** 我跟着村长去茶盘砚清账，刚翻过岭，见到村子的一角，就远远听见一片狂吠。我免不了有些心虚，赶紧在路边折了一根树杆，紧紧捏在手里。奇怪的是，我们进村的时候，那些狗反而一声不吭了，黄的黑的大的小的老的少的一起迎上来，围着我们使劲摇尾巴，嘴里都横叼着一截树枝，像齐刷刷

地都插着一支牙刷，让我颇为奇怪。

我问村长，这些狗为何都叼着树枝？

对方见多不怪，说有这回事么，回头看了看，确认了我说的是实，这才说：这些狗从来都是这样的，看见贼就开咬，看见客就封嘴巴。

一位农妇捂着嘴笑，“它们怕你吓着了！”

我大吃一惊。世上还有这等善解人意的狗？居然像古代的军队衔枚夜行，还懂得以枝封嘴安抚客人？它们是不是经过了某种训练？

村长说：没有呵，茶盘砚的狗都是这样的，生下来就是这样的。

“其它村的狗也是这样么？”

“那倒不一定。有这样的，也有不是这样的。”

我带来的三毛是个洋种，与这些狗一见如故，玩得兴奋异常，很快就与它们打成一片和搅成一团。我原来担心这些狗会欺生，一直给三毛套着狗绳，随时准备将它解救脱险。我没料到呵子们对三毛十分友好：互相嗅嗅屁股，相当于通报姓名；互相摇摇尾巴，相当于握手礼或者贴面礼；一直没吐掉嘴里的树枝，相当于剑入鞘，枪退膛，大炮蒙上炮衣，军队解除战斗状态。有一条大狗是后来的，朝着三毛咧咧牙齿，没有真咬。大概是一时没找到树枝，它急得满地乱窜，后来不知从哪里叼来一根鸭毛，在我们面前转来转去，待我们看清楚了，才意犹未尽地离去。它肯定是要让我们看清它的橄榄枝，明白它和平主义的宣示。

自从到过茶盘砚以后，三毛一有机会就要窜出院门，就要朝茶盘砚方向狂奔，对我的喝止充耳不闻。不过，去就去吧。我现在不太担心它的安全了，因为那一群狗友礼貌周全，不可能伤害客人。

有意思的是，三毛从那里回来的时候，嘴里也叼着一根草，在我面前摇头晃脑，一展它的学习成果。

——摘自长篇散文《山南水北》（2006）

## 5 • 06

我在地图的一个微点里存在过，当过六年的插队知青，至“文化革命”结束才进入另一些微点，比如大学和都市。我在更微点的大楼和更更微点的公寓和更更更微点的房间里突然两鬓生霜。

有人把我的村庄叫做“马桥”。其实“马桥”是我在某篇小说中一个虚构的地名，也是中国农村常见的地名，与我的去向没有特别关系。还有记者说过，我移居乡下是出于对文坛的失望——这是指我卷入了九十年代一场思想冲突，不料招怨于一些论敌，受到媒体上谣言浪潮的狠狠报复。其实，这位记者并不知道，早在风波发生之前，我已在山里号下了宅地，盖起了房子，与报复毫无关系。甚至早在八十年代我进入城市不久，我妻子就在一篇文章里透露：“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现在不说。”——那个秘密其实就是将来返乡的打算。

实在是蓄谋已久。

我生性好人少而不是人多，好静而不是好闹。即便是当知青的时候，除了贫困让人深深焦虑，大自然的广阔和清洁从不让我烦恼，并且在后来很多文学作品中一直是我心中的兴奋。进入城市以来，我梦得较多的场景之一就是火车站，是我一次次迟到误车，是我追着车尾的好一番焦急和狼狈——却不知道我为何要上

这一趟车。我猜想这无非是一种提醒，是命运召唤我去一个未知之地。

我居住长沙或海口的时候，也总是选址在郊区，好像城市是巨大的旋涡，一次次把我甩到了边缘，只要高楼丛立的城市旋转得更快一点，只要我捏住钥匙串的手稍稍一松，我就会飞离一张张不再属于我的房门，在呼啦啦的风暴中腾空而去，被离心力扔向遥远的地方。

一九七一年的农历除夕，我决心逃离农村。深夜的炉火奄奄一息，几位从各地回城探亲的知青围炉聚首，久久地沉默无言，只有长吁短叹。一个胆大妄为的地下圈子，曾投入诗歌、哲学以及有关毛泽东的辩论，眼下已经情绪降温。不知是谁，仍以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宏论：去他妈的农村！我们都应该进城，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才是革命的火车头！

我们几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羞于抱怨农村的艰苦和青春的苦闷，却乐于夸张自己的历史责任。既然喂猪不好玩了，农民夜校不好玩了，小提琴与演出队也不好玩了，那么，“知识分子”四个字真是令人神往。我们不自量力地迅速决议：谁进入哲学，谁进入史学，谁进入外语，谁进入经济学……至于我，年龄最小，什么也不大懂，就捡了文学这个象征性和简易性的差事，如同在总攻击开始时跟着扔石头。

三十年过去了，回想起当年那个浪漫的除夕，回想起当时大家很搞笑的紧紧握手和暗语接头：“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朋友们早已从一部想象的激情政治电影中回到了平庸的现实生活。一语居然成谶：那一次除夕的聚会者，其大多数后来果然成了教授、画家或者作家，完成了地下团伙派定的任务。不过，时代已经大变，市场化潮流只是把知识速转换成利益，转换成好收入、大房子、日本汽车、美国绿卡，还有大家相忘于江湖后的日渐疏远，包括见面时的言不及义。

如果不是餐宴，有些人哈欠连连，甚至找不到见面的借口。“革命”在哪里？“消灭法西斯”和“自由属于人民”是否从来只是一句戏言？

又有一名老知青去世了，是失业以后无钱治病而夭折的。加上以前的两位，已有三名同伴离我而去。这是成功人士圈子以外的事情。更多的工人在失业，更多的农民在失地，更多的垃圾村和卖血村在高楼的影子里繁殖，这也是成功人士圈子以外的事情，而且从来不会中断圈子里的戏谑，甚至不能在宴会上造成哪怕一秒钟的面色沉重。但沉重又怎么样？脸色沉重以后就不再炒卖楼宅、不再收罗古玩、不再出国度假、不再对利益关系网络中所有重要人物小心逢迎了吗？不，生活还是这样，历史还是这样。及时的道德表情有利于心理护肤，但不会给世界增加或减少一点什么。

我感到心跳急促，突然有一种再次逃离的冲动——虽然这一次不再有人相约。我也许该走远一点，重新走到上一次逃离的起点，去看看我以前匆忙告别的地方，看看记忆中一个亮着灯光的窗口，或是烈日下挑担歇脚时一片树荫——是不是事情从那里开始错起？人生已经过了中场，留下大堆无可删改的履历，但我是不是还异想天开地要操着橡皮擦子从头再来？

一个葡萄园里的法国老太婆曾向我嘟哝：“接近自然就是接近上帝。”问题是：我相信上帝吗？相信那个从来只会转移苦难但从来不会消除苦难的上帝吗？相信那个从来只会变换不公但从来不会取消不公的上帝吗？相信那数十个世纪以来一直推动我们逃离但从不让我们知道理由所在和方向所在的上帝吗？

我喜爱远方，喜欢天空和土地，只是一些个人的偏好。我讨厌太多所谓上等人的没心没肺或多愁善感，受不了颇繁交往中越来越常见的无话可说，也只是—

些个人的怪癖。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连自己有时也不喜欢。我还知道，如果我斗胆说出心中的一切，我更会被你们讨厌甚至仇视——我愿意心疼、尊敬以及热爱的你们。这样，我现在只能闭嘴，只能去一个人们都已经走光了的地方，在一个演员已经散尽的空空剧场，当一个布景和道具的守护人。

我愿意在那里行走如一个影子，把一个石块踢出空落落的声音。

这与上帝没有关系。

在葬别父母和带大孩子以后，也许是时候了。我与妻子带着一条狗，走上了多年以前多年以前多年以前走过的路。

——摘自长篇散文《山南水北》（2006）

## 5·07

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我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在城市。我的工作也离不开轰轰城市。但城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越来越陌生，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也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疯，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

“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酒吧里的男女们疲惫地追问，大多找不出答案。就像一台老式留声机出了故障，唱针永远停留在不断反复的这句话，无法再读取后续的声音。这些男女通常会在自己的墙头挂一些带框的风光照片或风光绘画，算是他们记忆童年和记忆大自然的三两存根，或者是对自己许诺美好未来的几张期票。未来迟迟无法兑现，也许永远无法兑现——他们是被什么力量久久困锁在画框之外？对于都市人来说，画框里的山山水水真是那样遥不可及？

我不相信，于是扑哧一声扑进画框里来了。

——摘自长篇散文《山南水北》（2007）

## 5·08

去山上的路越走越窄，越走越荒，越走越静。前十几里路还勉强可以见到人迹。有人挑着竹子，或者是背着雨伞，在曲折小路上下山来，与我们擦肩而过。虽然不相识，但不会没有必要的客套。

“上去呵？”

“下去呵？”

或者由我们先搭腔：

“下去呵？”

“上去呵？”

或者多说几个字：

“挑这么多下去呵？”

“这么早就上去呵？”

不相识的人之间，一路上都是问“上去”或者“下去”，算是没话找话，不交自熟，还有点暗号接头的味道。

过了千石峒，前面就是无人区了，就没有接头暗号了。路边还偶尔冒出一处房舍，但人去室空，留下了房前一片荒草，隐约显现出田埂和小径的轮廓。土坯墙有的坍塌了，有的开裂了，墙根往往布满了青苔。一张主人遗弃的木犁插在地头，眼下已爬满了野藤，如同木犁突然发芽长叶，活过来了一般。

不难想象，前面那条溪边的青石板，以前也有过捣衣的声音，有过黄昏时分耳环或手镯的一闪。前面那座小石桥，以前也有过老牛带着小牛归来，牛背上可能停栖着静静的蝴蝶。这山静林幽之处，以前一定有过灯光温暖的窗口。在明晃晃的月夜或者雪夜，一定还有过纺车或摇篮吱呀吱呀的声音滚过水碾和水堰。但现在这里只剩下露珠依旧滴落，云雾依旧流散，还有腐叶如酱如酒的浓烈气味。连我们的脚步声也过于粗鲁和陌生，吓得一群大鸟扑拉拉惊逃四散，从废墟的断墙飞向山头。

这些鸟还是当年的鸟吗？

独木桥断了的地方，我们得找到浅水处蹚水。遇到杂草封路的地段，我们得抽出随身带来的柴刀，一路砍杀过去，才能接上下一段路。我们幸好没有碰到山蚂蝗。同行的向导告诉我们，以前有人用马驮树木，在这里不幸撞入了蚂蝗阵，结果一匹白马变成了红马，全身被蚂蝗咬得鲜血淋漓。

这里名叫“蚂蟥沟”。

一条云瀑倾泻过来了，很快就注满深谷，使我们淹没在云湖里，前后茫茫，什么也看不见。明知同行者近在咫尺，也只闻其声不见其形。

在离蚂蟥沟不远的地方，我们才得以走出云海，看见了云上的一大片梯田。看来是受制于山的坡度，这些田块都很小，远远看去如密密排列的贝壳或鳞片。一个斗笠或一件蓑衣，就能盖住一丘田。同是受制于坡度，这些梯田的坡墙大多很高，全用墨灰色石块垒成，形如巍巍城墙。行人需要屏息仰视，才能探望到虚虚的城头，看到城头那想象中的旌旗和兵甲，甚至听到那想象中的鸣镝和战鼓。说实话，我当时暗暗吃惊：天下这么大，一些莫知姓名的人们为何要把家园建在这深山一隅？他们是在什么时候筑起了这深山里的巨石阵、金字塔以及万里长城？只为了争得几把谷米，他们在这层层叠叠的石墙里耗费了多少代人的心血和生命？……

每一块石头都相约守密，眼下一声不吭。

很多梯田已经废弃了，听任满田升起疯狂的茅草，还有白茫茫一片如雪盖地的茅絮。我知道秋茅无情，吞没过很多小径，很多足迹，很多风化了了的王国与故事。

——摘自长篇散文《山南水北》（2007）

## 5 • 09

雨天不便外出干活，我只能回到书桌前。如果阴云密布天色太暗，我还得拧开灯，借桌上一角暖光，在雨声中循一些骈句或散章，飘飘然落入古人昏黄的心境。

如果风雨摧折了电线杆，电灯、电话、电脑全部死寂，我就只能点燃一支蜡烛，摸索着探入不见天日的汉朝或唐朝。

我想象古代书生们身居农耕社会，恐怕也多是蜃居乡里，多是晴耕而雨读的。后人如果竖起双耳，也许能听到累累卷帙中的绵绵雨声；如果伸出双手，也许能摸出纸上的潮润和清凉。很多学者说过，较之西洋文化总体上的外趋性，中国传统文化有总体上的内趋性，比如崇“安”，重“定”，好“静”，尚“止”。这安、定、静、止四个字，难道不正是对雨中乡野的恰切写照？不正是古人们凭窗听雨时的情态？

一段中国的箏箫古曲，多有雨声中的幽远。一幅中国的山水古画，多有雨声中的迷蒙。一大堆中国古代的哲学，其所谓“自足”、“求诸己”、“尽其在我”一类命题，作为几千年文明的意旨内核和情感基点，当然是事出有因。所谓情由境生和感由事发，它们也许都来自作者们在雨声中的独处。

孟子有过“夜气”一说，以为一个人入夜最容易得气，最容易入道，最容易通神。在孟子看来，昼喧而夜静，昼俗而夜雅，昼巧而夜朴，万籁俱寂之时，夜晚脱落了白昼的红尘，是一个人明心见性的最佳时机。其实，如果孟子不是有钱人，如果他还有田土需要劳作打理，每天累得一入夜就哈欠滚滚目光迷离，就可能还会谈谈“雨气”的——他将知道，农民不一定有夜闲，但大多有雨闲；不一定有夜思，但大多有雨思。古人的各种知识和感怀很可能在雨声里诞生。

——摘自长篇散文《山南水北》（2007）

## 5 • 10

思辨者如果以人生为母题，免不了总要充当两种角色：他们是游戏者，从不轻诺希望，视一切智识为娱人的虚幻。他们也是圣战者，决不苟同惊慌和背叛，奔赴真理从不会趋利避害左顾右盼，永远执著于追寻终极意义的长旅。因其圣战，游戏才可能精彩；因其游戏，圣战才更有知其不可而为的悲壮，明道而不计其功的超脱——这正是神圣的含义。

——摘自随笔《圣战与游戏》（1994）

## 5 • 11

小学问可做，大学问不可做。历史上那些文化巨人，不代表一般的学问和知识。他们哪怕从事枯燥的思辨和考据，生动的原创力也来自生命的深处，透出人的血温、脉跳、价值观以及亲切的情感，成为一种人生的注解和表达，带着鲜明的个人烙印。文与人一，文如其人，风格即人，文学就是人学……凡此等等的评

鉴，曾经指示了典范的特征。

古往今来的人文济济百家，但如果稍加辨认，那些保持着恒久影响力的作品，决非小聪明和技巧所能支撑。学问越研究到后来，越接近未知和创造的高寒区，就越需要生命力的燃烧，智慧和情怀融为一体。对于那些人文先驱来说，他们在孤灯长夜里面临的重大选择，不是想什么的问题，而是愿意想什么的问题——情感和人格总是成为思维的路标；不仅是怎么想的问题，更是怎么活的问题——“想法”是“活法”的同义语。

——摘自随笔《心想》（1994）

## 5 • 12

禅者假如在富贵荣华面前“无念”，诚然难得和可爱。但如果“无”得什么也不干，就成了专吃救济专吃施舍的寄生虫，没什么可心安理得的。在另一方面，对压迫者、侵略者、欺诈者误用“无念”，也可能是对人间疾苦一律装聋或袖手，以此为所谓超脱，其实是冷酷有疑，怯懦有疑，麻木有疑，失了真性情，与佛门最根本的悲怀和宏愿背道而驰。

佛魔只在一念，一不小心就弄巧成拙。就大体而言，密宗更多体现了佛与道“用”的结合，习密容易失于“用”，执迷神秘之术；禅宗则更多体现了佛与道“体”的结合，习禅容易失于“体”，误用超脱之道。

人们行舟远航，当以出世之虚心做入世之实事，提防心路上的暗礁险滩。

——摘自随笔《佛魔一念间》（1994）

## 5 • 13

佛的大我品格，与其说是人们的愿望，不如说是一种客观自然，只是它如佛家说的阿赖耶识一样，能否呈现须取决于具体条件。

与物理学家们的还原主义路线不同，优秀的心理学和生命学家当今多用整体观看事物。他们突然领悟：洞并不是空，而是环石的增生物。钢锯不是锯齿，而是多个锯齿组合起来的增生物。比起单个的蚂蚁来，蚁群更像是一个形状怪异可怖的大生物体，增生了任何单个蚂蚁都不可能有的智力和机能，足以承担浩大工程的建设（见B·戴维斯：《上帝与新物理学》）。这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同理，单个的人如果独居荒岛或森林，只会退化成完全的动物。只有组成群类之后，才会诞生语言、文化、高智能，还有精神——它来自组合、关系、互助、共生、或者叫做“场”一类无形的东西。

这样说意味着，人类的精神或灵魂就只有一个，是整体性的大我，由众生共有，随处显现，流转于传说、书籍、博物馆、梦幻、电脑以及音乐会，古今仁人志士不过是它的亿万化身。

精神既来自整体，必向心于整体，向心于公共社会的福祉，成为对全人类的宽广关怀。因此，把人仅仅理解为“个人”是片面的，至少无助于我们理解精神。既然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那么精神就是这个“大于”之所在，至少是这种所在之

一。由此可知，“个人”的概念之外，还应该有一个“群”的概念。所谓入魔，无非是“个人”性浮现，只执利己、乐己、安己之心，难免狭促焦躁；所谓成佛，则是“群”性浮现，利己利人、乐己乐人、安己安人，顿入物我一体善恶两消的圆明境界。

——摘自随笔《佛魔一念间》（1994）

## 5 • 14

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道德与事功，关于幸福与死亡……在一般的当代知识谱系里，这些悬问是虚学而非实学，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凯撒，在一个越来越务实的知识界那里日渐处于边缘位置，其正当性正在被经济、社会、历史等学科的诸多人士怀疑。

但这些逼问人皆有之，在当下甚至人皆累之，正是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深刻运动的产物，本身就是实学不可忽略的部分。离开了这一切心灵的牵挂，忽略了人类精神运行的坐标和轨迹，任何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知识都只适用于机器人，无法描述活生生的生命实践。

孔子从“洒扫应对”通向他的治国安邦，是以人为本的；柏拉图视人格为“内在政治制度（inner political system）”，从人格剖析开始他的社会设计，甚至是以心为本的——这些先贤在求知中内外并举虚实相济，并不像某些后人想象的那样幼稚。

当然，世上没有抽象而普适的人，没有抽象而普适的心，就像形形色色的病以外并没有一种标准化的“病”。如果剥离了具体人心形成过程中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寻求一种放之四海或放之万世而皆准的“我”，只能是一种常见的语言事故——无非是“我”这个词让人真以为有了这样一个东西，可以将其抽出来孤立地求解，可以将其供起来放心地依恃。

有人已经这样做过。他们求解生命终极之 being（所是，所在），求解一切知识的元知识，一切学科的元学科，如同要谋得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结果无不滑入迷宫般的 nonbeing（虚，虚无）。这是虚学最容易落入的陷阱。他们如果没有成为西方式的神学家，囿于一种专断的虚无；就会成为中国式的玄学家，溺于一种圆通的虚无。而纵欲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等等并不能因此得到理性地克服，原因很简单，除非自杀，虚无是无法操作的——当心灵独守虚无之际，一旦进入社会行为的操作，这份虚无就一无所用了，心灵就自动缺席和弃守了，让位于世俗的随波逐流乃至无所不为，是最可能的结局。

盛产神学的地方多见偏执和战争，盛产玄学的地方多见苟且和腐败，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摘自随笔《心学的长与短》（2003）

## 5 • 15

说善心不一定出善行，这当然很对。说善行不一定结善果，这当然也很对。

说恶是文明动力，说道德不免历史化演变，再说到善恶相生和善恶难辨因此道德无定规……这在某一角度和某一层面来看，无疑更是大智慧，比“心灵鸡汤”更有学术含量和精英品味（坦白地说，我也受益不少）。

不过，用诗化哲学、文化研究、语言分析、解构主义等把道德讨论搅成一盆糨糊以后，才子们总还是要走出书房的，还是要吃饭穿衣的。书房里的神驰万里，无法代替现实生存的每分每秒。比方说，一位才子喝下毒奶粉，会觉得这是善还是恶？会不会把毒奶粉照例解构成好奶粉？会不会把奶粉写入论文然后宣称道德仍是假命题？会不会重申幸福不过是一种纯粹主观的意见和叙事法，因此喝下毒奶粉同样可以怡然自得？……书本上被他们争相禁用的二元独断论，在此时此刻却变得无法回避。套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

喝，还是不喝，是一个问题。

生气，还是不生，是后现代主义无法绕过的学术大考。

独断论确实应予慎用。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面子对有些人而言是利益，对另一些人而言不是利益。交响乐是有些人生命的所在，在另一些人那里却不值一提。由己推人不等于认可一厢情愿，但无论利益可以怎样多样化、主观化以及感觉化，无论文化可以怎样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只要人还是人，还需要基本的生存权和尊严权，酷刑和饿毙在任何语境里也不会成为美事，鲁迅笔下的阿Q把挨打当胜利，也永远不会有合法性。

这就是说，“由己推人”向文化的多样性开放，却向自然的同一性聚结；向善行方式的多样性开放，却向善愿动机的同一性聚结——多样性中寓含着同一性。对当代哲学深为不满的法国人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将这种同一性称之为“一个做出决定的固定点”和“无条件原则”（见《哲学与欲望》）。他必定痛切地知道：离开了这一点，世界上的所有利他行为统统失去前提，于是任何仁慈都涉嫌强加于人的胡来，而任何卑劣也都疑似不无可能的恩惠。同样，离开了这一点，本能的恻隐，宗教的信仰，理性所规划和统计的公益，都成了无事生非。

——摘自随笔《重说道德》（2010）

## 5 • 16

我梦见了父亲。

我两鬓染白，他却一点没有变，更像是我的兄弟。他坐在我的床头微笑，说他留下了一件珍宝，可让我一辈子受益无穷，就埋在后山上小树林里。“你去寻找时记得戴上草帽。”……我惊醒过来，发现床头空空，窗外树影如常，院子里月光遍地，只有墙根的几只秋虫不时鸣唱。

对不起，我已经越来越少想到父亲了。

我在月光中坐了很久，才想起两件事：

一是他生前最后的一个夏天里，他带上我随其他的叔叔伯伯一道，去乡下帮助农民抢种抢收。他看见我能挑起80斤重的一担稻谷，笑眯眯地说：毛伢长大了，真是长大了。这天夜里，我在睡梦中醒来，发现他一直坐在竹床边，用蒲扇给我赶走蚊子，另一只手在我黑黝黝的背脊上抚摸——他知道这是我的最爽。

二是他的一张椅子，那种寻常多见的藤围椅，色泽晦暗，骨架变形，扶手处

还缠了些旧布条。父亲去世后，为贴补家用，母亲与我不得不把它送入旧货典当行。店主不情愿地收下了它，把它搬到货品区，与那些不知来自何处的旧衣柜、旧书桌、旧梳妆台、旧挑箱、旧脸盆架混在一起。它形单影只，孤苦无助，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旧货家族，很快被一座气焰骄横的太师椅骑压，发出咯吱咯吱的呻吟。在那一刻，我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觉得它就是我的父亲，从此天各一方，再也不可能重聚。儿子背脊上的那一只手永远消失。

.....

梦中的父亲是要告诉我什么？我很快想起来了，这只梦似曾相识，像是恍惚移植了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个故事，我年少时听父亲读过的。书上这样记载：托尔斯泰五岁那年，大哥尼古拉告诉他一个秘密，称有一个办法能使世界上不再有贫穷、残疾、屈辱以及仇恨，让所有人都过上幸福生活。这个办法已被他刻写在一根小绿棒上，埋入了屋后那一片森林。

从那天起，直到大哥英年早逝，托尔斯泰对神秘的绿色小棒一直神往不已，寻找——成了这位少年最热衷的冒险和辛劳。很多年后，很多年后，最终没找到小绿棒的托尔斯泰留下遗嘱，让后人把他安葬在那片树林，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庄园深处。死者想必是要把少年的寻找永远继续下去。

“小绿棒”可能不过是尼古拉的一个梦，一个永不可及的天国。但一种累月经年的寻找引领了弟弟托尔斯泰，造就了弟弟托尔斯泰，造就了千万万托尔斯泰这样的寻找者——这个世界从此就不再是原来的世界，生活就不再是原来的生活，你就不是原来的你。我猜想，梦中的父亲可能是想告诉我，“小绿棒”还在那里，“小绿棒”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小绿棒”就是对“小绿棒”的寻找本身——谁说这不就是最有操作性、现场感、生活气息、日常体温的理想之约？对于托尔斯泰们而言，这种顽强的寻找不能赏下天堂，但封堵了地狱；无法消除社会病菌，但造就了社会抗体。换句话说，一种理想的持久引力，激发出源源不断的感受、知识、思想、运动、制度、实践策略……如果这一切不能实现社会最优，但已成功地阻止了社会较坏——谁能说这不就是意义？

夜色流出了苹果林，  
脚下的秋叶沙沙响……

我来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找到一个长方形的小土堆，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没有十字架，甚至连死者的名字都无从得知。我在这里肃立片刻，聆听俄罗斯大地幽深的秋天，见一些游客迎面走来，擦肩而过，是一对对恋人，或三五结伙的退休者。我很想向这些萍水相逢的陌生面孔问一句：

“你知道小绿棒的故事？”

——摘自长篇随笔《革命后记》（2014）

5 • 17

文学有什么用？我理解这些提问者，包括一些犹犹豫豫考入文科的学子。他们的潜台词大概是：文学能赚钱吗？能助我买下房子、车子以及名牌手表？能让我成为股市大户、炒楼金主以及豪华会所里的VIP？

我得遗憾地告诉他们：不能。

基本上不能——这意思是说除了极少数畅销书，文学自古就是微利甚至无利的事业。而那些畅销书的大部分，作为文字的快餐乃至泡沫，又与文学没有多大关系。街头书摊上红红绿绿的色情、凶杀、黑幕、财运……一次次能把读者的钱掏出来，但不会有人太把它们当回事吧。

不过，岂止文学利薄，不赚钱的事情其实还很多。下棋和钓鱼赚钱吗？听音乐和逛山水赚钱吗？情投意合的朋友谈心赚钱吗？泪流满面的亲人思念赚钱吗？少年幻想与老人怀旧赚钱吗？走进教堂时的神秘感和敬畏感赚钱吗？做完义工后的充实感和成就感赚钱吗？大喊大叫奋不顾身地热爱偶像赚钱吗？……这些事非但不赚钱，可能还费钱，费大钱。但如果没有这一切，生活是否会少了点什么？会不会有些单调和空洞？

人与动物的差别，在于人是有文化的和有精神的，在于人总是追求一种有情有义的生活。换句话说，人没有特别的了不起，其嗅觉比不上狗，视觉比不上鸟，听觉比不上蝙蝠，搏杀能力比不上虎豹，但要命的是人这种直立动物比其它动物更贪婪。一条狗肯定想不明白，为何有些人买下一套房子还想圈占十套，有了十双鞋还去囤积一千双，发情频率也远超生生殖的必需。想想看，这样一种最无能又最贪婪的动物，如果失去了文明，失去了文明所承载的情与义，算不算十足的劣等物种？是不是连一条狗都有理由耻与为伍？

人以情义为立身之本，使人类社会几千年以来一直有文学的流淌。在没有版税、稿酬、奖金、电视采访、委员头衔乃至出版业的漫长岁月，不过是靠口耳相传和手书传抄，文学也一直生生不息蔚为大观，向人们传达着有关价值观的经验和想象，指示一条澄明的文明之道。这样的文学不赚钱，起码赚不出什么李嘉诚和比尔·盖茨，却让赚到钱或没赚到钱的人都活得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因此它不是一种谋生之术，而是一种心灵之学；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修养。把文学与利益联系起来，不过是一种可疑的现代制度安排，更是某些现代教育商、传媒商、学术商等等乐于制造的掘金神话。文科学子们大可不必轻信。

在另一方面，只要人类还存续，只要人类还需要精神的星空和地平线，文学就肯定广有作为和大有作为——因为每个人都不会满足于动物性的吃喝拉撒，哪怕是恶棍和混蛋也常有心中柔软的一角，忍不住会在金钱之处寻找点什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呼吸从容、目光清澈、神情舒展、容貌亲切的瞬间，在心灵与心灵相互靠近之际，永恒的文学就悄悄到场了。人类文学宝库中所蕴藏的感动与美妙，就会成为你眼前的新生之门。

——摘自随笔《心灵之门》（2009）

## 5 • 18

月亮是别在乡村的一枚徽章。

城里人能够看到什么月亮？即使偶尔看到远远天空上一丸灰白，但暗淡于无数路灯之中，磨损于各种噪音之中，稍纵即逝在丛林般的水泥高楼之间，不过像死鱼眼睛一只，丢弃在五光十色的垃圾里。

由此可知，城里人不得不使用公历，即记录太阳之历；乡下人不得不使用阴历，即记录月亮之历。哪怕是最新潮的农村青年，骑上了摩托用上了手机，脱口

而出还是冬月初一腊月十五之类的记时之法，同他们抓泥捧土的父辈差不多。原因不在于别的什么——他们即使全部生活都现代化了，只要他们还身在乡村，月光就还是他们生活的重要一部分。禾苗上飘摇的月光，溪流上跳动的月光，树林剪影里随着你前行而同步轻移的月光，还有月光牵动着的虫鸣和蛙鸣，无时不在他们心头烙下时间感觉。

相比之下，城里人是没有月光的人，因此几乎没有真正的夜晚，已经把夜晚做成了黑暗的白天，只有无眠白天与有眠白天的交替，工作白天和睡觉白天的交替。我就是在三十多年的漫长白天之后来到了一个真正的夜晚，看月亮从树阴里筛下的满地光斑，明灭闪烁，聚散相续；听月光在树林里叮叮当地飘落，在草坡上和湖面上哗啦哗啦地拥挤。我熬过了漫长而严重的缺月症，因此把家里的凉台设计得特别大，像一只巨大的托盘，把一片片月光贪婪地收揽和积蓄，然后供我有一下没一下地扑打着蒲扇，躺在竹床上随着光浪浮游。就像我有一本书里说过的，我伸出双手，看见每一道静脉里月光的流动。

童年里的北斗星在这时候出现了，妈妈或奶奶讲述的牛郎织女也在这时候出现了，银河系星繁如云星密如雾，无限深广的宇宙和无穷天体的奥秘哗啦啦垮塌下来，把我黑古隆冬地一口完全吞下。我是躺在凉台上吗？也许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太空人在失重地翻腾？也许我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婴儿在荒漠里孤单地迷路？也许我是站在永恒之界和绝对之境的入口，正在接受上帝的召见和盘问？……

我突然明白了，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

——摘自长篇散文《山南水北》（2006）

## 5 • 19

我其实刚刚诞生。无论我活了多久，一旦面对浩瀚无际的星空，我就知道自己其实刚刚抵达。

我还是一个粉粉的肉团，站不起来，更不能迈步，但我已睁开了双眼，看到了一片徐徐洞开的光明，迎来了一个万物涌现的眩目之晨。

这个陌生的世界实在太奇妙。一朵花居然是红色的，另一朵花居然是蓝色的，更多的花居然是黄色、紫色、橙色、粉色的，让人目不暇接。一片叶子居然是三角形的，另一片居然是八角形的，更多的叶子居然是蹄形的，剑形的，扇形的、线形的、瓢形的。天啦，一个动物居然有灵活的尾巴，另一个动物居然有神奇的翅膀，还有一些东西居然可以在海洋中潜游，在草原上奔跑，在泥土里掘进，千奇百怪的式样，该出自何等精巧的设计。再看看，天上居然有一个灿烂的发光体，人们叫它太阳，方便人们白天的劳作和行游。天上居然还有一个温柔的发光体，人们叫它月亮，方便人们夜晚的休息、闲聊以及遐想。太奇怪了，我从未见过这种地方，一条条江河波光闪烁地流淌，慷慨滋润着土地和庄稼。我也从未见过这种地方，春风及时化解冰封，秋露及时浇灭酷热，生命中最珍贵、最甜美、最温柔的空气，竟是透明无形，无偿地随风而至浩浩荡荡，公平地抚慰每一颗嫩芽和每一个婴儿。

那是什么？那种直立行走的活物是人吗？那些天真的、妩媚的、刚毅的、慈

祥的并且唯一能哭泣的动物，就是叫做人类的东西吗？哒哒嗒，嗒哒哒，乖乖隆的个咚——难怪一个孩子会发出如此含糊不清的惊叹。难怪这个孩子会着迷于人类鲜艳的薄片（叫做衣服吧）、温暖的盒子（叫做房屋吧）、躺在地上也能奔跑的巨大铁链（叫做火车吧）、飞向天空的一只只银色大鸟（叫做飞机吧），对这一切惊讶不已，深感困惑，觉得完全不可思议。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堂吗？

当然就是你们的天堂。

多么美好。

——摘自长篇小说《日夜书》（2013）

## 5 • 20

将来还会有夏天，还会有蝉鸣和绿荫，还会有阳光下的行人，但我们将在那个世界里缺席，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将来的欢喜或忧愁，和平或战争，富裕或贫困，正义或不义，似乎也与我们没有关系。对不起，我们即将互相忘记。对不起。我们即将互相丢失。我们免不了也会改头换面，最终松开对方的手。在此之前，让我还有悄悄感激的机会。

——摘自长篇散文《山南水北》（2006）

## 5 • 21

将来有一天，我在弥留之际回想起这一辈子，会有一些感激的话涌在喉头。

我首先会感谢那些猪——作为一个中国南方人，我这一辈子吃猪肉太多了，为了保证自己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蛋白质，我享受了人们对猪群的屠杀，忍看它们血淋淋地陈尸千万，悬挂在肉类加工厂里或者碎裂在菜市场的摊档上。

我还得深深地感谢那些牛——在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前，它们一直承受着人类粮食生产中最沉重的一份辛劳，在泥水里累得四肢颤抖，口吐白沫，目光凄凉，但仍在鞭影飞舞之下埋头拉犁向前。

我不会忘记鸡和鸭。它们生下白花花的宝贝蛋时，怀着生儿育女的美丽梦想，面红耳赤地大声歌唱，怎么也不会想到无情的人类会把它们的梦想一批批劫夺而去，送进油锅里或煎或炒，不容母亲们任何委屈和悲伤的申辩。

……我还会想起很多我伤害过的生命，包括一只老鼠，一条蛀虫，一只蚊子。它们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么？如果人类有权吞食其它动物和植物，为什么它们就命中注定地没有？是谁粗暴而横蛮地制定了这种不平等规则，然后还要把它们毫不过分的需求描写成一种阴险、恶毒、卑劣的行径然后说得人们心惊肉跳？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一种富足、舒适、安全的生存，我与我的同类一直像冷血暴君，用毒药或者利器消灭着它们，并且用谎言使自己心安理得。换句话说，它们因为弱小就被迫把生命空间让给了我们。

如果要说“原罪”，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原罪。

我们欠下了它们太多。

我当然还得感谢人，这些与我同类和同种的生命体。说实话，我是一个不大喜欢人类的人道主义者。我不喜欢人类的贪婪、虚妄、装模作样、贵贱等级分明、有那么多国界、武器以及擅长假笑的大人物和小人物，但我一直受益于人类的智慧与同情——如果没有这么多人与我相伴度过此生，如果没有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创造，我至少不会读书和写作，眼下更不会懂得自省和感激。我在这个世界上将是一具没心肝的行尸走肉。

现在好了，有一个偿还欠债的机会了——如果我们以前错过了很多机会的话。大自然是公正的，最终赐给我们以死亡，让我们能够完全终止索取和侵夺，能够把心中的无限感激多少变成一些回报世界的实际行动。这样，我们将会变成腐泥，肥沃我们广袤的大地。我们将会变成蒸汽，滋润我们辽阔的天空。我们将偷偷潜入某一条根系，某一片绿叶，某一颗果实，尽量长得饱满肥壮和味道可口，让一切曾经为我们做出过牺牲的物种有机会大吃大喝，让它们在阳光下健康和快乐。哪怕是一只老鼠，一条蛀虫，一只蚊子，也将乐滋滋享受我们的骨血皮肉，咀嚼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它们最终知道人类并不是忘恩负义的家伙，总有一天还能将功补过，把迟到的爱注入它们的躯体。

死亡是另一个过程的开始，是另一个光荣而高贵的过程的开始。想想看吧，如果没有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将是一次多么不光彩的欠债不还。

——摘自长篇散文《山南水北》（2006）

## 言说的芬芳

——读张枣的《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

江弱水

这一组十二首的十四行诗《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大概是当代汉语诗中最复杂的作品了。它的复杂性也跟张枣写作本身的复杂性相关。张枣是个语言天才，英文和德文都非常好，也懂法语和俄语，都有相应语种少量的诗歌翻译。而且，他从八十年代就开始有意识地从西方汲取资源和能量，想获得一种既感性又沉思的角度来写作。他也说自己是一个很用功的练功者，看待诗非常严肃，甚至严重，作品总是改了又改，又特别在意别人的意见，越到后来，眼界越高，出手也就越矜持。由于这非同一般的语言能力、感受能力和思考能力，张枣知道世界上最好的诗歌本来的样子是什么，而他又真的有使命感。事实上，把张枣的诗拿出来，其复杂精微的深度，一般作者不能比。所以我们这次来讲《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其实是找了一个最困难的文本来解释。但我们读诗，解释诗，如果绕开那种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文本，是不行的。问题是，正如张枣所说，“文学传达的不是意义，而是语言的感觉。”（《关于〈长干行〉及其庞德英译本》）他的诗就特重感觉，是活的句子。我们解释他的诗，便要参活句，而不能死在句下。

题目《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会让我们想到里尔克，想到帕斯捷尔纳克，想到《三诗人书简》。那两位伟大诗人，跟茨维塔伊娃曾经有过爱情的对话。1926年，51岁的里尔克临死的那年，43岁的茨维塔伊娃，经过帕斯捷尔纳克的转介，跟里尔克通信，以狂热的崇拜与爱。里尔克也喜欢她，但到死也未曾谋面。而在此之前，帕斯捷尔纳克就已经热爱茨维塔伊娃了，而且维系了一生。茨维塔伊娃一生恋爱无数，这属于非常特殊、非常强烈的精神现象。但这样三个二十世纪最优秀的诗人之间的精神的爱，尤其为人们所珍视。现在，诗人张枣虚拟了一场跟茨维塔伊娃的跨时空对话，正是沿袭了这样一个诗的家族史的传统。

但是，如果我们对茨维塔伊娃本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背景事件一无所知，也不可能读懂这首诗。你得知道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红色恐怖，二十年代的内战，三十年代的肃反。1922年茨维塔伊娃因为丈夫的白军履历而流亡柏林和布拉格，在巴黎过了十四年贫寒困顿的生活。到了1939年又回到苏联，正值斯大林的大清洗达到顶点，数不清的老布尔什维克和老红军都被从肉体上消灭了，文人作家也死了一大堆，比如巴别尔、曼德尔施塔姆。偏偏这个时候，茨维塔伊娃回去，苦不堪言，丈夫被处死，女儿被判监。过了两年，到了1941年，她在一个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自杀了。

—

《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有一个法文题注，C'est un chinois, ce scra lang. 来自茨维塔伊娃的回忆录里面的一章，就叫《中国人》。这句话意思是：“这是个中国人，他有点慢。”接下去来看第一首诗：

亲热的黑眼睛对你露出微笑，/我向你兜售一只绣花荷包，/翠青的表面，凤凰多

么小巧，/金丝绒绣着一个“喜”字的吉兆——

这么多的中国元素，当然是一个黑眼睛的中国人。但《黑眼睛》又是著名的俄罗斯民歌，一首驰名世界的爱情歌曲：“那双黑眼睛，炽热勾人魂，那双黑眼睛，妩媚又动人。我多迷恋你，却又怕见你，莫非见到你，不是好时辰……。”这既符合招人喜欢的诗人张枣的自信——没有这一自信，他如何能够让自己侧身于同茨维塔伊娃对话的著名诗人的行列？——又切合整组诗主题之一的爱的感应。

这一个兜售荷包的黑眼睛中国人，在茨维塔伊娃的回忆录有详细的描述。有一次，她去邮局，看到一个中国人把头探在窗口上，手里晃动着一个钱包，向邮局小姐兜售，要价三法郎。邮局小姐愿出两法郎。两人语言不灵光，茨维塔伊娃就居间翻译。买卖成交了。中国人得知茨维塔伊娃是俄国人，便用半通不通的俄语说自己去过莫斯科，去过列宁格勒。茨维塔伊娃由此想到，在莫斯科阿尔巴特街上曾经撞到一个中国女人，要用五卢布卖给她一个银手镯。

从莫斯科到巴黎，这些带点乞丐和偷儿性质的中国人是从哪儿来的？《清稗类钞》乞丐类上有一则“兴国人行乞至欧”，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说是光绪年间，朝廷移湖北兴国州（今天的阳新县）数万贫民实边，到了黑龙江。当局安置不当，结果很多人都沦落为乞丐。“久之，闻外国之富，易于谋生也，遂沿西伯利亚铁道之轨线，步行以赴欧。……自是至俄，寻辗转至法，盖皆有陆路之可遵也。”辛亥年间有中国留学生到巴黎，还看见破衣烂衫的男女同胞卖艺行乞，有的持槌打鼓，有的飞刀使舞。细听口音，还听得出是湖北兴国州人。

### 你再听不懂我的南方口音

张枣是湖南人。茨维塔伊娃当日遇见的，也许就是那些湖北人的后代，被张枣这个湖南人移花接木了去。人的历史，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人的命运，也是明镜双开，相互映照。天涯沦落的中国人唤起了茨维塔伊娃的漂泊感，漂泊无依的茨维塔伊娃又唤起了诗人张枣的放逐感。于是，茨维塔伊娃在巴黎偶遇的黑眼睛的中国人，被他的诗人同胞借壳上市，借尸还魂，设置出这么一个场景，将自己带进去，同病相怜，同命相依，深刻地写出了人类在不同处境下生命的交感。

像我们走出人行道，分行路畔/你再听不懂我的南方口音；/你继续向左，我呢，蹀躞向右。/不是我，却突然向我，某人/头发飞逝向你跑来，举着手，/某种东西，不是花，却花一样/递到你悄声细语的剧院包厢。

除了最后一句，都是茨维塔伊娃曾经的事实。她带着儿子穆尔，跟那个中国人，出了邮局，在汽车川流不息的十字路口等了好一会儿。终于过了马路，“他要向右拐，我则向左拐。”走过几步之后，中国人突然哎呀呀叫着跑过来，“头发飞逝”（茨文写的是“马鬃式头发”），手里挥动着一朵花，塞到小穆尔手里。

在诗中，花儿一样的东西，不是塞到小穆尔手中，而是递到茨维塔伊娃悄声细语着的剧院包厢。这一替换很契合茨维塔伊娃跟剧院的密切关系。十八岁时她就曾经因为失恋而带一把手枪去剧院试图自杀；十月革命后更是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打得火热，还写过几出诗剧。

某人不是我，却向我，又向你跑来。不注意看不出来，诗人依托的那个真实

发生的中国人故事，稍一挪移，就幽灵般出现了不合逻辑的魅影。我，现在逆情悖理地分了身：某人，不是我，又正是我，向我，又向你，跑来。这里涉及到张枣诗学的一个关键：主体的分化与转化。也就是几位评论者先后指出过的，戏剧性的人称变化技巧，互为主体性地戴着不同面具的歌唱：“他不是单面人，而是具有双向度或多向度的人”（柏桦）；“他诗中的虚拟主体在转换自如的各种场景讲话，布设玄妙机境”（宋琳）。这个问题我们接下去会不断讲。就现在这个“某人”来说，他（其实就是诗人带入的我）同时向你也向我、向左也向右的这一跑，就把茨维塔伊娃书写的那则本事的滞重的外壳跑脱了，轻盈地钻入了纯粹的诗的空气里。

某种东西，不是花，却花一样。诗人现在把茨维塔伊娃那则本事中的真实的花朵也扔掉了，那么他递来的是什么？我的解释是，这递来的正是一束语词，是悄声细语，是剧院里的声音，说穿了，是诗，而且就是这一组诗。“不是花，却花一样”，请记住马拉美的名言：诗的花，是把一切已知的有形的花都交付给遗忘后，从所有的花都不具备的东西之中音乐般地升华出来的。张枣深谙这个道理，也反复在讲这个道理：“一个词在准确命名后，本身就存在一个词的物质的消逝和意义的升起这样的过程。”（《〈野草〉讲义·〈秋夜〉讲评》）这又涉及到张枣诗学的另一个关键：词成为物、以词替物的暗喻写作。“去精确命名的词，有着被命名之物的真实质地”（《文学义……现代性……秋夜》），“对写作本身的觉悟，会导向将抒情动作本身当作主题”（《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这就是他的元诗理论。元诗即关于诗本身的诗，关于写作本身的写作。任何写作都是自我指涉的。这两行诗就是一种自我指涉：我，一个黑眼睛的中国诗人，给茨维塔伊娃献上这首《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敬请笑纳。

这种自我指涉所在皆是，比如我们没有讲到的中间两行：

两个？NET，两个半法郎。你看，/半个之差会带来一个坏韵

NET 相当于俄语的Нет，意思是“不”。“坏韵”指什么？谐音“坏运”？茨维塔伊娃的格言：诗就是词语的谐音，所以不排除有这一层意思，但是，字面上还真是说上面那四行的韵脚之坏呢。

《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十二首十四行诗，除了第三首是意大利式或者叫“彼特拉克式”的变体（韵脚排列为 ABBACDDCEFFEGG），其余都是英国式或者叫“莎士比亚式”十四行（韵脚排列为 ABABCDCDEFEGG）。我曾经说过，“莎士比亚式”十四行中国诗人很少有作，以至于王力的《汉语诗律学》论白话诗的商籁体部分竟无例可举，张枣却知难而上做了尝试。写这种莎体十四行的困难，以及张枣的成功，我最后再讲，但他这组诗一开头却是个败笔，自有十四行诗以来没有人失手过的，四行诗居然 AAAA 通押一个韵：“笑”、“包”、“巧”、“兆”！这样押韵，谁都知道坏了规矩，那么张枣为什么要这样押？如果一个聪明人犯了一个低级到从来没有人犯过的错误，那么他就是故意的。张枣故意押一个“坏韵”，而且当场招供出来。但是我们同时发现，坏了规矩之后的声音，竟然甜美异常：“微笑”、“荷包”、“小巧”、“吉兆”，你都能感觉到这些韵那巧笑倩兮的样子呢！

玩了一下，张枣意犹未尽，接着又玩了一个直观的“分行路畔”：

你继续向左，我呢，蹀躞向右。

一左一右本身就已经分置左右了。这就叫自我指涉。克里特人伊壁门尼德斯断言：克里特人没有一句真话。这个著名的说谎者悖论，就是一个特殊的绕进去出不来的自我指涉。我们平常讲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最高度的统一正是这样：他说的正是他的诗句当下在做的。

## 二

第二首，以对茨维塔伊娃命运的拟想与书写为主，以我的此在为辅，展开了对话。

我天天梦见万古愁。白云悠悠

“万古愁”语出李白《将进酒》，是一个抽象词，诗人把它变成了能够梦见的具象的实在，然后用“白云悠悠”一笔荡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按下不表，视线都聚焦到“玛琳娜”身上。这一行诗，古意盎然，张枣写的时候，潜意识里肯定闪过“白云千载空悠悠”，闪过“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后面这两句在《春江花月夜》中也是起了一笔荡开的作用，从哲思转入人事。“悠悠”两字好，既可状白云无尽，也摹写愁之无尽。像中国画长卷里的屏风，起到了引渡诗思到下一段落的作用。

玛琳娜，你煮沸一壶私人咖啡

“玛琳娜”是茨维塔伊娃的名字，拉丁文里有“大海的”意思。咖啡就咖啡，为什么是“私人咖啡”？要注意，同公众世界和公共事件相对应，这里突显了一种日常的存在。油盐酱醋茶，面包咖啡，向来是庶民日常生活的约定俗成的符号。但问题就在于，公众的世界，外在的事件，无孔不入地要侵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来：革命的僮仆、大是大非、右翼和左翼、红与白，俄罗斯二十年代所发生的一切，都与玛琳娜脱不了干系，哪怕她远在巴黎，煮沸一壶咖啡。

方糖迢递地在蓝色近视外愧疚

现代诗人要表达的太多，只能强行把语言压缩、变形。“方糖”、“迢递”、“蓝色”、“近视”、“愧疚”，你说这一溜子毫不搭界的词，哪个跟哪个能搞到一块去？如果说杨炼《诺日朗》第一句，“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跨度虽大，毕竟还是关系可以理喻的一些词的印象叠加和意义转移，这句“方糖迢递地在蓝色近视外愧疚”，就完全切断了日常的逻辑关系，一旦脱离上下文，只能理解为呓语，昏话。但问题是，它们现在偏偏就组织到一起来了。原来，这些词不是彼此牵连，而是跟诗中另外一些词发生关系。比如“蓝色”，遥承白云的蓝天，近接玛琳娜的海。“近视”则是茨维塔伊娃的一大特点，同学回忆，“她的外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珍珠般细腻的柔润面容，看人时常眯缝两只近视眼睛，睫毛上闪烁金光。”张枣可能以为玛琳娜的眼睛是蓝色的，以此与第一首的黑眼睛形成对应（茨维塔伊娃的眼睛其实是碧绿的，她丈夫艾伏隆才有一双“海的颜色”的眼睛，女儿阿莉娅也有“一双蓝盈盈的眼睛”）。但“近视”也暗指茨维塔伊娃缺乏基本的政治眼光。一“近视”自然什么都“迢递”了。

但说来说去，这句话还是可以径直理解为女主人连喝个咖啡都加不起方糖，只能一味苦涩，一生艰辛（茨维塔伊娃诗云：“活到头——才能嚼完那苦涩的艾蒿”）。这方糖“如一个僮仆。他向往大是大非”。方糖的僮仆本来是效劳于贵族的咖啡的，但革命来了，他抱歉他不能配合了，日常生活被大是大非的政治搅乱了。最后，“革命的僮仆从原路返回；/砸碎，人兀然空荡，咖啡惊坠……”昔日的仆人起来造反，旧世界被打碎了。

诗，干着活儿，如手艺，其结果/是一件件静物，对称于人之境，/或许可用？但其分寸不会超过/两端影子恋爱的括弧。

茨维塔伊娃将自己的一部诗集命名为《手艺集》，她说：“我知道维纳斯心灵手巧，/作为手艺人我懂得手艺。”诗在干着活儿，而写诗本身首先是一种手艺。我曾经写到过：“诗，不管说得多崇高，多神秘，多玄，最后还是是一件技术活，是怎么锯、刨、削、凿、钉的功夫。”“如今有许多诗人真好比拙劣的木匠，连做一只凳子都四脚摆不平，如何写得了有机的诗？”诗人的手艺活，结果就是一个个静态的文本。它们既不等于，也非高于，而是对称于人境里的生活。这里开始涉及诗与生活、语言与真实世界的关系这一主题。“对称于人之境，或许可用？”诗之为用，不可高估，只不过是与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形成对应、对称，用张枣《诗人与母语》里的说法，“一种卓然独立于此种现实的另一种完美即绝对现实”，这两种现实如双括弧分置于两端，像镜子里互为镜像，不可须臾分离。

对于这个诗到底有用没用的问题，现代诗人的回答是干脆的：没用。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诗不能让任何事情发生。这是奥登的名诗《悼叶芝》里面的一句。这已经成为现代作家的共识。鲁迅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说，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文学，却没有能够用它推翻任何一届政府。但诗与文学还是有无用之用的大用，这是后话。

但是，相对于手艺与静物的世界，是动荡的、大是大非的、红白翻脸的革命。

圆手镜/亦能诗，如果谁愿意，可他得/防备它错乱右翼和左边的习惯，/两个正面相对，翻脸反目，而/红与白因“不”字决斗；人，迷惘，/照镜，革命的僮仆从原路返回；/砸碎，人兀然空荡，咖啡惊坠……

张枣的诗中充满了小小的静物，纽扣、分币、杯子等等小玩意儿。他喜欢说那句西方诗人的经典座右铭：“每个物里都睡着一支歌。一旦被那个魔术的词击中，它就歌唱起来。”所以，圆手镜亦能诗，如果谁愿意。这个女性化妆用的圆手镜，一个玲珑的圆钿盒里，两边各镶嵌着一面小圆镜，合起来是正面相对，打开来就翻脸反目。张枣借这一喻象巧妙地写出右翼和左翼、红军和白军的决斗，同时也借这一象征着美学与政治学的对峙，个人与社会学的对峙。近视的茨维塔伊娃完全没有政治头脑，从来都搞不清楚左跟右、红与白是怎么回事（十月革命后她会写：“白卫军，你的道路崇高”），对男性的政治缺乏起码的敏感和判断，只能迷惘照镜，而且被动地等待给砸碎的命运。

这一首纯粹用咖啡壶里的风波，来影射外在世界的风云变幻及其对私密空间的闯入。室内，静物，什么都没发生，但什么都发生了。就好像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中的场景：空洞无物的窗台上，一个女人在窥伺；马倒在梦幻的远处；钟呢，软塌塌地像糖融化了一样挂在台阶上。这种魔幻的场景，细节精确到令人眩

晕。这就是张枣诗的世界：

诗如针眼，肉身穿过去之后，别有洞天，这个世界都是诗，一草一木，一动一响，人与事，茶杯，耳机，二胡，老太婆突然像少女似的奔跑，童年，灯芯绒上衣，体育老师的寂寞，一个胖官僚白胖胖却小如花生米的阳具，会哭的门，古代的吊桥，女邮差与月经的某一天，艾略特的荒原与阳痿，灯泡里电的疼，毛泽东的颓废，大师的相通（比如邓小平天生能看懂毕加索），古今不薄，东西双修。一切一切都是诗。没有这种境界的人，终究不可为诗。（《销魂》）

### 三

接着来看第三首：

……我照旧将头埋进空杯里面；

前面，“人兀自空荡，咖啡惊坠”。镜子砸碎了，咖啡泼掉了，人一下子被兀自抽离了，但我依旧将头埋进空杯里面。你跟我是镜子里的镜像一样的人物，你在做的事情跟我在做的事情是同时进行的。你的日常生活被侵扰了，但我的还在继续，照旧把头埋进空杯里面。接下去，层层递进：你完蛋了，俄罗斯完蛋了，巴黎完蛋了，而人，也完蛋了。

你完蛋了，未来一边找葬礼服，/一边用绷紧的零碎打发下午，

你在巴黎的生活是“用绷紧的零碎打发下午”，而你的未来是回到祖国死掉。

俄罗斯完蛋了——黑白时代的底片，/男低音：您早，清脆的高中生：/啊——走吧——进来呀——哭就哭——好吗？/尊称的面具舞会，代词后颤“R”/马达般转动着密约桦林和红吻。

这一段是标准的蒙太奇，是一组接一组镜头的闪过，连缀而复原成茨维塔伊娃三十岁以前的俄罗斯生活，旧俄上层知识分子家庭的优裕生活。青春，爱情。清脆的高中生、假面舞会、白桦林里的密约幽期、红唇之吻……黑白片伴随着画外音：您早，走吧，进来呀，好吗，代词后颤“R”（“R”是俄语舌尖颤音“p”的音译）。这是标准的电影蒙太奇，瞬间闪过，马达般转动。回忆中的情景闪跳着再现，将天崩地裂玉石俱焚的革命导致的满地碎片剪辑切换成微电影。接着切换到巴黎，但不是你茨维塔伊娃的巴黎，是我的巴黎：

巴黎也完蛋了，/我落座一柄阳伞下/张望和工作。人在搭构新书库，/四边是四座象征经典的高楼，/中间镶嵌花园和玻璃阅读架。

这几行写的是塞纳河畔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新馆，花园广场的四角耸立着四座高达八十米的玻璃高塔，十八层中的十一层都是书库，典藏了旧馆所有的书籍。新馆1996年底正式开馆，这首《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写于1994年，张枣去过巴黎，见过书库在搭建中。那么，何以说巴黎完蛋了？应该是有感于那高高在上

的、冷冰冰的、后现代的玻璃书库，是将过去的人们有血有肉的情思封冻，也跟今天的我们有血有肉的生活隔离吧。所以才有了最后两行的感慨：

人，完蛋了，如果词的传诵，/不像蝴蝶，将花的血脉震悚。

诗是一个手艺活，它相对的是一个静物，但这个静物却能够起到爆炸性作用。张枣特别喜欢用蝴蝶震悚花的血脉这一意涵，其《历史与欲望》组诗第二首《梁山伯与祝英台》末尾说得好：“这是蝴蝶腾空了自己的存在，/以便容纳他俩最芬芳的夜晚：/他们深入彼此，震悚花的血脉。”他的《蝴蝶》一诗，有一句更妙：“载蠕载袅，啊，我们迷醉的悚透四肢的花粉”。显然，蝶恋花所具有的性爱因素，更切合诗与真实生命的紧张。诗是没有用的，但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和内心叙述里，诗，一句顶一万句。

#### 四

我们的睫毛，为何在异乡跳跃？/慌惑，溃散，难以投入形象。/母语之舟撇弃在汪洋的边界，/登岸，我徒步在我之外，信箱/打开如特洛伊木马，空白之词/蜂拥，给清晨蒙上肃杀的寒霜；/陌生，在煤气灶台舞动蛇腰子，/流亡的残月散发你月经的辛酸

第二、三首都是你我各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你我，面对的是共同的命运。我们的睫毛（其实指代眼睛）在异乡跳跃，呼应了第三首落座一柄阳伞下的张望，也与第一首的亲热的黑眼睛相关联。异乡总是让我们心思慌惑、心理溃散，连根拔起的虚悬感使我们难以专注地投入形象。“母语之舟已经撇弃在汪洋的边界。”1925年，茨维塔伊娃编辑过俄国流亡作家的文丛，名字就叫《方舟》，编辑前言中写道：俄罗斯作家在境外“花果飘零”中继续写作，“虽生活在俄罗斯边境之外，仍然靠俄罗斯精神生存，脚下接触不到俄罗斯的土地，却依然靠俄罗斯的根基屹立。”（安娜·萨基扬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中卷，第559页）张枣通过茨维塔伊娃而感同身受的宿命，就是流亡在异乡的写作。我们舍弃了母语之舟，登上陌生的岸，“我徒步在我之外”，换句话说，你也徒步在你之外。我们都与原来所属的土地和语言——即组成我们的血肉的，使我成其为我而你成其为你的那一切——隔离了。1992年，张枣在《诗人与母语》一文中写道：

母语在哪儿？她就在我们身上，她就是我们，是我们挑起事件的手指，是我们面临世界的脸孔。对于个人而言，活着的母语从来就不是一个依附于某个地理环境的标志，是附体于每个人的。而我们就是每个人。

对于一个永为异乡人的个人而言，母语是一只流浪的歌。

张枣一再谈论过，茨维塔伊娃也讲过：任何一个诗人本质上都是一个流亡者，异乡人，因为诗人总是要用自己最熟悉的词干一些最陌生的活。你跟你的土地、你的人民呼吸与共固然是好，但你也须经常把自己置于这熟悉的生活外，陌生化，再陌生化。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外在的命运把他们抛到了陌生之境，生活也本质上异化了。

“信箱打开如特洛伊木马，空白之词蜂拥”。在异乡的环境中，没有人给你写信。张枣《告别孤独堡》里有一句：“我设想去电话亭给我的空房间拨电话。”没有电话，没有信。或者如张枣《哀歌》里说的，“另一封信打开/是空的，是空的/却比世界沉重”。特洛伊木马是什么？就是其中有一个颠覆的力量，是埋伏的刀兵纷纷杀出来。没有人写信的信箱，打开来里面什么都没有，正是这个 nothing，这个空无，是一种严重的挫败与杀伤。

不断是幻觉的场景，但有时我们借助日常的经验可以重建的：空的信箱（但空白之词蜂拥），煤气灶台上的火苗在舞动蛇腰子（茨维塔伊娃在信中说，她在巴黎的贫民窟里终于用上了煤气灶），月经的辛酸（对着流亡的残月）……整个儿构成了异乡的流亡生涯。这种刻骨的孤独与辛酸，同样可以在张枣《枯坐》一文里找到：“住在德国，生活是枯燥的，尤其到了冬末，静雪覆路，室内映着虚白的光，……越喝越醒，直到晨曦苍白地把尘世的窗户一个个交还回来。凭窗望去，德国日常生活的刻板 and 精准醒了：一个职员模样的中年人走过，脸上还有被闹钟撕醒的麻木，腿甚至像秒针般移动……。”

妈妈，卡珊德拉，专业的预言家，/他们逼着你的侧影吸外国烟，/而阳光，仍舒展它最糟糕的惩罚：/鸟越精确，人越不当真，虽然/火中的一页纸啾呀，飒飒消失，/真相之魂夭逃——灰烬即历史。

忽然换上了茨维塔伊娃的女儿阿莉娅的口吻，才十三岁的阿莉娅曾给人写信说：“妈妈教导我爱书、爱太阳和香烟。她的手里总是拿着书，嘴总是叼着香烟，头发——像太阳……。”（《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中卷，第 547 页）而阿莉娅六岁的时候，茨维塔伊娃就在给她的《总有一天，可爱的孩子……》一诗中写道：“你将忘记我高鼻梁的侧影，/忘记我眼前常常烟雾迷蒙。”请注意张枣写这组诗的资料功夫。突出“外国”烟，是“异乡”的延伸。

卡珊德拉是希腊神话中拥有预言能力的特洛伊的公主，阿波罗赋予这个女子能够预测未来的能力，但交换条件是她要委身于自己。卡珊德拉拒绝了，阿波罗就给了她一个诅咒：日后，你的预言都是准的，但是却没有人信的。“卡珊德拉，对于我来说她是一个很美的人，”在评论鲁迅《过客》时，张枣曾经说过，“她有最聪明的预见力，但是没有人相信她，优秀但不被人们理解，零余者形象，像现代以来被诅咒的诗人。”（《〈野草〉讲义》）

阿波罗是太阳神，眉心镶嵌着一个太阳出世的，所以说这是来自阳光的惩罚：“鸟越精确，人越不当真”。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一剧曾以夜莺和燕子比拟卡珊德拉：“像燕子一样只会说难懂的外国话。”“是一位神把你迷住了，使你发疯，为自己唱这只不成调的歌曲，像那黄褐色的夜莺不住的悲鸣。”（罗念生译本）在阳光下，一切都精确呈现，拥挤着所有的细节而毫发不爽，却反而给人一种虚幻不实之感。这是过于真实引起的虚幻，过于精确导致的模糊吧。张枣在《大地之歌》中写到过：“我们得仰仗一个幻觉，使我们能盯着/某个深奥细看而不导致晕眩”。但是，“鸟越精确，人越不当真。”这是最糟糕的惩罚：预言越准，人越不信。

“火中的一页纸啾呀，飒飒消失，/真相之魂夭逃——灰烬即历史。”“夭逃”是“逃之夭夭”的压缩。真相被焚毁了，历史只是余烬。这六行中，火与前文煤气灶台上蛇腰子似的火苗应和；阳光与流亡的残月反接；而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跟特洛伊木马也是连类举喻。张枣的文心之细，当代无人能及。

## 五

这一首更为复杂，压缩的经验更多，解释起来也就更困难。但核心部分是围绕着两个希腊悲剧与史诗的人物，一个是前面的预言家卡珊德拉，一个是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张枣喜欢用希腊神话，《历史与欲望》组诗中五首就占了两首：丽达与天鹅，色米拉（通译塞墨勒）恳求宙斯显现。明白了卡珊德拉和赫克托这两个典故，这第五首就好懂了：

阳光偶尔也会是一只狼，遍地/转悠，影子含着回忆的橄榄核，/那是神，叫你的嘴回味他色情的/津沫，让你失灵，预言之盒/无力装运行尸走肉，沐浴在/这被耀眼的盲目所统辖的沙滩。/看见即是说出，而说出正是大海，/此刻的。圆。看的羊癫疯。看。

阳光从上一首作为惩罚的阳光承续而来。阳光如狼，遍地转悠，带着它的影子。阿波罗别号 Apollo Lykeios, Lykeios 的语源，一说是阳光，一说是狼，所以阿波罗是太阳神，又是狼神。他色情的贪婪垂涎让卡珊德拉的预言失灵，而那些对灾难的预言无动于衷的行尸走肉，正盲目地沐浴在阳光耀眼的沙滩上。“耀眼”扣住“阳光”，“盲目”呢，就是“越精确，人越不当真”。“耀眼的盲目所统辖的沙滩”事实上也可以隐指写作的、语言的、革命的种种。只有卡珊德拉看得见真相：“哎哟，多么痛苦啊！要说真实的预言真是苦啊！这可怕的苦恼又使我晕眩，一开始就使我心神迷乱……”（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看见即是说出，而说出正是大海，此刻的。”“大海”跟“沙滩”相对，正如“影子”跟“阳光”相对。预言即看见，也即说出。但更深的层次则涉及张枣诗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存在清脆的命名抛掷出存在物和宇宙图景，哪儿没有命名，哪儿便是一片浑沌黑暗。”“荷马，一个盲歌者，一个完全无法把握世界表象的人，却能侃谈百工艺事，政术战略和人神之交往。”（《诗人与母语》）“圆”为真理的完整具足之相，又是智慧的浑融无偏之征，所谓“圆通”、“圆觉”、“圆解”、“圆览”，都是一类的表述（参见钱锺书《谈艺录》第三十一则“说圆”）。然而，看见和说出的代价是疯狂。“看的羊癫疯”最为费解，却最简单。羊癫疯即癫痫，古希腊人称之为“神圣的疾病”，患者被认为是神灵附体，拥有预测未来的能力。叔本华说：“天才与癫痫相邻。”圣女贞德、福楼拜、贝多芬、陀思妥耶夫斯基、梵高，都是癫痫患者，因为据说上帝对你关上一扇门，必为你打开另一扇窗。看——

生活，在哪？“赫克托，我看见你/坐在一万双眼睛里抽泣，发愣”——/你站在这，但尸体早发白。等你/再回到外面，英雄早隐身，只剩//非人和可乐瓶，围观肌肉的健美赛，/龙虾般生猛的零件，凸现出未来。

赫克托就是被阿喀琉斯杀死的那个英勇的特洛伊王子。那是惨烈的一幕。“赫克托，我看见你/坐在一万双眼睛里抽泣，发愣。”一万双眼睛都被耀眼的盲目所统辖，什么都看不见，形同或者已经死掉，只有赫克托窥见了自己的命运而抽泣、发愣。“你站在这，但尸体早发白”，承接上文的“行尸走肉”，也可能是指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亲自去阿喀琉斯的军营里赎还儿子赫克托尸体一事。那样的话，“等你/再回到外面，英雄早隐身”，可以指赫克托，或者阿喀琉斯，都是天神一

样的英雄，从此隐身了。但是，这两行更可能是张枣对荷马史诗夺胎换骨，让虚拟的主体转化自如的惯技：你，茨维塔伊娃，“你完蛋了，未来一边找葬礼服，/一边用绷紧的零碎打发下午”。你已经看见了你的死，正如卡珊德拉最后也看见了自己的死，你那个时代的英雄都已隐身了，只剩——剩下给我的了：“只剩非人和可乐瓶，围观肌肉的健美赛，龙虾般生猛的零件，凸现出未来。”

你茨维塔伊娃的那个时代，毕竟还有英雄，革命的、残忍的英雄。而今天我这个时代，“非人”是非人之人（如鲁迅的无物之物、无地之地）；龙虾生猛，但零件大于身体；肌肉健美，但可能服了类固醇。看啊，肌肉凸，龙虾凸，可乐瓶是塑胶的，龙虾壳是钙质的，无机的零件，非人的生猛，多么相济相生的形象与感觉的呼应！这一切与第十一首的“广告”、“美男子”、“冰淇淋”一起，组成了人造的、虚拟的、无生命的现实。张枣在《海底被囚的魔王》一诗里说：“看看我的世界吧，这些剪纸，这些贴花/懒洋洋的假东西；哦，让我死吧！”里尔克曾经感叹：“从美国来的空虚、冷淡的物质蜂拥而至，凡是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都是生活的复制品。”作为叙述者的我的眼下的时代，正是本雅明所谓“机械复制时代”。这个时代没有英雄。

## 六

樱桃，红艳艳的，像在等谁归来。/某种东西，我想去取。下午，/我坐着坐着就睡了，耳朵也倦怠，/我答应去外地取回一本俄文书。/你坐在你散发里，云雀是帽子。/笔，因寻找而温暖。远方，来客。/梦寐之中，你的手滴落着断指，/我想去取：人，铜号，和火车；

注意这个“取”，不断的“取”。就像前面第三首会用“完蛋了”贯穿全诗，这第六首的关键词就是“取”。

读张枣的诗，我想，真的要习惯于那种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和戏剧。就像这一首，我想我们应该还能够唤起贝克特《等待戈多》那样一个场景。“你去取”，这里面有一个“等的纯粹逻辑”。“我坐着坐着就睡了，耳朵也倦怠”，“你坐在你散发里，云雀是帽子。/笔，因寻找而温暖。远方，来客。/梦寐之中，你的手滴落着断指”。这是一个疲惫的下午，一个发生在白日梦中的场景，就像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好累呵！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远方的来客在梦中出现，是坐火车来的吧？“梦寐之中，你的手滴落着断指”，是那种达利式的画面，真实的东西被融化掉。又像《焦氏易林》里的魔幻情境，梦兆不详。

樱桃，红艳艳的，等的纯粹逻辑，/我心跳地估算自己所剩的时光；/没有你，祖国之窗多空虚。呼吸，/我去取，生词像鳟鱼领你还乡；/你去取，门锁里小无赖哇吐静电——/痛，但合唱惊警地凌空，绝缘。

“樱桃，红艳艳的，等的纯粹逻辑。”这算是一跤跌到逻辑外，意义完全无法解释。张枣有一首《告别孤独堡》，里面有一句：“上午，仿佛有一种樱桃之远。”樱桃之远，可感而不可言传。樱桃只有近才看得真切，“万颗匀圆讶许同”（杜甫《野人赠朱樱》）；而樱桃之远，也是“盯着某个深奥细看”吧？看久了就会晕眩，并且在幻觉中远起来。

“我心跳地估算自己所剩的时光；没有你，祖国之窗多空虚。”有些时候，

“我”并非绝对就是张枣那个“抒情的我”，而“你”并非绝对就是茨维塔伊娃。因为在幻觉中，他们有些时候会有某种互换、交融。我认为，这两行诗，这两句话，相当于现代小说中的“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speech），即抹去了引用痕迹的引用，引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声音。他1935年访问巴黎时，茨维塔伊娃向他征询是不是应该回国，他没有明确阻止她返乡的意愿。第二年大清洗就开始了，而茨维塔伊娃在大清洗尾声中回国，遭受了厄运，帕斯捷尔纳克对此追悔莫及。但问题是，“生词像鳟鱼领你还乡”，是母语的诱引，前面已有俄文书；而所谓“生词”，是不是相当于奥威尔《1984》里的老大哥的“新话”（newspeak），或者就是指苏联的新生活么？

你去取，门锁里小无赖哇吐静电——/痛，但合唱惊警地凌空，绝缘。

某种东西，我想去取：想去取俄文书；取人，铜号，和火车；然后，我去取呼吸。你呢，取什么？痛。我们要格外注意张枣的标点符号。不可能倒装去取上一行像鳟鱼领你还乡的生词，因为已经用分号隔开，收束了。有人说起分号便没有好话。写《苔依丝》的法朗士说：分号既不是逗号，又不是句号，是个杂种。写《五号屠宰场》的冯内古特说：分号就像患有易装癖的阴阳人，什么都没说，唯一能说明的是你上过大学。但分号用处还是大，特别在张枣手里，用来特别讲究。那么，最后两行，“你去取”的宾语，应该是，也只能是，“痛”，只不过中间被“门锁里小无赖哇吐静电——”隔开，使得单个的“痛”字，看上去无主了。“合唱惊警地凌空”，这是歌队的合唱，来自古希腊戏剧。尼采说，歌队是抵御汹涌现实的一堵活的城墙。现在，当女主角因为空虚寂寞，因为估算自己所剩的时光无多，而要还乡时，歌队的合唱声惊呼“绝缘”。“绝缘”当然跟“电”有关，但这两个中文字，从字面上就是告诉你，“绝”了跟故乡的“缘”吧。尽管你离开了母语的的土地，思乡如渴，思亲如焚，但是行不得也！因为俄罗斯大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让你的未来只能是“一袭丧礼服”。

## 七

茨维塔伊娃的结局之惨，让我想到“公无渡河”的故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引《古今注》：“朝鲜津卒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这第七首便是公竟渡河，堕河而死的结局：

你回到莫斯科，碰了个冷钉子，/而生活的踉跄正是诗歌的踉跄。/除夕夜，  
乌鸦的儿女衣冠楚楚地/等钟声，而时间坏了，只好四散。/带担架的风景里躺着  
那总机员，/作协的电话空响：现实又迟到，/这人死了，那人疯了，抱怨，/抱怨  
的长脚蚊摇响空袭警报。/完美啊完美，你总是忍受一个/既短暂又字正腔圆的  
顶头上司，/一个句读的哈巴儿，一会说这/长了点儿，一会说你思想还幼稚，//楼  
顶的同行，事后报火，他们/跛足来贺，来尝尝你死的闭门羹。

这一首叙述性很强，只要熟悉茨维塔伊娃的传记资料，就不难理解。1939年6月，茨维塔伊娃带着儿子穆尔回到了苏联。两月以后，先期回国的女儿阿利

娅被逮捕，然后被流放。四个月後，她的丈夫艾伏隆被控从事反苏活动，被逮捕，然後被枪决。这是最初的“冷钉子”。她生计无着，寄人篱下，如嚼苦涩的艾蒿，真是一路踉跄。她为获得住处向作协书记法捷耶夫求告，却连一个平方米都得不到。想发表作品，出版诗集，却被“字正腔圆”的“句读的哈巴儿”斥为思想幼稚，形式扭曲，是来自“那个世界”的病态产物。在那人人受伤的时代，同行但求自保，甚至互相告密：“事后报火”，“跛足来贺”。好像这样苦难还不够似的，苏德战争爆发，她和儿子从莫斯科疏散到外地，“时间坏了，只好四散”、“带担架的风景”、“抱怨的长脚蚊摇响空袭警报”，一片混乱的场景。终于，1941年8月31日，茨维塔伊娃在绝望中自杀。

## 八

上一首是茨维塔伊娃剧烈的人生变故，是死亡。到了这一首呢，突然甜美舒缓。仿佛死亡降临以後的祥和宁静，类似于歌队合唱的安魂曲。Wenn Du wirklich mich sehen willst, so musst Du handeln! 这句德文题词，用了茨维塔伊娃给里尔克信里的一句话，意思是说：“如果你真想见到我，那么你得行动！”

东方既白，经典的一幕正收场：/俩知音一左一右，亦人亦鬼，/谈心的橘子荡漾着言说的芬芳，/深处是爱，恬静和肉体的玫瑰。

什么是“经典的一幕”？茨维塔伊娃与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三诗人书简》，即《一九二六年书简》，是三位伟大诗人之间的通信，或者说，三方情书，照苏珊·桑塔格的说法，“是对诗歌和对精神生活所怀的激情的无与伦比的戏剧化。”一左一右的“俩知音”，可以指里尔克跟帕斯捷尔纳克，那么“亦人亦鬼”便是说当茨维塔伊娃死去，里尔克已成亡灵，而帕斯捷尔纳克依然健在。但考虑到题词用了德语信中的话，“俩知音”还是解释为茨维塔伊娃与里尔克为好。里尔克的亡灵在送茨维塔伊娃回家，死亡的家。

“谈心的橘子荡漾着言说的芬芳”，这一句美妙的诗很难解说。橘子如何谈心？难道真像某诗人那么呆说，“圆圆的，燃烧着的 orange，是我心的比喻”（艾青《orange》），读的人才懂？张枣一写到水果，特别是这个芬芳的橙子橘子柑子，就有美妙的诗句：“经典的桔子沉吟着/内心的死讯”（《断章》之七）“一颗新破的橙子为你打开睡眠”（《空白练习曲》之十）。“新破的橙子”来自周邦彦的《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写主人公跟心上人在寒冬长夜的闺室里浓情蜜意的温存，呢呢细语，恩怨尔汝，那境界正好就是“谈心的橘子荡漾着言说的芬芳，/深处是爱，恬静和肉体的玫瑰。”记得当初发表的本， “玫瑰”作“丽瑰”，似乎更好，因为既然有了橘子就可以不再有玫瑰了。

手艺是触摸，无论你隔得有多远；/你的住址名叫不可能的可能——/你轻轻说着这些，当我祈愿/在晨风中送你到你焚烧的家门：/词，不是物，这点必须搞清楚，/因而首先得生活有趣的生活，/像此刻——木兰花盎然独立，倾诉，/警报解除，如情人的发丝飘落。

第二首说“诗，干着活儿，如手艺，其结果/是一件件静物”。现在，关于写作，关于诗与生活、语言与真实世界的关系，这一主题重现了。“手艺是触摸”，是身体与物体的亲密对话，是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重获对存在的切肤之感。“躬腰费眼的手工活，很是有劳动之美。”（张枣《自己的官方》）在诗人手里，词获得了物的存在，有如皮匠手里的皮子，金匠手里的金子。而从更深一层思考，词是不是物的问题，在现代诗人中间有最复杂的运算。我们陈旧的观念是像胡适所说的“言之有物”，但现代诗人和哲学家都相信，言即为物。就像张枣所讲的，“哪儿没有命名，哪儿便是一片浑沌黑暗。”当你说出了什么，那个东西就出现了；当你写出了什么，那个东西就发生了。张枣组诗《云》第二首说：“你只要说出树，树就会/闪现在对面，无论你坐在哪儿。”我们对这种看起来会被毫不迟疑地斥为唯心主义的说法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现在觉得什么东西真实？你看张枣真实吗？还是这首诗真实？张枣死了，但他留下的这本薄薄的诗集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未来的人读到他这首诗，还会想到他这个人。所以从长远看来，词就是物，它比肉体的生命更真实。如果没有留下这些东西，我们就不会在这儿讲张枣这个不复存在的存在了。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词，不是物，这点必须搞清楚，/因而首先得生活有趣的生活”。第二首说，诗，作为人境的生活的对称，其用处极有分寸，不会超过两端影子恋爱的括弧。这又回到诗不能使任何事发生的问题上来。诗是一场超级虚构。写作可以创造一个世界，但毕竟不等于这一个世界；可以虚构一个人生，但毕竟不等于这一个人生。“因而首先得生活有趣的生活”。上一首说，“而生活的踉跄正是诗歌的踉跄”，那么换个说法，生活的顺畅也正是诗歌的顺畅。用茨维塔伊娃给里尔克的那句题词，“如果你真想见到我，那么你得行动！”只有行动才能解决现实，解决人自身的生活。

可是，有一种爱是隔着遥远的距离，通过词来互相触摸，也通过词而最终实现。“无论你隔得有多远；/你的住址名叫不可能的可能”，诗能够让“不可能的可能”发生，比如现在，诗人让生前从未见过面的里尔克与茨维塔伊娃清晓相送。“东方既白”，“亦人亦鬼”，“晨风”，这是亡灵甚至鬼魂出而复没的辰光。《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一场，鬼魂一听到鸡叫就隐没了。中国也有鸡鸣鬼去的常言。“你轻轻说着这些，当我祈愿在晨风中送你到你焚烧的家门。”这里的“焚烧”，又跟前面“煤气灶台上”那个火苗的“蛇腰子”联系起来，跟“火中的一叶纸咿呀，飒飒消失”联系起来，“焚烧的家门”又跟前面“楼顶的同行跛足来贺，来尝尝你死的闭门羹”相呼应。这组诗的好多线索是呈链状的，许多条链子交织隐现。如最后四行：

像此刻——木兰花盎然独立，倾诉，/警报解除，如情人的发丝飘落。//东方既白，你在你名字里失踪，/植树的众鸟齐唱：注意天空。

“警报”也呼应着前面的系列：有“事后报火”的警报，有“抱怨的长脚蚊摇响的空袭警报”，当然还有“卡珊德拉，专业的预言家”的警报。“众鸟齐唱”直接与第六首末行“合唱惊警地凌空”挂钩。但警报解除后的众鸟齐唱，惊警犹在：“注意天空”。提醒缠绵的魂灵要留意光阴的流逝，危险时刻的临近。

这一首写的是收场，是解除、飘落、失踪，是知音和情人的故事的大结局。但这是幽冥界的结局，是一个超级虚构中的结局。“不可能的可能”在此实现，生命中从未见面，死亡却将他们永远联系在一起。这个就是文学、语言、词所做

的事情，它们使一切事情发生。“你在你名字里失踪”，你的肉体生命已经结束于你名字的符号中，但你的名字流传了下来，就像罗兰·巴特说的，作者死了，其主体已经在其文本中隐没融化了。剩下的只有文本。

## 九

前一首是死亡的终局，这一首是对死亡的质疑。

人周围的事物，人并不能解释；/为何可见的刀片会夺走魂灵？/两者有何关系？绳索，鹅卵石，/自己，每件小东西，皆能索命，/人造的世界，是个纯粹的敌人，/空缺的花影愤怒地喝彩四壁，

诗人在沉思物质生命跟精神生命的关系。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刀片”、“绳索”、“鹅卵石”，这些弹簧般的物品窜出来，封杀了生命。张枣偏爱小小的物件，喜欢说：“每个物里都睡着一支歌。一旦被那个魔术的词命中，它就歌唱起来。”但现在，这些唱歌的小小的东西凶险起来了，反叛了，会索命了。诗人归咎到这些人造的物品的冷漠上来（其实，“刀片”、“弹簧”和茨维塔伊娃自缢身死的“绳索”是人造物品，“鹅卵石”不是）。此处的诗思让我想到秘鲁诗人巴略霍的诗句：“今天一片碎块刺进了她的身体，/在她存在的方式，在她有名的/一分币，给她狠狠的一击。/命运使她十分痛苦；门使她痛苦，/腰带使她痛苦，给她干渴和折磨，/给她酒杯的而不是酒的干渴。”（《今天一片碎块刺进了她……》）

“人造的世界是个纯粹的敌人。”前面的“非人”、“可乐瓶”、“围观肌肉的健美赛”、“龙虾般生猛的零件”都是这“人造的世界”的组成部分，后文又将延续这一主题。“空缺的花影愤怒地喝彩四壁”，张枣在一次访谈中将这句诗引成“愤怒的假花喝彩四壁”，假花就是人造的花。但这句诗令我想到它与一句旧诗惊人的相似。龚自珍《梦中作四截句》第二首：“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钱锺书在《谈艺录》中，特别拈出后七字，细品而极赞道：

“潮”曰“怒”，已属陈言；“潮”喻“影”，亦怵人先；“影”曰“怒”，龃龉费解。以“潮”周旋“怒”与“影”之间，骖靳参坐，相得益彰。“影”与“怒”如由“潮”之作合而缔交莫逆，“怒潮”之言如藉“影”之拂拭而减其陈，“影”、“潮”之喻如获“怒”为贯串而成其创。真诗中老斲轮也。

将影子比喻成潮水不算什么，将潮水形容为怒潮也不算什么，但把“影”、“潮”、“怒”三个字放到一块儿去，那就相得益彰了：

四厢花影怒于潮。

这一句要改写成现代汉语的话，那就一定是——

空缺的花影愤怒地喝彩四壁

“四壁”相当于“四厢”，“花影”原封不动还在，“愤怒”也出现了。张枣

难道读过龚定盦的这首诗？或者读过钱锺书的这段话？不一定。我相信这是一次不谋而合的邂逅，一次相互都不知道对方存在的遭遇战。可以说，龚自珍的那句诗如此富有现代感，张枣应该“怵他人之我先”了。但张枣别有创获，是把“愤怒”与“喝彩”奇妙地压缩到一起。是啊，有些时候，一种痛，一种死亡之发生，像鲁迅说的，是一种大欢喜；或者像庄子讲的，“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痂”。死亡是个脓包，一下子脓头破掉，是极痛快的事，所以有“愤怒”和“喝彩”两个完全相反的情绪反应糅到一块儿去。我们看一看鲁迅《野草》里的《复仇》：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一柄利刃的一击，一根绳索的一扣，就能索命，在时间中慢慢成熟的生命会中止于这么不起眼的小东西，足可愤怒。但死亡又是对苦难的生命的复仇，这痛快淋漓的复仇，足可喝彩。对于身陷绝境的茨维塔伊娃来说，投缳而死反而是解脱。

使你害怕，我常常想，不是人/更不是你本身，勾销了你的形体；/而是这些弹簧般的物品，窜出，/整个封杀了眼睛的居所，逼迫/你喊：外面啊外面，总在别处！/甚至死也只是衔接了这场漂泊。

我想，这第九首诗之所以绝口不提造成茨维塔伊娃之死的体制迫害，而刻意迁怒于“这些弹簧般的物品”，是出离了愤怒的表现。柏林、布拉格、巴黎的十七年固然是异乡的漂泊，回到故国却更是异乡，“我的家乡不珍惜我……”，茨维塔伊娃是嚼完生活的苦蒿，带着这无尽的叹息离去的。一身总是居无定所，生活永远在别处，“甚至死也只是衔接了这场漂泊”，漂泊即挂空，无根——

无根的电梯，谁上下玩弄着按钮？/我最怕自己是自己唯一的出口。

这个“怕”又连接了前面的“使你害怕”。张枣在《〈普洛弗洛克〉讲稿》中说：“永恒的事情，一个是害怕，另一个是死亡，死亡用了一个矛盾修辞法，真正超出日常性的一个人不是 god，而是说 dare，在没有上帝的时候，死亡就占据了空白，所以一句话，‘I am afraid’，二十世纪文学一个关键的主题就是‘我怕’。……因为不相信神，上帝死了，这种怕是跟死同构的。”当张枣悬拟茨维塔伊娃临终的心态说，“我最怕自己是自己唯一的出口”，他替她想到的也许是，“无根的电梯，谁上下玩弄着按钮？”是上帝吗？可是上帝已经死了。

十

我摘下眼镜，我愿是聋哑人的翻译——/宇宙的孩子，大厅正鸦雀无声：/被手势的蝴蝶催促开花的可能。

这一首以非常魔幻的场景开始，诗的意旨也晦涩难解，但可以确知，已经从茨维塔伊娃转到了我。一场虚构的手语诗的朗诵，聋哑人在这个地方完全依靠手语，是“手势的蝴蝶催促开花的可能”。空气在朗诵，大厅鸦雀无声，这是一个怪异的世界。当然，鸦雀无声、空气朗读等等，可能指向某种政治高压，也可能是一个“人造的世界”抽空的结果。

真实的底蕴是那虚构的另一个，/他不在此地，这月亮的对应者，/不在乡间酒吧，像现在没有我——/一杯酒被匿名地啜饮着，而景色/的格局竟为之一变。满载着时空，/饮酒者过桥，他愕然回望自己/仍滞留对岸，满口吟哦。某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变革之计

使他的步伐配制出世界的轻盈。/大人先生，你瞧，遍地的月影……

“真实的底蕴是那虚构的另一个，他不在此地。”此地有一个真实的我，但并不真实；真实的是那不在此地的我，虽然是虚构。第五首中，那太阳的对应者是阿波罗，这月亮的对应者则是我自己。但我非我，尽管我正在乡间酒吧里啜饮着一杯酒，但这不是真实的我，所以这杯酒只是被匿名地啜饮着。匿名是有意改写“惟有饮者留其名”，所以像奚密就认为，这位饮者是李白，李白酷爱写月亮，在《花间独酌》里“举杯邀明月”，在《将进酒》里“与尔同消万古愁”（第二首开头即用了“万古愁”），所以说他是月亮的对应者并非没有理由。但这一说法不符合这组诗的内部统一性，因为里面放不进一个李白。“景色的格局竟为之一变”是因为分身的另一个我换了一个角度在看，现在他过了桥，回望自己仍滞留对岸，满口吟哦，不禁愕然，仿佛不认得自己了。“满口吟哦”是旧时代的风流，抛弃了那一个我的这一个我，乃是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变革之计”的新人，这些崇高的理念“使他的步伐配制出世界的轻盈”。这轻盈的步伐让我们记起第二首中那位“向往大是大非”的“革命的僮仆”，他“从原路返回”的步伐应该就是如此轻盈。

这里诗人大玩特玩起他惯玩的分身术了。的确，与其说诗人在故弄玄虚，不如说他贪玩。现代诗经常会写这样一个分身，写主体的分化与转化，就像 T.S. 艾略特在《四首四重奏》的最后一首《小吉丁》里，“我”作为一个伦敦消防队员（艾略特在战时一度做过），在纳粹空袭伦敦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在街头遇见了一位过去的大师，眼睛里有“熟悉的复合的灵魂”：

于是我呈现为一个双重角色，一面喊  
一面又听见另一个人在喊：“怎么！你在这儿？”  
尽管我们都不是。我还是我，  
但我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

张枣非常推崇 T.S. 艾略特的《四首四重奏》，认为其表面语法简单而内涵极为深邃。他当然对 T.S. 艾略特的分身伎俩再熟悉不过了。

张枣自己在课堂上简单讲过这组诗。据颜炼军的笔记，张枣说这第十首的最后用了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但我不大相信《大人先生传》用在这里有什么用，不过就是借一个名目吧。当然，大人先生这名目本身就带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在旧俄的小说里面，经常也会“大人先生”，“贵族老爷”。张枣会像史蒂文斯，偶尔用稍显怪异的、讥嘲的甚至给人感觉恶意的调调儿说话。这个“大人先生”，

这个“你”，应该是反躬自视、反躬自嘲的另一个“我”，作为新人的“我”。“大人先生，你瞧，遍地的月影……”这“遍地的月影”又是从第五首反转出来：“阳光偶尔也会是一只狼，遍地/转悠，影子含着回忆的橄榄核”。

## 十一

是的，大人，月亮扑面而来，/四望皎然，峰顶紧贴着您腮鬓：

张枣自己还说过，这第十一首开头，他又用了一点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典故。我仍觉比较牵强，因为这里皎然的是月，而不是雪。古今诗语的表面相似很多，难道“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也会是“月亮扑面而来”的来历么？不会。这个“大人”，这个“您”，前面说了，应该是反躬自视、反躬自嘲的另一个“我”。组诗整个儿是“我”和“你”之间展开的，所以，接下去，从主体的“您/我”转向作为客体的茨维塔伊娃，也就是“她”：

下面，城南的路灯吐露香皂气，/生活的她夜半淋浴，双眼紧闭，/窗纱呢喃手影，她洗发如祈祷，/回身隐入黑暗，冰箱亮开一下；

一个俯望的、带点窥视的角度，一个逼真而又虚幻的场景。为什么偏要说“生活的她”？别忘了第八首，“首先得生活有趣的生活”。普希金写得好：“如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还有一大砂锅汤。”契诃夫也说得对：“在女人中，我所爱的当然是美；在人类社会，我所爱的是绒毯、附有弹簧的马车和敏锐思考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理智与事实告诉我：电流与蒸汽比贞洁和吃素含更多的人性和爱。”当面对恐惧和无解的难题时，没有比香皂、窗纱、夜半淋浴更能代表表现世安稳的生活了。

隔着一层窗纱在淋浴，可以看到手的影子在上面闪动，于是诗人用了“呢喃”这一双声词，写出“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的含糊甚至暧昧。女子夜半淋浴的动作是私密性的，亲密性的，“呢喃”一词表现力异常丰富，既应和着“祈祷”，也将“递到你悄声细语的剧院包厢”（第一首）、“谈心的橘子荡漾着言说的芬芳”（第八首）等绵绵的絮语贯穿起来。此刻的意境，其实倒很吻合唐人刘方平的七绝《月夜》：“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虫声从窗纱中“透”过来，却不如“窗纱呢喃手影”更微妙。

回身隐入黑暗，冰箱亮开一下；/永恒像野猫，广告美男子趺到/彗星外，冰淇淋天空满是俏皮话……

从“冰箱”到“广告”到“冰淇淋”，这里又出现了“人造的世界”，与第五首的“可乐瓶”、“健美赛”同为有机联系着的意象。“冰淇淋天空”出自史蒂文斯的《冰淇淋皇帝》。在张枣的生涯中，没有比史蒂文斯在诗学观念和写作风格上给他影响更大的诗人了。“冰淇淋天空，满是俏皮话”，人造的世界事实上消解了真正的严肃。

……夜莺啊正在别处，是的，您瞧，/没在弹钢琴的人，也在弹奏，//无家可归的人，总是在回家：/不多不少，正好应合了万古愁——/呵大人，告诉我，

为何没有的桂树/卷入心思，振奋了夜的秩序？

上一首和这一首，集中出现了许多分身的、魔幻的场景，以及悖论式的表达。“夜莺啊正在别处”，跟“外面啊外面，总在别处”一致，也与济慈的《夜莺颂》有文本上的联系。济慈说，他愿一饮而尽一杯醇酒，再与夜莺一起悄然离开这世界，遁入那幽邃的森林，全然忘却所有这些疲惫、焦灼和热病，而这些都是夜莺并不知晓的一切。“万古愁”呼应第二首第一句的“我天天梦见万古愁”。“万古愁”分置于顺数第二首和倒数第二首，可见张枣的讲究对称的形式感，也凸显了此一片语的重要性。“不多不少”可参照张枣组诗《云》第二首中的诗句：“多，就是少？未必如此。/我喜欢不多不少。”

“没在弹钢琴的人，也在弹奏”，“无家可归的人，总是在回家”，“没有的桂树卷入心思，振奋了夜的秩序”。这一连串的No，一连串的无中生有，如何理解？按照张枣的超级虚构的诗学观念，没有的桂树也是树之一种，如第五首已有非人之人的“非人”，这就像鲁迅的无物之物、无地之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里的“乌有先生”、“子虚使”、“亡是公”。这些都是没有的有，不存在的存在。张枣也可能仿效肯明斯（E.E.Cummings）的 *anyone lived in a pretty how town* 一诗中拿 noone 当实有其人的那一类奇异的表达。

词一出现，物即成立。本来没有的物，本来没有的人，形成了一个新的事实和秩序。“没有的桂树/卷入心思，振奋了夜的秩序”，这与张枣翻译过的史蒂文斯的《基围斯特的秩序观》那首诗有关。史蒂文斯不是喜欢在诗中设置一些虚拟的秩序吗？他最著名的诗写道：我在田纳西放了一只瓮，然后它就赋予了那片原野以秩序。张枣尤有进者：空缺的花影可以愤怒地喝彩四壁，没有的桂树也能够振奋夜的秩序。

再从本事诗的角度看，这几句也不是泛泛而写。“无家可归的人，总是在回家”，是指茨维塔伊娃的悲剧。“没在弹钢琴的人，也在弹奏”，同样与茨维塔伊娃有关。“你在钢琴上按键，琴键在那，在这，黑的，白的，音符在哪？”茨维塔伊娃说过，她最初的语言不是俄语，甚至也不是出生地的德语，而是音乐。她母亲生命的最后一息，手指是停止在钢琴的键盘上的。所以我说张枣写这组诗下过十足的资料功夫，可谓字字有来历。

## 十二

九月，果真会有一场告别？/你的目光，摆设某个新室内：/小铜像这样，转椅那样，落叶，/这清凉宇宙的女友，无畏：/对吗，对吗？睫毛的合唱追问，/此刻各自的位置，真的对吗？/王，掉落在棋局之外；西风/将云朵的银行广场吹到窗下：/正午，各自的人，来到快餐亭，/手指朝着口描绘面包的通道；/对吗，诗这样，流浪汉手风琴/那样？丰收的喀秋莎把我引到/我正在的地点：全世界的脚步，/暂停！对吗？该怎样说：“不”！？

九月会有一场告别么？可八月三十一号茨维塔伊娃死掉了。新的室内的摆设，此刻各自的位置，都是重建一种秩序。“落叶这清凉宇宙的女友”，是属于张枣的惯用语。组诗《云》第二首中也有“一片叶。这宇宙的舌头/伸进窗口，引来街尾的一片森林。”

“对吗，对吗？睫毛的合唱追问，/此刻各自的位置，真的对吗？”呼应第

三首“我们的睫毛，为何在异乡跳跃？”以及第六首的“合唱”，第八首的“齐唱”。从“我们的睫毛”到“睫毛的合唱”，男女主角你和我以及我们身后的合唱队，都在追问：你/我/你们各自所在的位置，你在昨日革命的世界，我在今天商品的世界，是不是都命运乖张，站错了位置？诗人一再追问，“对吗？对吗？”这样对吗？那样对吗？这个错乱的世界是每样东西都各得其所呢，还是被一个荒谬的命运各各带到不可测的地方来了呢？所有偶然聚集起来的这些，看上去是以必然的秩序存在着，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从来如此便对吗？

“王，掉落在棋局之外”，现实的世界是错乱的。“西风将云朵的银行广场吹到窗下”，虚实结合的写西风把云朵吹到了窗下，而窗下其实就是银行的广场，而文字上却是借白云之白与银行之银偷渡。“银行广场”、“快餐亭”、“面包”、“流浪汉手风琴”，都是眼下现象的存在，是人造的世界，商品的世界，也是“我”所面临的“生活的”世界（就像第一首，“人行道”、“红绿灯”、“剧院包厢”，是你往日“生活的”世界一样）。但这个世界不是我想要的，正如你，茨维塔伊娃，也不要你那个糟糕的世界一样。喀秋莎是清纯美丽的少女的代名词，“丰收的喀秋莎”或从前面的“清凉宇宙的女友”和“快餐亭”的“面包”承接而来。但此时此刻，诗人对这个世界叫了“暂停”，说了“不”。

当全世界以革命或者科技的名义迈开大步（革命的僮仆原路返回的脚步，变革之计使世界轻盈的脚步），诗人却是一个对现实说“不”的人。张枣常用否定词“不”，他的组诗《云》里，就有一个背上刺着“不”的人。他的《护身符》一诗中，“不”的护身符也越狱式地打出一拳，中止于“不！不！不！”这组《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沿袭了他一以贯之的追问，最后还是重重地落在这样一个否定词上。

### 十三

这组十二首十四行诗，《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我已经逐行逐句分析到这里。我的工作等于是给这组诗做了详注。诗中涉及到的本事、典故、意象、象征，我尽可能都给出了解释，也对其复杂的文脉与思路作了梳理。不少地方似不可解，而强为之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诗无达诂，我虽想参活句，却可能终不免死于句下。事实上，我的解释和分析只想为读者和学者提供一个可资进一步索解的基础和平台。

总的来说，此诗虚拟了一个超越时空的戏剧化场景，展开了一场作为叙述者的“我”与茨维塔伊娃想象中的对话，实写俄国革命所导致的茨维塔伊娃的悲剧一生，虚写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我”的遭遇，主线与副线交缠在一起，处理了一些重大主题，如诗人与时代的关系（革命的和商品的时代）、诗与生活的关系（日常的和公众的生活）、诗与现实的关系（词即是物与词不是物的二律背反），等等。

茨维塔伊娃命运悲惨。张枣也自承在海外的孤独生活极端不幸，形同坐牢。茨维塔伊娃往昔的俄罗斯完蛋了，因为革命精神的冷酷；我当下的巴黎完蛋了，因为物质主义的冷漠。同是天涯沦落人，这种生活的缺损是无论怎样的写作都无法补偿得了的。再加上诗人和艺术家宿命似的被诅咒。张枣1985年就翻译过荣格的《论诗人》，其中说道：

艺术家的生活皆是未能如愿以偿的生活（虽然不尽是悲剧的），这是因为他

们在人性与个性上是自卑的，而不是因为某种阴暗莫测的命定性。一个艺术家为自己创造力的神圣火焰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似乎是一条不可破的规律。

“而生活的踉跄正是诗歌的踉跄。”所以诗人才会说：“词，不是物，这点必须搞清楚，/因而首先得生活有趣的生活”。

但是，“人，完蛋了，如果词的传诵，/不像蝴蝶，将花的血脉震惊。”整首诗最后的结穴所在，还是诗人的萦心之念：“诗这样，对吗？”诗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用？诗能不能为这个世界重建一个秩序？诗的语言、诗的词汇，能不能等同于一个世界？其实这是现代诗学和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即词与物的关系问题。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拉康说：“词语的世界创造出了事物的世界。”海德格尔说：“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此外，福柯写过《词与物》，朗西埃写过《字的肉》，都在讲言说的优先性和现实性。牟宗三也提到过文本的自足世界是一个“如是如是之境界，当下即是之境界”，我们“必须如如地(as such)观之”。(《水浒世界》)这是二十世纪的诗人和哲学家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问题，张枣也不断在谈论这个问题，谈词与物、文本与世界、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翻译史蒂文斯，总是喜欢取诸如《词语做的人》、《一首诗取代了一座大山》、《世界作为冥想》等篇目，已透露内心消息。当然，我们拿一个哲学或诗学理论来套他的诗，会索然寡味，但他一再申论：

写作不是再现而是追寻现实，并要求替代现实。在这场纯系形而上学的追问中，诗歌依靠那不仅仅是修辞手法的象征和暗喻的超度(metaphoric transcendence)而摇身变成超级虚构。这虚构将双手伸向另一种现实的太阳，人的生存便会因偶赐的光亮而顿显意义。(《诗人与母语》)

从这个意义上说，词即是物，《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即自成一小小的宇宙。为营造这个自足的宇宙，张枣虚构场景，敷设对话，乃至生造词语。“哇吐”这个词就是他生造的，造得非常好，两个口，三个土，伴有声音的动作。张枣很喜欢这个生造的词，后来在《祖父》、《给 C.R. 的一片钥匙》等诗中都用过。《红楼梦》第三十七回，薛宝钗说：“诗固然怕说熟话，更不可过于求生。”但张枣就是敢“过于求生”。

这些可能的手段，当然包括他的主体分化和换位的技术。我们过去习惯了那种有确定边界的“我”所发出来的声音，到了张枣这里，这种读法完全行不通了。“我”不一定是“我”。表面上是“我”，事实上是另外一个“我”，而另一个“我”很有可能又融进了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有些时候，这个“我”一转又变成了茨维塔伊娃。所以主体的消解和分化，声音的多元和分裂，就成为张枣的诗的标志。呈现在这组《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中，便是主体分解之后双向的渴慕与思恋的呢喃，是一场轻声细语的对话。所以，这就牵涉到张枣诗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即诗的对话观念。但这一点讨论的人已经很多了，这里不再细说。

的确，这是一种我们必须相应地调整自己的阅读策略的诗。张枣谈到，北岛等人的朦胧诗一出来，他就知道这不是他们想要的诗。为什么？因为北岛诗中的声音是一种纯正的普通话，一种集体的声音，一种总体的声音。北岛们的诗是政治的诗，是北京的公共政治文化的产物，而张枣则是一种南方的庶民作风的代表，而南方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敏感和那么多的政治关切。出国以后孤独失语的异域生活，更使张枣彻底过滤掉了那种雄辩的声音，完成了他纯粹的个体言说。他诗中

的句子很少呈现出口角伶俐的长句，而是布满褶皱和阴影的碎片式的声音，像冰在春天融化时开裂的那种细碎的声音，充满小心翼翼的探问，所以他特别喜欢把那些小字小词穿插在诗里，喜欢把两个三个的字地弄到一起，甚至令人感觉他把某个诗行弄得支离破碎。但问题在于，这个支离破碎就是他要求的结果。

雄辩的诗歌都有一个完整的主体，其实是总体性的言说，阳性的言说。而张枣的诗是阴性的书写。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叶嘉莹据此而论词的婉约本质，认为它的句子本身就是切碎了的，是琐细的声音，女性化的声音，所以词应该是一个阴性文本。而豪放的苏、辛则惯用长句，“一意迅驰，专用骑兵”。张枣诗的质地近于词，也属于一种阴性文本，是一长串游弋、踌躇、矛盾、短路的词细意熨帖而成，语调和口风中甚至能感觉到作者的呼吸。他说过：“我有多少不连贯，我就会有多少天分。”（《空白练习曲》之三）他就像接受了法国作家儒勒·列那尔（Jules Renard）的告诫：“写碎片，小的碎片，特别小的碎片。”他又喜欢用典，云雀呀，夜莺呀，长脚蚊呀，蛇腰子呀，还有蝴蝶啊，狼啊，一组诗镶嵌了太多别的文本的碎片。云雀是雪莱的云雀，夜莺是济慈的夜莺，长脚蚊是叶芝的长脚蚊。且不说还有那许许多多的私立象征，更增加了我们的阅读难度，对我们的知解力构成重大挑战。

对旧的写作传统的抗拒，在异域流离的经验，催生了张枣内倾型的诗，如乔伊斯的流亡写作，“以间离的精神和严苛的琐细形式来构造故事，能把一个人的灵魂从现实经验的传染病中解放出来，并且坚忍，甚或同情地从高处观照它。”

（Stanislaus Joyce, *My brother's keeper*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8), p.206.) 整组《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作者绝对动情，但又绝情忍性，就像荣格《论诗人》里说的，“艺术家在施展自己才能的时候，既不是自恋的，又不是他恋的，完全与恋欲无关。他是客观的，非个人的，甚至是非人性的。艺术家就是他作品本身，而不是一个人。”结果呢，“诗人心智之丰满稳密，处理手法之机敏玄妙，造境之美丽，令人艳羡和折服。”这是张枣给史蒂文斯的赞语，其实也可以拿来给他自己点赞。光是这组诗对精严的十四行形式的运用之妙，就令人赞叹不置。这十二首十四行诗的韵脚安排，不算第一首开头四行的故意出格，不算张枣用方言押韵和轻声字押韵，只有一处小疵，即第十一首第十一行忽然脱韵（“您瞧”和“回家”不叶韵）。莎士比亚体十四行，前十二行交韵，最后两行用偶韵，其难度比意大利式的彼得拉克体还要大得多：前面的十二行须行行不弱，要像十二根罗马柱，根根都能承重。尤为关键的是，最后偶韵的两行，要能把前面蓄势已久的十二行荡得开，提得起，镇得住。这方面张枣做得非常好，每一首最后两句的概括与提升总是十分到位，能够像拉链一样把整首诗拉起来！总之，张枣卓绝的形式感，当代中国无人出其右。

2014年10月4日完稿

## 【附】

### 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

C'est un chinois, ce scra lang.

——Tsvetajeva

1

亲热的黑眼睛对你露出微笑，  
我向你兜售一只绣花荷包，  
翠青的表面，凤凰多么小巧，  
金丝绒绣着一个“喜”字的吉兆——  
两个？NET，两个半法郎。你看，  
半个之差会带来一个坏韵，  
像我们走出人行道，分行路畔  
你再听不懂我的南方口音；  
等红绿灯变成一个绿色幽人，  
你继续向左，我呢，蹀躞向右。  
不是我，却突然向我，某人  
头发飞逝向你跑来，举着手，

某种东西，不是花，却花一样  
递到你悄声细语的剧院包厢。

2

我天天梦见万古愁。白云悠悠，  
玛琳娜，你煮沸一壶私人咖啡，  
方糖迢递地在蓝色近视外愧疚  
如一个僮仆。他向往大是大非。  
诗，干着活儿，如手艺，其结果  
是一件件静物，对称于人之境，  
或许可用？但其分寸不会超过  
两端影子恋爱的括弧。圆手镜  
亦能诗，如果谁愿意，可他得  
防备它错乱右翼和左边的习惯，  
两个正面相对，翻脸反目，而  
红与白因“不”字决斗；人，迷惘，

照镜，革命的僮仆从原路返回；  
砸碎，人兀然空荡，咖啡惊坠……

3

……我照旧将头埋进空杯里面；  
你完蛋了，未来一边找葬礼服，  
一边用绷紧的零碎打发下午，  
俄罗斯完蛋了——黑白时代的底片，  
男低音：您早，清脆的高中生：  
啊——走吧——进来呀——哭就哭——好吗？  
尊称的面具舞会，代词后颤“R”  
马达般转动着密约桦林和红吻。  
巴黎也完蛋了，  
我落座一柄阳伞下  
张望和工作。人在搭构新书库，  
四边是四座象征经典的高楼，  
中间镶嵌花园和玻璃阅读架。

人，完蛋了，如果词的传诵，  
不像蝴蝶，将花的血脉震惊。

#### 4

我们的睫毛，为何在异乡跳跃？  
困惑，溃散，难以投入形象。  
母语之舟撇弃在汪洋的边界，  
登岸，我徒步在我之外，信箱  
打开如特洛伊木马，空白之词  
蜂拥，给清晨蒙上萧杀的寒霜；  
陌生，在煤气灶台舞动蛇腰子，  
流亡的残月散发你月经的辛酸，  
妈妈，卡珊德拉，专业的预言家，  
他们逼着你的侧影吸外国烟，  
而阳光，仍舒展它最糟糕的惩罚：  
鸟越精确，人越不当真，虽然

火中的一页纸咿呀，飒飒消失，  
真相之魂夭逃——灰烬即历史。

#### 5

阳光偶尔也会是一只狼，遍地  
转悠，影子含着回忆的橄榄核，  
那是神，叫你的嘴回味他色情的  
津沫，让你失灵，预言之盒  
无力装运行尸走肉，沐浴在  
这被耀眼的盲目所统辖的沙滩。  
看见即说出，而说出正是大海，

此刻的。圆。看见羊癫疯。看。

生活，在哪？“赫克托，我看见你  
坐在一万双眼睛里抽泣，发愣”——  
你站在这，但尸体早发白。等你  
再回到外面，英雄早隐身，只剩

非人和可乐瓶，围观肌肉的健美赛，  
龙虾般生猛的零件，凸现出未来。

## 6

樱桃，红艳艳的，像在等谁归来。  
某种东西，我想去取。下午，  
我坐着坐着就睡了，耳朵也倦怠，  
我答应去外地取回一本俄文书。  
你坐在你散发里，云雀是帽子。  
笔，因寻找而温暖。远方，来客。  
梦寐之中，你的手滴落着断指，  
我想去取：人，铜号，和火车；

樱桃，红艳艳的，等的纯粹逻辑，  
我心跳地估算自己所剩的时光；  
没有你，祖国之窗多空虚。呼吸，  
我去取，生词像鳟鱼领你还乡；

你去取，门锁里小无赖哇吐静电——  
痛，但合唱惊警地凌空，绝缘。

## 7

你回到莫斯科，碰了个冷钉子，  
而生活的踉跄正是诗歌的踉跄。  
除夕夜，乌鸦的儿女衣冠楚楚地  
等钟声，而时间坏了，只好四散。  
带担架的风景里躺着那总机员，  
作协的电话空响：现实又迟到，  
这人死了，那人疯了，抱怨，  
抱怨的长脚蚊摇响空袭警报。  
完美啊完美，你总是忍受一个  
既短暂又字正腔圆的顶头上司，  
一个句读的哈巴儿，一会说这  
长了点儿，一会说你思想还幼稚，

楼顶的同行，事后报火，他们  
跛足来贺，来尝尝你死的闭门羹。

8

Wenn Du wirklich mich sehen willst, so musst Du handeln!

——Tsvetajeva an Rilke

东方既白，经典的一幕正收场：  
俩知音一左一右，亦人亦鬼，  
谈心的橘子荡漾着言说的芬芳，  
深处是爱，恬静和肉体的玫瑰。  
手艺是触摸，无论你隔得多远；  
你的住址名叫不可能的可能——  
你轻轻说着这些，当我祈愿  
在晨风中送你到你焚烧的家门：  
词，不是物，这点必须搞清楚，  
因为首先得生活有趣的生活，  
像此刻——木兰花盎然独立，倾诉，  
警报解除，如情人的发丝飘落。

东方既白，你在你名字里失踪，  
植树的众鸟齐唱：注意天空。

9

人周围的事物，人并不能解释；  
为何可见的刀片会夺走魂灵？  
两者有何关系？绳索，鹅卵石，  
自己，每件小东西，皆能索命，  
人造的世界，是个纯粹的敌人，  
空缺的花影愤怒地喝采四壁，  
使你害怕，我常常想，不是人  
更不是你本身，勾销了你的形体；  
而是这些弹簧般的物品，窜出，  
整个封杀了眼睛的居所，逼迫  
你喊：外面啊外面，总在别处！  
甚至死也只是衔接了这场漂泊。

无根的电梯，谁上下玩弄着按钮？  
我最怕自己是自己唯一的出口。

10

我摘下眼镜，我愿是聋哑人的翻译——  
宇宙的孩子，大厅正鸦雀无声：  
空气朗读着这首诗，它的含义  
被手势的蝴蝶催促开花的可能。  
真实的底蕴是那虚构的另一个，  
他不在此地，这月亮的对应者，  
不在乡间酒吧，像现在没有我——  
一杯酒被匿名地啜饮着，而景色  
的格局竟为之一变。满载着时空，  
饮酒者过桥，他愕然回望自己  
仍滞留对岸，满口吟哦。某种  
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变革之计  
使他的步伐配制出世界的轻盈。  
大人先生，你瞧，遍地的月影……

## 11

……是的，大人，月亮扑面而来，  
四望皎然，峰顶紧贴着你腮鬓：  
下面，城南的路灯吐露香皂气，  
生活的她夜半淋浴，双眼闭紧，  
窗纱呢喃手影，她洗发如祈祷，  
回身隐入黑暗，冰箱亮开一下；  
永恒像野猫，广告美男子蹁到  
彗星外，冰淇淋天空满是俏皮话……  
……夜莺啊正在别处，  
                    是的，您瞧，  
没在弹钢琴的人，也在弹奏，  
无家可归的人，总是在回家：  
不多不少，正好应合了万古愁——  
呵大人，告诉我，为何没有的桂树  
卷入心思，振奋了夜的秩序？

## 12

九月，果真会有一场告别？  
你的目光，摆设某个新室内：  
小铜像这样，转椅那样，落叶，  
这清凉宇宙的女友，无畏：  
对吗，对吗？睫毛的合唱追问，  
此刻各自的位置，真的对吗？  
王，掉落在棋局之外；西风  
将云朵的银行广场吹到窗下：  
正午，各自的人，来到快餐亭，

手指朝着口描绘面包的通道；  
对吗，诗这样，流浪汉手风琴  
那样？丰收的喀秋莎把我引到  
我正在的地点：全世界的脚步，  
暂停！对吗？该怎样说：“不”！？

(1994)

# 忆一凡

鄂复明

一

1979年春接手《今天》事务一个月后，芒克带我去赵一凡家移交资料。记得是在4月8日“诗歌朗诵会”之后，徐晓从北师大学生会借用的扩音器损坏，他们说一凡无所不能，我顺便带去请他修理。大宅门内一所安静的小院落，有位穿着不甚整洁、目光有些呆滞的老妪，蹲在庭前树下，后来小英（《今天》成员崔德英）告诉我，她是在数蚂蚁。我俩经过时，她略微扭过头，我感觉扫过一道犀利的目光。落座后一凡瞥了一眼敞口提包内的扩音器，我就势说明情况。一凡咯咯地笑个不停，没有看就用手推开了，以后我才明白，那意思是“别听他们把我吹得那么神”。

门外那位老妪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背后，手里拿着笔和几页用棉线订在一起的纸张：“同志啊，你叫什么名字呀，请你写在这里”。芒克这才向我介绍，“这是一凡的老母亲。”然后他俩就在一旁笑着看热闹。我不禁唏嘘，一凡四年前曾受牵涉，被捕入狱两年。年迈的父母还要担忧已经四十多岁的儿子交友不慎。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惊魂甫定。对于社会上新的躁动，已然从广播中听到“不要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新的不幸”，在那个时代，这种恐吓性的话语，甚至可以理解为温情的规劝，潜台词则是“殷鉴未远，勿谓言之不预”。

我仅此一次在他家的正房（实际上是弟弟小凡先生的居室）见到一凡，此后，直至《今天》停刊，我每周一、两次都是直接绕向正房后的小屋，将处理完款项事务的《今天》读者来信、稿件以及新印的期刊，给一凡送去，全部《今天》资料，就是这样积聚而成。在我之前，这项工作是由与一凡同院的一位也叫小英的女孩子（邹爱红）来76号取送的，她那外表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沉稳和淡定，很多年之后才听说是源于家庭的遭际。

朝内小街前拐棒胡同11号，是我去76号（《今天》编辑部）和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一凡那间著名的小屋，在众多友人的回忆文章中描述得不厌其详。我最深刻的印象，则是那张伏在桌前，微笑着向你侃侃而谈的面庞，一次次地让我想起中学时代曾读过的科幻小说《陶维尔教授的头颅》。我初识一凡后不久去送交资料，恰巧遇到一位经常去我所在工厂修车的朝内菜市场司机师傅从院内走出，我简单地与他打个招呼：“来这儿找个朋友”。“谁啊？”“赵一凡。”“啊？你怎么和他认识？”他瞪大眼睛把我拉到一边：“……从他家抄走的东西，整整两卡车呀！”

如果进前院后不绕向房后那间小屋，而是一直走到尽头，就到了北岛在他回忆七十年代往事的《断章》中，谈到的那间“属于一凡自己的小屋”，可能记忆有差，我的印象是穿过长长的走廊，而不是他所写的“长夹道”，依稀记得一凡挎着手工缝制的旧布袋，拄着双拐缓缓挪向小屋去校对稿件，见我到来，倚着走廊的立柱，说上几句……年代久远，如此清晰的记忆，连我自己都怀疑它是否真实。

那是在《今天》停刊前夕，一凡体质有所恢复，他也在尽力回归往日的生活

节奏。但没过多久，他在去往小屋的途中跌倒，摔断了那条相对而言的好腿。

后院这间正房东厢的耳房，可能是一凡更早期的朋友们经常光顾之所，也是父亲所担忧的“他单独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和良莠不齐的人来往过多，难保不受牵连……”。由于没有堆放大宗的资料，显得有些空旷，地上立着那台令北岛谈之色变“代表当时最先进复制技术的苏制翻拍机”。一凡用它制作过数以百(千?)计的文稿和书籍的微缩胶片，试图以一己之力，营造承载文化和记忆的诺亚方舟。

北岛当年的忧虑似乎是多余的，或许办案人员无视于这些挟裹在政治大案中的文学活动；迄今为止，我还未听说有谁因一凡入狱而受到牵涉。在归还的搜查记录清单上，开列出大量的衣锡群、北岛、芒克等早期地下诗人带有明显政治指向的诗歌，但仅在部分题目后标注着“赵一凡、赵一凡手稿或笔迹”等字样(现存清单原件中的红色字迹，则是他出狱后所作的标注，其中有些作者他也记不准了，便在名字后打个问号)，无疑是一凡把这一切都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1979年仲夏一个炎热的下午，去送新印出的《今天》第四期，我曾见过一面的北京图书馆(现首图)那位女馆员正与一凡闷闷对坐，她每月定期来取走一凡自费购买后捐给北图的民刊。一凡说她所在分馆的党支部书记严厉地批评她擅自做主收集民刊，责令“立即撤架销毁”。

当时的我们，对诸如此类的“官方机构”十分的不感兴趣，但一凡为给《今天》疏通言路，一厢情愿地尝试利用各种关系，对于他所开列的“赠阅”名单，我也曾向北岛提议，从期刊成本计而大幅削减，最终除了每期五册的存档外，所有的对外赠阅与交换份额便寥寥无几了。

然而一凡自己想做的事他是要坚持到底的。逐渐地我发觉他以“为朋友代购”名义的数额日渐增多，一次次五本十本地让人给他买去。一凡办事低调，我又忙于琐事，也未深究，直至他去世后，我去他家索取《今天》资料时，竟然翻检出十余套精选的《今天》杂志。是时，八年前停刊的《今天》，在高校及社会上的声誉如日中天，当年的期刊已是一册难求，就连《今天》同人手中也是寥寥无几。而这些宝贵的刊物，大部分是一凡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校对)所得购买的。此外，又不知有多少个人或单位部门，曾经“无偿地”得到过一凡寄来“赠阅”或“交换”的刊物。想起当年我曾责备过一凡“索要期刊过多，不能侵占订户的份额”，一凡就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陪着笑脸，央求我再多卖给他几本。在资料堆旁，我的哀伤不能自己，泪水混着汗水潸然垂落。

三十余年后，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以“《今天》文学杂志暨中国当代诗歌特藏”收藏全部《今天》资料，于2013年末，正式举办“《今天》文学杂志档案捐赠仪式暨1978至1981年间大陆高校自办文学刊物展”，其中“高校刊物”部分蔚为壮观。这一部分的珍贵收藏，完全是一凡借助《今天》当年的影响，以一己之力刻意完成的。只有一凡的远见卓识，才得以展现那个时代全国高校文学的创作风采。

一凡以他不事张扬的性格为《今天》做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今天》停刊后，北岛去各地云游，听到外省市读者朋友们对《今天》工作的交口称赞，他一直把这些归功于我。实际上我只是在处理完繁琐的款项事务之余，顺带回复几句。只有一凡，他那颗童真的心，他那圣徒般的信仰归宿，终于在《今天》找到了寄托。

谁又能承想：一凡曾经把他在共青团工作的传统风格融入了《今天》。在最初的几个月中，一凡已将读者来信整理出三本，每本都用那种力透纸背的原始复写方式誊写数册，交给《今天》的成员和作者们去传阅，用以激励我们的工作热

情。在百余封信件上留下了一凡圈点的笔迹：为读者来信做编辑和校对，这在世界办刊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 二

一凡自三岁起，因受外伤，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先后两度长达十五年睡卧石膏床养痾，其间只受过三个月的正规小学教育。一凡靠阅读大量书籍，以顽强的毅力自学成才。6岁便已阅读《西游记》，10岁以前将家中书籍甚至包括《鲁迅全集》这样的大部头著作读遍，为了矫正自学中不可避免的误读，竟下决心通读了一本字典。一凡被亲友们誉为神童。他13岁时编著的儿童文学书籍《新少年故事》，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一凡保存着这一时期与出版社往来的文稿、信件及稿酬单据。

我在一凡的遗物中，找到一份他在文革后期写给街道办事处求职简历，还有一份他父亲在一凡被捕后写给单位领导的检查。内中详尽地叙述了一凡幼年致残的缘由，以及少年时期刻苦读书自学成才的经历。尤其是一凡的父亲，在一凡以重罪被捕的惶恐之刻，竟然将爱子之心舐犊之情的拳拳至意跃然纸上，在那一严酷时期众多荒谬的悔过文稿中堪称独步。如果没有这两份文稿，有关一凡青少年时期传奇般的经历，很可能就如同我们那一时代众多的史实，也将流为传说。

一凡成年以后，长期为文字改革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等部门从事校对工作，参与过《红楼梦》、《聊斋志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修订本第一册）等书的校对工作，因其业务精湛，在某些书籍中担任最终校次。但一凡始终是个编外人员，尽管他的父亲在文字改革委员会中任职高层，却未曾给他谋得职业转正。文革期间，年近四十岁的一凡竟被街道工宣队划归到受管制的五类分子之列去参加“宽严大会”。他的“求职简历”应该是这一时期所作，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一凡极为罕见地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也幸而为我们留下了唯一的一份自述简历。

严格地论起来，1935年出生的一凡与我们不能算是同代人。一凡的父母，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同为浙江义乌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长期从事地下党派活动。一凡自己在伤残初愈的少年时期，也曾跟着父母随军北上，历经艰苦的军旅生活，后在大连参加小学建校劳动时受伤致残，再度卧床九年。一凡在自谋生路的校对工作之余，一直担任地区街道的少先队和共青团的组织工作，所以在那篇《断章》中，一凡踌躇满志地对北岛说：“你知道，我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里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后来在一凡经商时，他们不知从哪弄来一辆破旧的上海牌卧车，让我找个工友帮助修理，我去取工具回来，看见先我而到的工友，正与一凡聊得火热，原来他在这里遇到了小学时代的少先队辅导员。

我与一凡相识甚晚，到他病逝不足十年，但在频繁的接触中，却从未听他讲述过自己的故事。包括一凡入狱两年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也不像我所见过的那些社会活动家们，把这当作如同“黄埔N期”的显赫标识，交谈起来两眼放出异样的光彩。我从他遗留的寥寥数篇文稿中，所勾勒出一凡是个甚至可以称之为时代楷模的典型形象；我在同一时期结识的曾致力于《今天》初创后来成为《星星画会》主力的马德升，在原工作单位也曾被树立为“先进人物”；毋须讳言，今生今世我所有值得结交的朋友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在这同一教育体制下长成的，诚如北岛在他的作品中所言“我们的生活都是从这淡蓝色的封皮后面开始

的”……

并非热衷于异端思想的一凡，却因公安部主抓的政治大案而入狱，涉案之人与他并无过深交往，即便是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文革时代，结案时也仅以“知情未举……教育释放”，两年后文革结束时彻底平反。我曾就此与他同案的徐晓讨论，她却反问我：“你说呢？”看来她也从没搞清楚过。可是这两年牢狱之灾带给一凡的则是巨大的身心摧残，我听芒克讲，一凡入狱前以残疾之身拄单拐可以骑自行车远行（我想他在文革时期收藏的部分资料，就是亲自往返于海淀院校完成的），扔掉拐杖能徒手爬上景山……出狱后则一直瘫痪在家，再次摔伤后就只能靠双拐勉强挪动。牢狱于一凡，是他赖以维系生命之理想的幻灭与坍塌，再现了“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儿女”。

### 三

在一凡遗物中有一份写于1981年未署名的信件底稿，内中有这样一段：

“在你以前或是以后，我都不止一次地被人称为心目中的‘上帝’。但今后我再也不愿当任何人的上帝了。因为任何上帝到头来总不免像亚瑟的上帝一样遭到一锤子的下场。还是像我的名字一样，当一个凡人吧。不过，望你相信，我今后不会辜负一个‘人’的称号……”

也许，一凡疲倦了，自幼年起头顶上那“神童”的光环，更有可能的则是牢狱之灾带给他信仰的破灭。一凡也真是“言必信，行必果”，直到有一天，我差点向他发起火来。那天我刚坐下，还没摊开资料，一位老太太风风火火地进来，将一把零钱杵在一凡面前，然后慢条斯理地报账：“××个油饼，××碗豆浆……”我惊讶了。老太太走后，一凡用他那一贯的火上房也不着急的慢腾腾的语调向我解释：他让闲散的老太太，利用院内的走廊办了个简易托儿所，并兼管代购全院的早点，由他来记账管理。我愕然了：一凡你怎能这样虚掷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生命？

《今天》停刊后，一凡当然仍旧有他永远做不完的事。他开始深感（除政治因素外）资金匮乏对一个文学刊物的困厄，那一阶段，他多次向我念叨过“以商养文”的思路。他首先盯上了文改会的文印设备（一台手摇速印机），我想，这可能是通过他父亲的关系，我还听说一凡后来经商时，父亲曾特意叮嘱过：家乡的亲人们太苦了，让一凡有机会多多帮助他们。我确实看到，除了他家的保姆外，公司里来了几个他的子侄辈。义乌这一历史名邑，历朝历代为国家贡献出无数名公巨卿，却祖祖辈辈贫困至今。如今的义乌成为举世闻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不知一凡去世后回归故乡的那些亲属，日后是否有所作为，如果他们事业有成的话，一凡的公司，从时间上来讲，也可堪称其滥觞之地。一凡承揽了文改会内部的油印任务，又通过他的私人关系找些外单位的油印零散活计。工作人员只有一名高中毕业的待业学生（文士杰，后来秉承一凡的风格，把一个个子虚乌有的“加州牛肉面大王”品牌，做得风生水起，但他也承担起对曾经的女友，《今天》成员崔德英患精神病症后终身的扶养义务），还有他家的小保姆凤英（一凡去世后以干女儿名义刻在墓碑上）也抽空来帮忙。他请我作技术指导，同时兼管财务（当然都是义务的），我深感给《今天》管账时的简陋和无知，为此还专门自学了一些财会业务知识，建立的账本完全是按照正规的条例。

那一段的惨淡经营，回想起来真是啼笑皆非。一凡向文改会申请了300元借款作为启动资金，然后每月给工作人员（小文和他自己）按时发薪，但他私下里

却让我把他自己那份“工资”又返回到菲薄的“营业”收入中以维持运转。

我不忍有拂一凡天真的憧憬，但对他的“经济活动”也实在是不看好，文改会主管行政的贾处长也时时向我抱怨一凡的想入非非，大概是看我的头脑还算清醒。不承想这一年多看似荒谬的经营活动，对于一凡却是一次热身。在接踵而来的经济大潮中，一凡得风气之先，率先成立了民营的“北京三月服务公司”。

一凡的公司名义上是以残疾人为主体的（记得挂靠单位是东城残联）的免税单位，汇集了被抛散在社会底层饱受贫困和歧视的无业群体，内中也不乏一些打着残疾人旗号借此发小财的精明人士。一位相交多年的残疾朋友后来愤愤地对我说：“……扔下双拐他都能跑”。我还真是见过此君，听到某一紧要信息后，竟下意识地沙发上起身就能走到门口，却又赶紧返回拄上双拐，不好意思地回头笑笑。

这个国家经济腾飞的初始，竟是我多年前看过的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中描述的“资本主义初期阶段”还要匪夷所思。那时国民经济的物资牢牢掌控在各级部门手中，所谓“双轨制”尚遥遥无期，传说中的钢材（如角钢、盘条等）又轮不上一凡这类小公司去分一杯羹。然而这为数众多的群体，却将他们的智慧发挥到极致，比如：他们将自己的货源定位在某种物资的包装物——麻袋。试想，哪种物资不需要包装？集装箱那时闻所未闻，纸箱尚不堪用，而麻袋不属于统购物资，没听说倒卖麻袋犯罪的。麻袋利润虽小（据说只有几分钱），但需求量成千上万，也很可观，于是，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一场倒卖麻袋的经济热潮。那些天，我在一凡那里听到和看到的都是有关麻袋的交易，但从未看见过一个麻袋成交，倒是听说不少人预付了定金，却在某个传说的环节上功亏一篑，闹个血本无归。

一凡的公司总算是走出了麻袋的怪圈儿，他又开始向我描述一笔收录机的生意。那年月的学习英语热以及港台歌曲的风靡，紧俏的录音机还停留在日本进口的“砖头机”时期，北京无线电某厂引进了一批机芯组装成收录机，我见过那个机型，可以堪称那个时代的家庭音响。一凡告诉我，只要能弄到资金，该厂业务员就答应供货，利润极为可观，几批货周转过来，就能打个翻身仗。我有感于他们公司捉襟见肘的资金状况，也相信了一凡天衣无缝的描述，竟一反自己处世的常态，从某单位朋友那里挪借了3000元，约定让他使用三个月。

岂知资金到账后，根本就没见到一台收录机，这笔资金马上被他下属的经营者们提取得干干净净。两个月过去了，一凡也沮丧得很，他用高额的利息应付我，可我担心的是本金的归还。那一阶段，是我到一凡家最频繁的时期，最后几乎是隔一天去一次，一凡也曾尝试着给我划过款，结果因空头支票还被银行罚了一百多元。想起来真是后怕，这笔款项一旦缺失足以让我的朋友身败名裂！我与一凡尴尬对坐，没有言语，只是苦笑，就像被双双困在无望的孤岛。最后，一凡不知动用了何等的心血，从他的不可控的茫茫商海中捞取到资金如期归还。我极度疲乏，终止了断断续续地参与一凡的“商业”活动。

在如此虚幻的闹剧中，一凡却很投入，很忙，他很兴奋，说是找到了《上海的早晨》（小说）里资本家在商业场上弄潮的那种感觉。与过去的朋友渐行渐远，我也仅仅是出于习惯每个月顺路去看望他一次，但不再介入他公司的事务。

#### 四

一凡搬进了新家，后拐棒新1楼，最靠近文改会后门的那个单元101号。一凡的父亲出门行走数十步便可到单位上班，脑力却大不如前，不久离休居家。有

时外出散步，离家不足百米便找不到归途，为此又雇了一位保姆专职看护。某日我去看望一凡，见一半大小子抱头鼠窜，身后飞来碎砖破瓦，再往后看竟是赵老先生所掷。恍然间时空倒错，仿佛回到老前辈投笔从戎的战乱时期。气急败坏的保姆紧跟着赶来拉他回家，一路上他还在愤愤不平的向我讲述他“替天行道”的缘由。

父母患病先后长期住院治疗，家里名正言顺地成了一凡公司的办公室，各色人等攘来熙往，传呼机与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我去他家的次数更少了，一凡面色疲惫，总是有着处理不完的事务，坐上半年也难得和他说上几句话。北岛在一凡去世后，从国外给我的来信中也抱怨过这一状况。

一凡未曾从公司那里得到半点好处，他的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无偿地给予了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残障人员、他那些贫穷的乡亲们以及社会上有求于他而并不相干的人，为数众多的人利用他公司的名义，使用他公司的账号，淘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今天》的成员刘念春和崔德英在失学、失业陷于贫困之际，也是一凡首先接纳了他们。

1988年夏初，一凡向我展示了他公司新购置的“四通一体化电脑打字机”，居然可以在录入文档校对后准确无误地打印出蜡版，这与速印机配套油印刊物简直是易如反掌。望着一凡依旧疲惫的面庞，我很欣慰：一凡始终没有忘却他所钟爱的文学事业。数日后传来一凡因过度疲劳住院调理的消息，我和朋友们都觉得他早该换个环境去休养一段时间了，我准备待他将养数日后再去看望。孰料不到一周，他却在简陋的中医院病房悄然辞世。

一凡去世后，他公司的账号空空如也，竟承担不起他的丧葬费用。最终，还是那些曾靠他公司发些小财的商人们良心发现慷慨集资，为他在八宝山公墓大礼堂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大概是这里首次开放给一个平民的葬礼。

我们在京的朋友们以《今天》同人及生前好友的名义在他的灵前安放一个小小的花篮。

有关一凡的家世，长期以来一直沿袭“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说法。可能是缘于赵老先生任职秘书长的文字改革委员会麇集了叶籁士、叶圣陶等一大批饱学鸿儒，他的满头银发梳向脑后，一身藏蓝色中山装纤尘不染，那份儒雅与谦恭也很难让人联想起曾与敌特周旋、转战南北的革命者。

在义乌政府网站上详尽地介绍了赵平生老先生出生于义乌仓里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通过义乌城里一个姨娘的关系在绣湖书院就读三年，毕业时得全县高小统考第一名，1920年以全县统考第一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七师范（金华）读书；在“五四”运动后，参加了择师运动和反对学校当局贪污运动，受停学（后改为试读）处分。1924年上学期，自动离校后考入浙江省立一中高中师范科（杭州）读书。1926年到绍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一凡的母亲孟荷珠（孟俊）女士网上只提到她是“全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我曾见过她早年书写的字体娟秀的楷书，或许是位大家闺秀。

一凡的父母在他去世两年后相继辞世。

一凡家庭中唯一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他的弟弟。孟小凡（从母姓）先生文革前即执教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据义乌政府网站介绍：“孟小凡是著名的超导电子学专家。曾任北大物理系超导器件科研组负责人，参与国家超导量子电压基准的建立和国家科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超导量子干涉器’的研制。曾于1983年和1985年2次获得国家科委科技成果奖……现移居美国，任柏克莱加大学电机工程系微电子实验室资深工程师及低温工程部主任，并被聘为硅谷多家高科技公

司顾问”。八十年代初，家用电器还在电风扇和黑白电视徘徊时期，一凡家中已用上他弟弟手工制作的以液化气为能源的冰箱。

我还保存有一份一凡写的文革期间“他和弟弟小凡因参与社会活动”被街道派出所传唤的备忘录。这并不奇怪，后来被誉为“国学泰斗”的季羨林先生，当年也曾领导过“井冈山战斗队”与红极一时的聂元梓对垒。一凡收集的文革资料，很可能还有他弟弟小凡先生的一份功劳。

2010年清明，我们去祭扫一凡墓地，一纸续租通知提醒我们：一凡过世已逾二十载。一凡下葬的太子峪陵园绝非风水宝地，这座号称“规模最大，安葬骨灰数量最多”的公墓，地处京郊永定河故道、京广铁路沿线与占空高压线交汇的荒沙丘地带，在其官网上也仅仅列举几位不甚知名的作家、演员和播音员入葬于此。我和徐晓去为一凡办理逾期20年的续租手续，因缺少有效的墓地证件（在他早已失去联系的干女儿凤英手中），特意从他家乡义乌政府网站上下载了有关他父母的“显赫”身世并打印给办公人员看，以图网开一面，孰料他们略微翻看，便微笑着退了回来，那笑容似有深意：你当我们是少先队员呀，来这里给我们讲革命故事？

## 五

一凡的追悼会后，我叮嘱徐晓与他家保姆联系，以期尽快去取回曾经我保存在一凡那里的《今天》资料。我把工厂的本职工作完成后，偷偷溜出，去他家翻检。我未曾见到一凡数以吨计的珍贵收藏，那些成箱成捆的资料，可能已经到了它们的去处，剩余的由劣等纸张构成的资料堆，像沙丘一般从阳台流向室内。显然是徐晓的预先叮嘱起了作用，虽同样使用劣等纸张，但印制还算精美却不带有官方出版印记的民刊，鹤立鸡群般地兀现其中。

从我最后见到的这些资料中（也许连其百分之一都不到），仅仅翻检出一套插图本的《红楼梦》，尚未开封。一凡参与过该书校对，这应该是给他的赠书。为了能够在一凡即将消逝的资料旁多逗留些时间，我讨好般地拿给保姆，看她们喜爱的模样，应该不会去当废品卖掉。此刻，我在她们眼中，已是个友善的拾荒同类。

一凡嗜书如命，但家中书架只见码满资料，他的藏书却悉数在朋友们手中辗转流传。我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一份藏书单，只记录了1974年之前的，其中有内部出版物的黄、灰、白皮书类，其书目之齐全，闻所未闻。

我用了两个下午的时间翻检，分两次用自行车驮运回家。就像八年前《今天》停刊后，我和老周（郦英）分别把《今天》的剩余物资（速印机、封面、纸张等）运回家中，第二天见面时，不约而同地谈起各自那不识字的母亲，用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布单，把它包得严严实实，我俩曾哂笑过她们这种掩耳盗铃式的遮盖。这次母亲依然如故，只是面色更为沉重。

有关一凡巨大收藏的结局，长年以来被归咎为“他家的保姆全部当废纸卖掉，送到废品站，化为纸浆”，但保姆是他家从贫穷的家乡请来佣工的农民，不会懂得历史与文化；更何况一凡去世前父母神智不清长期住院，弟弟小凡早已移居国外，家中无主事之人，保姆处理完剩余物品，公租房即将被收回，她们也要返回家乡自谋生路。作为一凡的友人们，难道不应该反思此时此刻的无所作为吗？固然，我至今也无从设想我们中间谁能有条件承继这数以吨计的有形物资，但必须

承认：我们对一凡的珍贵收藏缺乏足够的注重，在以后的很多年，我们都在刻意地回避这个问题。包括我自己从中取回有关《今天》的资料，也仅仅是囿于自身的责任所在。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一凡以一生心血凝聚而成的珍贵的巨大收藏的人。

一凡和我经手过的这些信函、文稿、单据——与我保存的收发记录对照，居然完整无缺，真是奇迹！——分门别类存放在旧的包装纸袋和纸夹中，滞留在八年前《今天》停刊时的“待处理”状态，就像一架正常运转的机器戛然中止，又随时在待命启动。一凡的辞世，这才令我醒悟，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已被埋入历史。

其后又很多年，我都一直保留着资料的原初状态。如果说一凡作为那巨大收藏的所有者，他尚且在期盼有人来接手做下一步的整理工作，这“……整理出东西来，是另一种工作”不仅仅依靠热情和毅力，它是一项必须具备某种学识的专业工作，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我因某种机缘介入《今天》的事务，我仅仅是这些资料的经手人。

光阴荏苒，这些当年因经济窘迫而使用的劣等纸张渐渐泛黄变脆，不堪抚弄，兵燹水厄也历来为纸媒文物之天敌。但深知此物将要伴随我的终生，于是在内为存放煞费苦心，在外不惹事不折腾，对上门“造访”的公安干警毕恭毕敬，在单位连“组级干部”也不敢得罪，唯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哪敢有我在草原插队牧羊时“天老二，我老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与我何有哉”之豪情。

母亲数十年来隐忍在心，在她病重时悄悄地央求我：“把这些东西还给一凡吧”……

直到……直至我也到了一凡去世的那个年龄，我不再存有任何希冀和指望，就像当年第一次拿起胶辊帮助油印《今天》，我越俎代庖地做起了资料的初步整理工作。如果说《今天》已被埋入历史，我就算是个苟活其中的殉葬者，在暗无天日的墓穴中，自得其乐地按照我自己理解的方式，将这些我所熟稔于心的“殉葬品”分门别类，“不知今夕是何年”……

我得感谢日新月异发展着的电脑技术，它使得我梦想成真：将资料录入或扫描后存入硬盘，它的原件便可视为可有可无的“躯壳”。尽管如此，依然与这些相伴多年的旧物难以割舍，我抚平它们的每一道折痕，用那种只有在农贸市场才能买到的旧式信笺尺寸的薄膜封套，一一封装后分类入册。若干年后《今天》资料移送馆藏时，黄潘明珠老师马上叮嘱她的工作人员：“不要打乱现有的次序”。

最初我的设想是：把资料数据利用盗版光碟的途径刻成光盘，让资料存留在更多的朋友们和研究者手中，那年月还没有见到大容量的存储设备以及可以快捷地传输大宗资料的互联网。但我始终未曾动过移交给图书馆的念头，数十年前在一凡的斗室中听到那句“撤架销毁”的粗暴指令，完全颠覆了我自识字始对图书殿堂的敬仰；无独有偶，报载巴金捐赠给国图的7000册珍贵藏书，竟有400册流失到旧书摊，此刻巴金尚未辞世！国图曾承认对巴金的藏书不作专项收藏，只按分类“插架”，以致……诚然，国图“汗牛充栋”，“巨擘”巴金尚且如此，小小《今天》又怎敢希冀立锥之地？

也有几位朋友谈到移交给欧美名牌大学的图书馆，肯定会得到良好的收存，我相信。但我又感觉那是“天上宫阙”，此刻，我与这些旧物，已到了难以割舍的境地。况且，这些动议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2008年初冬，《今天》30周年庆典在香港举办，东道主香港中文大学，一应

事宜由中大图书馆操办。期间，有位我一直以为是位馆员的女士，跑前跑后，事无巨细，包括安置座位号这种琐事都很认真，渐渐地，在我头脑中叠现出30年前在一凡的小屋见到的那位敬业的北图女馆员，心中萌动了把资料放在香港的念头。我找北岛商议，这才知道她是中大图书馆的副馆长黄潘明珠女士。

此后近三年的时间，黄潘明珠老师与北岛倾力操作，直至她从中大图书馆长位置上退休，又转聘在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担任馆长高级助理，终于成就了《今天》资料在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的特藏。

此刻我方知晓，黄潘明珠老师在任中大图书馆长时期，曾促成“规模最大、收藏最丰富的”香港现代文学特藏室。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被“正史”所忽略而濒临流失的这两部分珍贵史料，经黄潘明珠女士的悉心呵护得以存世，其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北岛拜托挚友广州木刻文化公司董事长陈志实先生，亲自来我家将十数箱《今天》资料押运到机场，安全抵港存至北岛家中，等待我随后赴港交接。资料运走后的翌日深夜，我家自来水表突然爆裂，地面漫水寸许，令我心悸不已，又暗自庆幸。

2011年秋，在香港城大图书馆的小会议室，举行了只有十数人参加极为低调的捐赠仪式，黄潘明珠老师与我约定不去惊动媒体；尚有三分之一的《今天》资料滞留在我家中，包括全部的读者来信来稿，这部分资料在我将其全部整理扫描后，才显现出它的意义。我不想被打扰，还有大量的后续工作等待着我去做。

景祥祐馆长设晚宴款待，黄潘明珠老师显得格外的轻松，她携夫君黄宏发老先生赴宴；初识（30周年时似曾见过？）香港资深出版人林道群先生，他自《今天》海外复刊最困苦时期始，直至《今天》第100期，其后二十年间，默默无闻地奉献出自己的业余时间，独自一人承担起《今天》的全部“杂役”。其间困苦，比较我所经历那不足两年人才济济的“火红的年代”，真是惭愧得很。那天还有一位教授作陪，由于席间酒喝得太过，竟不记得名姓了。

景馆长甚为谦逊地表示：“我们这个‘庙’太小了”。

黄宏发老先生曾任前立法局主席，他若有所思地颌首言道：“这就对了……放在这里就对了”。

我说“我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嫁得太远”。

黄老先生也不禁喟然长叹。

那个晚宴，在座各位都感觉到成功后的那种放松，以至在不知不觉中渐次喝光了所有的白酒。入夜，我们步履蹒跚地离开图书馆灯光幽暗的大厅，黄潘明珠老师甚至风趣地比着看谁走得直，北岛惊异得睁大眼睛，他移居港岛后居住有年，还从未见识过这等阵仗。

此后，我愈发感受到黄老先生的睿智，在《今天》资料入藏仅两年时间，城大图书馆已将首批资料全部编目和扫描完毕，邀请我再次赴港参加隆重举行的“《今天》文学杂志档案捐赠典礼”以及作为成果展的“1978至1981年大陆高校自办文学刊物展”，我随身带去以信件和稿件为主的第二批《今天》资料，我心中渴望已久雪藏数十年的《今天》资料，开始融入庞大的信息网络。

我乘京九列车即将到京，遥望着远处高压线下绵亘的沙丘，那里是一凡的埋骨之地。我的心境愈发沉闷，尽管他业已消失的庞大收藏中仅存于世的《今天》资料，已安藏在这条铁路的尽头——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但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却是一凡那我从未见过的失魂落魄的形象。

追记于 2014 年末，一凡辞世 36 年后

## 附录一

一凡从未与我谈论或者展示过他的珍贵收藏。以一凡的工作能力及效率而言，兴许那些积箱垒摞浩繁的资料，在他收存的过程中，早已分门别类编录规整，不宜再次拆包展示，只在默默地等待有缘人拿去做学问。在至近的朋友中，我也未曾听说过有谁详知一凡的收藏。

三十多年后，在我将《今天》资料移交给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的前几天，无意中从网上读到，海外一位与一凡只有一面之交的范炳刚先生，当年竟然从一凡那里听到有关自己全部收藏的详尽讲述，足以弥补这段历史空白，首先，他对一凡小屋的描述是那样体察入微：

### 北京赵一凡

……正是“他家厨房兼饭厅的小屋”。进门不过一步就是案桌，再跨一步就是屋子的后墙。紧挤着案桌，是赵一凡的床。而那床，仅窄窄一条木板，上面还堆了书报杂志，余下的地方，似乎仅够赵一凡坐在床（板）沿儿。

赵一凡生得不凡：大头，大前额，双目炯炯，似有用不完的脑力。

大学期间，地下手抄本，曾经是我们梦寐以求难得一见的东西，我迫不及待地跟他谈起。地下刊物，地下文学，从作者到文章，到手抄本，到刊物，什么都在他的脑子里。问他我感兴趣的小细节，他多半记得。他谈起来，任意挥洒，跌宕跳跃，全不按章法。你立刻就会感到他那不同一般的思维表达方式，完全不是学院里常见的套路。而且，很快你就会认识到他那超越一般的深思自成的功力。我当时已自以为很读了一些文学的，却忽然间觉得，在他给出的语境逻辑中，那些关于文学的坐标象限都是旋转的，原来很清楚的东西，一下变得模糊不清起来。

我说，这些地下的东西应该好好保存，将来的当代文学史，是不能没有它们的等等。

赵一凡眼睛更亮了。印象中，他是左右环顾了一下的，然后说，这些刊物他都有。说着指了指床上堆着的书报资料。我当时一定是颇显惊异了。他认真地看着我，沉沉地说：“你们学文学的，想到文学史很自然；在你们这些人之外，可就不一样了。有多少人会把文学史当作头等的大题目，会从文学史的角度提问题，想问题？原本就还有更大的题目嘛。这么样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而且也永远不会再有了的一个时代。把这个时代的东西，搜集起来，整理出来，留给历史，留给后人，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到的吗？”

我这才注意到了他不是仅仅在说文学。

“我是留心了这些文学的东西，搜集了这么多。但是，这些还只是在说小题目。这些不过只是一小部分。我真正搜集起来的，可远不仅仅是这些。”

已说到了这里的赵一凡，眉宇间勃发出一股英气：“文化大革命的东西，从下发的中央文件，到红卫兵的传单，文件，大字报，红卫兵小报，战报，从一开始出来，到高潮时期，直到后来，我这里全都有。”他的手指了一下床侧，很认真地朝屋后指了指，“全北京，可能全国，恐怕我这儿的，也是最全的了。”

那是第一次相谈，赵一凡便一直谈到了他隐秘的私藏，足可见他之为人的“太好”。

扫一眼那床侧、床下，我看到了一捆捆的资料，一个个包紧了做了标记的大纸袋。我知道，我看到的那些，只是他所说的收集的冰山一角。

他还特别提到：文化大革命的东西，不光北京的，还有外地的，几个大城市的，他都有。这得花多少时间精力啊？

“是啊，我做不来别的；这么多年，真正做了的，就这么一件事。我觉得，我是做了一件大事。”

“将来，一旦有人下决心来整理这段历史，我会全部拿给他。”

我说：“这件事，关系到史，关系到我们祖国、我们民族，说它多重要都不为过。你该集中精力来搞。”

“我自己不行”。他立刻说，自己身体不行。“搜集资料是一种工作，是第一步；整理出东西来，是另一种工作，是第二步。我很高兴自己做了这第一步，而且可以说，做得还好，能做的我都做到了。我愿意尽快看到有人开始想下一步。”

——赵一凡说。我至今记得他说这番话时那深重的神情。

“首先是得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决心。还得有一定的时间。还得静得下心来，熬得住……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很多精力和时间。”

他问我上课需要多少时间。我告诉他说，我当时将要开的那门课，每周一次，每次两节，不需要我多少时间。

“在高校很好，能有充裕的时间来自我支配，这很难得、很难得。”

话到这儿，他便不再说。

我久久不能接他的话。我当时确是毫无准备面对他这样的话题。

事后说起我也就知道了，甚至红丹，也没想到赵一凡会有这样的话题，而且会一直说到那么深里去。

我当时甚至都没有接近到自问有没有那能力的一步。我只是觉得，突然面对着一个阴冷的滚烫的轰鸣的变幻莫测的庞大无比的东西，一个要像原子弹一样炸开的让世界震动的包：一包文化大革命。

## 唯一的收藏

见过赵一凡后，我特别和红丹谈那收藏。红丹也说，他那堆东西，怕是天下唯一的一份。赵一凡搜集东西，她知道；但搜集了多大范围，搜集了多少，她并不知道。至于赵一凡和我说过的，关于他那一收藏的想法，红丹竟是第一次从我这里听说。这使我对赵一凡那番话，更加深以为重。

“……这事太大了……你要是答应他，就得准备好舍弃一切。”——红丹的话。

“学位、职位，这些就不用说了，你得准备好舍弃一切。一切，你懂吗？——你的亲人，你的社会关系，甚至，你至今为止所知道的社会，你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世界，你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一切的存在……怎么能跟你说得清楚呢？别告诉我说你懂，你没有经历，你不可能懂。……怎么跟你说你也不会真懂。……总之，首先你得准备好去坐牢，而且，你得准备好‘把牢底坐穿’——我就先把这个话告诉你，这里绝对不会有另一种可能。”

只是提醒我吗？红丹曾经希望我给以一个拍案而起的回答吗？

“我要听听你说，我该去做，还是不去做。”

“我不知道。”她用了最轻的话音，随着话音低下了头。那时我已懂得，当她这么说话的时候，那是她“最后的回答”。

夜里，静下来，怎么可能睡得着？

“这事太大了”……我深知它的大，我甚至想到了很大的词：“使命”、“崇高”……那

时我刚刚步入大学，想的原是一堆的看书、讲课、做学问，和这突然面对的，实在是天上地下。从那样的一堆天真里，转过眼睛来突然面对这样的大，对那时的我来说，实在是一一太一一大了。

如今再来说，无论如何，那时首先缺了的，还是一份勇气。

没能拍案而起，但我也没放下，怎么可能放下？！

后来我竟再也没去过赵一凡家。

那以后，不知多少次，即使后来来了美国，每一想起赵一凡那一大收藏，总默默祈愿，会有一位德能兼备的人，接续了赵一凡的浩大工程……

想不到，那份唯一的一大收藏，用徐晓的话说，竟终是给“断送了”。

一一就在我们这代人手上。

一代人中，幸有赵一凡这样的奇士，在那样的条件与环境中，竟成就了那样的搜集；而这一代人中，竟没人能接续这搜集与保藏，终使这份收藏在同代化为乌有，这，只有古汉语的那个词了：呜呼！

凡知道赵一凡有此收藏的，均有一分责任。这么说过分吗？

凡知道赵一凡关于他那一收藏的意愿的，更有一份重责。这么说过分吗？

(以上文字摘自范炳刚先生的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505312265\\_0\\_1.html](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505312265_0_1.html)  
范炳刚网址：[fanbinggang@gmail.com](mailto:fanbinggang@gmail.com)

范先生文中最后那两句话在重重地敲打着我。

我曾多次试图与范先生联系，却杳无音讯。他是经郑红丹介绍去的一凡那里，我从一凡的遗物中检出郑云燕、郑红丹兄妹七十年代与一凡的通信，我已将扫描后的原件与《今天》资料一并送馆保存。

## 附录二

本文涉及的《今天》资料请查阅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馆藏 PDF 文档编号如下的文件（部分文件曾散见于《今天》网站上的“今天资料”栏目内）：

### 赵一凡资料之一

79105576\_full 搜查记录首页

79105583\_full 搜查物品登记清单

79105590\_full 已复制较[重]要的材料原件(目录)

79105606\_full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从赵一凡家搜查的诗(目录)

79105613\_full 对赵一凡同志的复查结论

### 赵一凡资料之二

79105934\_full 赵平生先生致文改会党支部的检查(草稿)

79108485\_full 草稿,附件:赵一凡幼年患病的诊断书

79105941\_full 赵平生先生致文改会党支部的检查(抄送稿)

79105958\_full 我的简历(赵一凡 39 岁求职时撰写)

79105965\_full 简历 (草稿)

79105972\_full1 我和弟弟孟小凡昨天去朝阳门派出所的经过（交文改会联委会）  
79105989\_full1 赵一凡致工宣队的信

赵一凡资料之三

79106177\_full1 [赵一凡复信]  
79106207\_full1 赵一凡部分藏书目录  
79106221\_full1 赵一凡自学俄语的笔记

赵一凡资料之四

79106238\_full1 稿费通知单  
79106245\_full1 出版合同续约通知  
79106252\_full1 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部致鹿麋的退稿信  
79106269\_full1 《女革命者丹孃》译稿  
79106276\_full1 催稿信  
79106283\_full1 《苏联民间谜语》  
79106290\_full1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79106306\_full1 《简化汉字字谜》  
79106313\_full1 《关于译名的读音问题》  
79106320\_full1 《关于译名的读音问题》  
79106337\_full1 赵一凡自学初等数学（代数和平面几何）的笔记